

# 炎黄春秋

第 **5** 期  
2007 年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于右任《望大陆》的家国情怀**

**寻找彭加木**

**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

## 目 录

### 春秋笔

- 1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 ..... 张培森  
10 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 ..... 周瑞金

### 海外事

- 13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 张惠卿

### 求实篇

- 20 于右任《望大陆》的家国情怀 ..... 白云涛  
25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 孙家洲

### 人物志

- 30 寻找彭加木 ..... 张梦君  
37 雷宇：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 ..... 张敬东  
43 《贺龙大传》与夏曦 ..... 李 乔

### 怀人篇

- 46 胡耀邦与电影《代理市长》 ..... 欧 初  
49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 周艾若  
52 我和孟氧的交往 ..... 谢 韬

### 沉思录

- 54 给大学以“精神空间”  
——关于大学教育问题对董健先生的访谈 ..... 丁芳芳  
58 文坛低俗化，“三头主义”大行其道 ..... 马识途  
59 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 王海光  
63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 庞 晔

### 品书斋

- 64 每于寒尽觉春来  
——《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序言 ..... 王 光  
67 《张学良：毁誉由人》序言 ..... 刘济民

### 往事录

- 69 五二〇事件：摧毁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 穆广仁  
73 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 ..... 胡伯威  
80 为说真话舍身的林白水 ..... 章长炳

### 古今谈

- 76 平和的进步 ..... 朱 正  
77 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 ..... 张绪山

###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竟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 张闻天与列宁新经济政策

张培森

活水自有源头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追溯其理论渊源，最早可以归结到列宁在俄国革命胜利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然而从中共的历史上看，当列宁开始在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就在中国传承列宁这一思想，并不断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一位党的领导人恐怕要数张闻天了。而他在党内提出过的许多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深邃见解，可以说都与列宁这一思想有关。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有许多正确意见和主张，在他生前都未能实现，甚至遭到错误的批判。今天如果重温一下张闻天的这份思想遗产，相信对我们反思过去启示未来也许会有所裨益。本文在此仅列举几个片断。

## 从美国传回苏俄文告

张闻天是何时开始接受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从可查到的资料来看，1922年他从美国发回的一篇苏维埃政府文告的中文译稿是一份可供研究的重要文献。列宁是1921年决定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一年后，苏维埃政府经列宁亲自审定发表了一篇类似白皮书的长篇文告《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而这时正好是张闻天在美国勤工俭学，他从当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中的一份英文刊物上看到了这篇文告，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如获至宝地将它译成中文寄回国内，随后上海的《民国日报》连续三期刊载了这篇译文。

文告全文共分11部分，不仅详细阐述了俄罗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和实行后的变化，还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为何要实行这个政策转变，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工人与农人在事

实上握到权力的第一个国家。它将要做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底变迂（即“过渡”——笔者）中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个日子尚未到来；它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在衰败了。它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底原素（即成分——笔者）混合的同时存在。”文章宣称这种变化正是表明“指导苏维埃俄罗斯底事业的人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主义者”。（所引均据张闻天译文）

张闻天翻译此文的具体时间是1922年9月24日，这时距他到达美国还不到半月。为何文告对他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位越洋过海的东方学子当时年方22岁，而他早在19岁时，也就是1919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曾著文介绍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可以称得上五四时期南京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从那时起包括1920年去日本学习，这位年轻人一直在关注并不断思索着风靡全球的社会主义潮流。而眼前出现的这篇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展示社会主义崭新观点的文告，怎能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自然这时的张闻天还谈不上对列宁思想有多少研究，然而从以上这件事来看，至少表明列宁这一新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海中扎下了根子。他通过这次留美，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有了实际的考察，而且有幸吸收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新思想，确实是大开了眼界，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就更为实际了。

## 在苏区大胆主张利用资本主义

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30年代在中央苏区



张闻天

时期。这时的张闻天已是身居中共领导核心层的共产党人。如果从他那次去美国算起,已有十年时间,而这十年内,张闻天个人确实经历了不小变化:留美归来后 1925 年加入了中共,不久即被派往莫斯科学习,经过五年的学习于 1931 年回到上海时,党组织已处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下,由于他留苏学习表现出众,回国后即被赋予重任,后又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隔了一年,便随中央机关内迁到了“红都”瑞金。

到苏区后不久,1933 年 4 月他在谈论苏区经济问题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这一主张。文章明确指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发展,对于我们并不是可怕的。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还说:“当前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的大企业,那末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这里张闻天正是首次将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政权下的经济。

为何称张闻天提出这一主张是大胆的?这就必须联系到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初党内的背景,而且首先要从苏共说起。1924 年列宁去世,1925 年主政的斯大林就宣告“恢复时期”终结,实际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时期,起先从工业和商业系统中“排挤资本主义”;紧接着就转向对农村资本主义的进攻,普遍开展对富农的斗争,并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到了 1930 年随着“全盘集体化”方针的提出,就又从限制富农进而转为消灭富农,对资本主义成分举行“全面进攻”。在此过程中,苏共党内在建设方针问题上并非没有分歧,当时对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的布哈林,被冠以“反党”的罪名而开除出政治局,一场争论被迅速压了下去。

而中共 30 年代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同样是“左”的,其根源正是离不开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早在 1928 年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在肯定中国革命民主革命性质和克服大革命失败后的盲动主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六大决议关于“革命前途问题”却认为:在“革命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换句话说,民主革命过程中,就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显然是超阶段革命论。而到了 1930 年当苏联国内开展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共产国际更是明确要求中共也一样“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王明上台后提出的“三反”(即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反资本主义”)纲领,不过是国际路线的翻版。当时苏区连小学识字课本上都印着这样的口号:“左手拿着刀,右手拿着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扫光。”而这种极左路线贯彻的结果,不但政治上搞得党自身孤立,而且使得苏区经济也陷入严重困境。

就在当时中共党内这种将资本主义完全视为死敌的情况下,张闻天居然在文章中公开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岂不是把自己往枪口上撞。果不然帽子立刻飞到了头上,遭到总书记博古不指名的批判,指责这是“机会主义”,是“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而且要“以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随后的历史表明,中央迁入苏区后党内两位高层领导人的这场争论成了“左”倾路线分化的开始,而对于张

本人来说则是自身转变的一个起点。今日来看张闻天当时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见解和主张,除了他的务实精神之外,还应该说是和他在此之前用心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分不开的。尽管此时张闻天在整体上尚未能完全摆脱“左”的桎梏,但要看到在党内那种思想状况下,竟敢如此大胆地冲破禁区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其理论勇气可谓难得,意义也相当深远。

## 在陕北提出“新式资本主义”设想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都用过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新资本主义”。最初是张闻天提出的,他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说:“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毛泽东后来也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张闻天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经济”是早在1942年作为一个设想提出来的。此时他已经实际从党的总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他利用这个时间主动深入基层,来到陕北、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两个月的农村调查,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晋陕农村调查。而他上述设想就是在晋西北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中提出的。目前保存下来的调查报告《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和论文《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研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珍贵文献。

兴县地处山西吕梁山区北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这在中国西北地区农村是有代表性的。而张闻天通过自身的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经济“太落后”了。而造成这种落后的经济根源,就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个当时属于晋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农村,抗战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尽管这个地区未曾经过土改,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革命政权的成立,封建势力还是受到了削弱,地主变卖土地和分散土地较多,而少数地主则改为自己经营,成为经营地主。另一方面的变化则是多数农民由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获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不少农户乘地价便宜之机购置土地,中农户

数有所增加,也有少数中农上升为富农。

正是基于上述经济状况的分析,张闻天提出了在革命政权下大力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设想,具体说就是发展富农经济。他认为富农不同于地主靠地租剥削,而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在当时是进步的,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此党的政策不应阻止土地自由买卖,而是引导农民向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发展;对于地主来说,他提出的办法是可以不采用过去土地革命的办法,而是通过党的政策法令,促使地主将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除经营农业外也可以投资工商业。张闻天称这种方式为“和平转变”。

张闻天把以上这种设想称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而且指出这不仅是边区当前的任务,也应是整个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一项长期任务。应当指出的是,这种设想还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种粗略的创意,可是后来批判他为“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他在论述中说得很清楚,他所说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目的就是为“将来社会主义做基础”,而且指出这种“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可以“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二是“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因此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运用列宁“利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只不过是根据旧中国生产力特别落后的国情更加强调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已。只要联想一下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内资外资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宏观调控不也根本上凭的就是张闻天当年提出的这两条么?

张闻天当年所论未必都十分精当,然而贯穿当年张闻天设想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根本标准的思想却是鲜明突出的,他说:“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他还说:“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尤其是他以这个根本标准的独特视

角精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指出：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有过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此令人深思的是，建国后有相当一段时期我党反复强调要“兴无灭资”，甚至提出要叫资本主义迅速在中国“绝种”，其结果资本主义未能消灭得了，而给生产力带来的破坏确实是很糟糕的。然而有意思的是，如今西方某些学者盛赞当前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就恰恰把中国的经济称作“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资本主义”。

## 在东北绘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蓝图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赴东北做地方工作。他当时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45年冬至1950年初，先后在东北北部的合江和南部的辽东两地担任过省委书记，时间长达3年多，此外他还以中共东北局常委的身份，兼管过一个时期东北全区的财经工作。他在东北的整个4年多时间内，为开拓和建设东北根据地，在剿匪、土改、保护和恢复工商业等一系列工作中均做出了突出成绩。

同时这段兼有农村和城市经济工作的丰富实践，却又使得这位具有战略思考习惯的领导者，有条件从宏观上进一步思考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而他在全东北解放前夕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1948年9月），可以说就是以当时东北经济为依据而绘制的一幅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蓝图。这个文件上

报中央后，果然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而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关于建国后经济建设方针，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中的经济纲领，都是吸收了这一个《提纲》的基本思想。这里不来评论《提纲》的历史价值和地位，仅举出体现在《提纲》中，以及形成《提纲》前后表现出的几点至今仍显示其新鲜活力的宝贵思想：

（一）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结构。作为中央文件发布的上述《提纲》提出的是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提纲》原稿还写有存在于当时东北地区的“外资”“苏联”“秋林经济”）事实上早在1934年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已经根据列宁思想提出苏区经济的前途是上述五种经济，因此张闻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多种经济结构设计的先驱。马克思主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回顾我国建国初期经济之所以取得一度繁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应该说就是跟这种适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多种经济结构有关。而当人们一旦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而人为主观地改变这种多种成分结构的时候，生产力就要遭到严重破坏，1958年的教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再来看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天，我国的多种经济状况虽然无论就规模还是种类来说，都已远非建国初期所能相比，然而正是这种多元结构给予我国经济所带来的强大活力却愈加显示在人们面前。

（二）提出了“巩固私有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多种经济结构自然就是包含私有经济成分在内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上述《提纲》成稿的两个月前，张闻天在东北局召开的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次联席会议上有一篇讲话，讲话针对土改后出现的急于要搞集体化的错误倾向强调了要“巩固农民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指出：

应该看到，今天农民的私有财产权，比封建的私有财产权是进了一步的。我们对私有财产应该有历史的观点。奴隶社会有了私有财产，比原始社会进了一步。原始共产社会好是好，但没饭吃饿死人啦！奴隶社会生产力比原始社会提高了，封建社会又比奴隶社会进了一步，今天消灭封建制度后的农民私有财产是更进了一步。所

以，今天巩固农民这种私有财产权，应该说具有进步的意义，破坏这种私有财产权，才是反动的思想。在今天的条件下，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倒退的，破坏性的，是反动的。……今天巩固了私有财产权，将来才会取消私有财产权，这是与共产主义完全吻合的。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

#### 新民主主义社

会须保存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私有制，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建国开始时的共识，而且将其写进了1949年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令人没有料到的是后来那样快地取消私有财产所有权，以至发展到1958年那样狂热地取消几乎包括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内的个人一切所有权的“共产风”。在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曲折之后，通过立法把私有财产所有权重新写进宪法的时候，再来读一读张闻天的这番讲话，不能不为其深刻的见解所折服，它启示于人们的却正是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真理！

（三）提出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性的“供销合作社”。张闻天当时认为这是东北大规模土改后农民的必然要求，指出：“由于封建剥削的消灭、东北的全部解放与工业的发展，农产品必然大量地商品化，农民为了发展生产，必然提出合理解决供销的迫切要求。”因此他认为“今后使农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是先供销合作然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众所周知，我国五十年代合作化的实际发展是沿着“生产合作”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道路进行。今日看来，这是两个不同的



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路数，前者是采用经济的办法，通过商品流通来促进生产，而后者则是比较单一的用行政的手段来提升所有制的公有水平。张闻天的思路同样来源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因为既然在过渡经济中还要保存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农私有经济，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就必然有一个如何沟通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交往，以及如何保护小农免受私商盘剥的问题，为此列宁便提出建立合作社的办法。而列宁所提出的合作社正是商业性的合作社，至于建立生产合作的农业集体化，列宁则明确认为必须是在有了机械化的物质条件之后。而这里列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正如张闻天所说的是注重“商品流通沟通城乡联系、巩固工农联盟的纽带”。

现在看来我国实际推行的合作化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列宁当年所设想的这个商品流通大发展的阶段，张闻天所提出的供销合作社自然也就没有能得到重视、获得广泛发展。但是人们只要回想一下建国之初，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后的个体生产积极性是相当高的，当时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城乡经济的一度繁荣可以说都与亿万农民这种积极性的释放有关。由此可以想象，如果在供销合作社的支持和保护下让这种积极

性再进一步获得一个较长时期的释放,商品流通获得一个更大的发展,五十年代的经济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历史固然不能假设,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总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当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目标的时候,恰恰是建立与市场联系的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话题却又在一些地区被重新提了出来。

(四)积极主张扩大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对外经济交往。张闻天的这方面主张是随着东北以至全国解放进程而逐步提出来的。前面说过,1948年9月东北解放前夕,他在所写那篇《提纲》原稿所列举的经济成分中,就已经提出了利用外资问题。及至东北全境解放后,1949年6月他在中共辽东省委一次干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建设资金问题时则说,将来筹措资金也可以借外债,可以向苏联借,“也可以向美国借,但是要平等互惠”。到了建国前夕,1949年7月他在省委机关干部学校一次亲自讲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问题”时,就进一步讲到东北要“开展对外贸易”、“要打通东北地区的出海通道”;接着同月就同时任辽东省主席刘澜波一起,带领省委机关主管经济工作的干部,到地处辽东省出海口的营口市鲅鱼圈和安东县大东沟实地考察营口建港问题,他对干部们说:我们辽东发展经济有个优越条件,营口过去是东方贸易大港。经过这次考察和调查,他认为在鲅鱼圈建立港口,具有天然条件,积极主张修复港口。随后他又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根据营口市委的汇报,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地区打交道的原则。一位当时听过张闻天这次讲话的同志回忆说:“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他(指张闻天)讲了许多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语重心长地提示干部,在和资本家打交道的过程中,在工作和个人关系上应当注意的问题。”

## 建国后:从质疑、反思到理论探新

实践表明,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不是成功的模式,而我国建国后的经济在一段相当时期内应该说基本上照搬了这种高度集中的、排除市场、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

模式。而对这种并不成功的模式,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还不可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从根本上的觉悟,这一点张闻天也不例外。但是由于他对列宁新经济政策领略较深,加之经济学的功底和不断探索求新的精神,他在建国后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亮点。

(一)五十年代初就曾对苏联经济从其理论指导上提出过质疑。1950年张闻天调到中央从事外交工作。1951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后,苏联经济建设问题便成为他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上任后的第二年他就亲自到苏联中亚地区四个加盟共和国进行对农业和集体农庄的调查。此时又正逢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不久张闻天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调查,结合了对这本书的评价,曾对当时赴苏访问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发表了一番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对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而对斯大林不重视商品经济和排斥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的作用直接提出了批评。

他说,现在苏联流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但是认识和运用这个法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他又说,列宁提出计划经济时是以全民统计为前提的。这种全民统计至少在现在也很难做到,而且需要指经济生活的需求——笔者)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他同时谈了对斯大林新著的看法:斯大林这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但是从斯大林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肯定只是针对那种主张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而他自己并非非常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至于价值法则,斯大林更是断然否定这个法则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着生产的调节者作用。接着他说,现在苏联集体农庄的产品价格多年不变;集体农庄的生产规模由国家决定,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均为国家所有。这样的规定太死了,这肯定会挫伤集体农庄经营的积极性,也会造成国家的沉重负担。但斯大林没有发现这有什么不对,反而把希望寄托在集体农庄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产品交换代替商品交换。

他五十多年前的这番话,现在来看非常难得的一点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触及到了苏联经济

畸形发展（工业发达，农业轻工业落后）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没有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又对苏联状况有深刻的洞察，是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可惜的是将近十年的繁忙外交事务没有能使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二）1962年在反思1958年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开放市场的建议。众所周知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因为批评“大跃进”错误而遭到批判，并为此被罢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此后被安排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1962年中共中央为“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就在中央领导人都忙于各项政策调整，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大跃进”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的时候，而被毛泽东打入另册的张闻天却独辟蹊径，从根本方针上进行思考，将1958年错误同苏俄初期一段历史联系起来进行反思，重温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诉求市场来探索新的出路。

这一年4月，他从北京出发，携带几本《列宁全集》到南方进行调研，调查的重点是刚恢复的集市贸易市场，他一路调查，一路研读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阅读过程中他在书上写了不少自己与列宁思想相通以至共鸣的批注。例如在读到一处列宁谈论过去错误的教训时，他在旁注中写道：“根本的错误就在于根据昨天的经验来解决经济任务”，而“经济工作不能像政治军事工作那样能迅速达到目的，它不能凭一时的热情前进，也不能跃进，计算时期不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而是以几十年计算。”而当读到列宁另一段论述：“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

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一定会遭到毁灭。”张闻天不但在列宁这段话下面打了横杠，而且感慨地在旁边写了五个字：“说得太好了!!!”这里连续加了三个惊叹号。而从整个这些批注可以看出他这次调查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想借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把利用市场，搞活流通领域作为调整当时中国经济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来。

调查结束后，他终于根据调查的情况正式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意见核心的一点是建议中央有计划地扩大集市贸易，使之“成为全国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向农民宣布完成交售任务后在集市自由出卖粮棉农副产品；而且提出应允许个体商贩加入突破本地区范围的商品流通。报告写成后他在研究所内部宣读并说明这份报告稿时，更是明确指出在扩大流通渠道方面可以允许“私商搞些长途贩运”。而且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行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有点类似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余粮全都收来了。今后我们也要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用粮食税和自由收购相结合的办法来代替现行的粮食征购制度。”而当有的同志当场说他这套主张是“实行自由化”时，一向温和的张闻天不禁一时激动起来争辩说：“现在建国已经

1962年7月12日

最近两个月，我写了几篇东西（给毛泽东看的东西，如《庐山会议后》，《新到世界书》，《经济工作不能像政治军事工作那样能迅速达到目的》等），中央大都已阅过，并已解交正在北京工作的同志看。只是对于经济工作，特别是对于工业（如《工业》）这问题，我仍有些想法。从新的材料中，这个间题现在很重要。虽然，对这个间题，我从中央总的方针中，看到中央已经很重视，也已经采取了许多好的办法，但是就思想说，我的想

想，由于我掌握的材料不多，我对于经济工作的实际工作，特别是对这个间题，没有作过研究，所以我的看法和想法，总是比较肤浅的，其中一定会有错误，但既然有些意见，就不妨写出来供领导中央的参考，并希得到领导中央的指示。

张闻天  
(1962年7月12日)

张闻天1962年在向中央送交《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时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到所之前,所长孙冶方发表了一篇《论价值》的论文,就是在价值问题上同包括上述这种极左观点在内“左”的思潮进行争辩的。他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很赞同孙的观点,并感慨地写下了一篇笔记《读孙冶方同志的论价值》。他在这

十几年了,还要画地为牢,是不应该的。实行我这个办法,是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的,但只要因势利导,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解决不了,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本事。”

对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是,1958年后旧有的市场体系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而任何私商的活动也都被视为绝对的禁忌。张闻天的这份意见书尽管不可避免地还带有当时的历史局限,但应该看作它是在六十年代全国原有市场体系基本消失后,最早提出的一份要求利用市场机制并恢复私有经济的重大政策改革的建议书。

(三)1963年写出在经济学理论上重大突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论文。上述意见书的提出,可贵不仅在于坚持运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且是伴随着新的理论探索。1958年“大跃进”掀起之后,国内学术领域各种极左思潮泛滥。当张闻天1960年冬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时,经济学界正流行一种思潮,认为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经济学范畴全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则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应该是全新的经济学,应该创新,创造一套新的经济学范畴,甚至连“工资”这样的范畴,也要改为“劳动收入”等等。在张闻天

这篇笔记中就直接谈到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然而,“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

由此令人联想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文坛出现过一个叫“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认为过去所有的文化全都属于剥削阶级的旧文化,主张要创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前面所说的那种“大跃进”后中国出现的经济学极左主张,也应该说同当年俄国的极左派同属一个思潮派别。自然抱有这种主张的当时是少数,多数是张闻天所说的思想上“有顾虑”。但是这种极左主张却引发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究竟有无共同性的问题。张闻天这里明确指出了它们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就在于都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是对当时人们“左”的观念的一个突破,没有观念上的这个突破,就不可能提出任何利用市场的建议。然而在他的意见书送上去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

会召开,大批“翻案风”,彭、张等人均被立案审查,张的意见书更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可是就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张闻天也并没有停止理论探索的步伐,终于在已有思想突破的基础上,于1963年写成一篇如今已为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充分证明,确为重大理论突破的论文《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

文章将社会生产关系明确分为“直接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体现“所有关系”的生产关系这样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任何社会“人们为了进行生产,依照生产技术(即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情况和需要而形成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关系”,而后者则是指不同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产品归不同所有者所有而言。前者表现的特点是,不同社会之间前后的“继承性”,并随着技术的改进而不断变化的“灵活性”;后者则往往是一种“所有”代替另一种“所有”而非“继承性”,而当一种“所有”确立以后,则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不易改变。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规律,即表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对立统一的规律。”而且认为必须联系上层建筑来研究。

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这番辩证的论述意义非同小可,尤其是其对“直接表现生产力”的这一方面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和它的特点的论述,是对斯大林错误理论的一个突破。一个长时期内苏联所奉行的斯大林经济理论就是脱离生产力而谈生产关系的,同时又把生产关系简单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也就把直接表现生产力的这一方面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生产关系之外,实际也就排除了生产关系在各不同社会之间客观存在“继承性”的方面。苏联经济生活中排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造成的长期封闭性,其理论根源即在于此。同时又由于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是看成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矛盾,错误地得出把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即不断提升所有制的公有水平,视为推动生产力前进的唯一途径,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畸形和长期的滞后,应该说这乃是苏联这座大厦最终崩塌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过去一段长时期在经济建设模式上

为何始终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究其原因首先的一条,就是我们在经济理论上始终未能摆脱斯大林的封闭的经济理论。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那样热衷于追求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升级,以至跃进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主导这种实践的理论,其实归根到底依旧是斯大林所一直奉行的改变生产关系就能“解放生产力”的理论,不过是更加发挥到极端罢了,故张闻天批评这种理论为“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拜物教”。另一方面,由于理论上根本排斥不同社会之间生产关系存在的“继承性”,而且几乎把所有本来属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性的东西都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异端加以批判。张闻天前面所批评的“画地为牢”,应该说首先是思想套进了这种牢笼,结果使已经遭到破坏的生产力更加走入了死胡同。

历史表明,彻底打破这个牢笼的是邓小平。在一场市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大争论中,是邓小平断言: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而40年前张闻天提出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的论点恰恰同时也得到了今天我国这个新时代实践的验证。10年前我国有两位经济学家高度评价张闻天《关于生产关系两重性》,称它是对生产关系进行的一次全新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而今天再结合这10年来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来看,应该说它不仅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当前人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市场改革方向仍有着现实的意义。

纵观上述张闻天的经济建设思想,可以看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但他不仅传承了列宁的这一思想,而且运用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权力往往压制了真理,以致像张闻天这样的许多真知灼见都只落得一个被视为“修正主义”异端邪说而遭受批判的命运,造成了历史极大的遗憾!

(2006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 纪念邓小平： 坚持理念创新

周瑞金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高度评价了特区几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胆子再大一点”的发展思路

20年前—1987年，他主导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绘制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初步蓝图。

15年前—1992年，在改革开放一片沉寂，“姓社姓资”争论骤兴之际，他毅然然而南下发表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推动全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大潮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势如破竹，一往无前，使国家面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五年后，在作了最后的政治交代——编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之后，他驾鹤而行……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15周年，也是他逝世10周年。

如果，再往前回溯，一幅有趣的历史机缘映现在我们面前：

60年前—1947年，邓小平与刘伯承挥师挺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两年后，中国共产党打败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

40年前—1967年，“一月革命风暴”肆虐，邓小平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作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打倒、批斗，由此酿成十年内乱，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30年前—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他特有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批判“凡是派”，主导教育、科技战线拨乱反正，恢复高校招生，催发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潮。

这就是邓小平！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建立了卓著功勋。他又是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创立了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造就了一个改革开放、生气勃勃、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可以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在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江泽民、胡锦涛手中得以初步实现。

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感戴邓小平，学习邓小平，就应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去完成邓小平未竟的中华民族振兴的大业！

15年来，我们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遇到了许多新

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资源消耗和生态恶化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决策存在“暗箱操作”，老百姓维权十分艰难；权力与市场结合产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大案、要案、窝案不断发生，社会正义、公平受到损害；社会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关系商品化，社会风气不好，等等。由此，近年来引发了市场化改革以来第三次大的争论。

在第三次改革争论中，质疑改革的言论汹涌，有的认为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使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成为“三座大山”，造成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有的认为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这样下去会改变社会主义颜色，导致共产党下台。有的抨击市场化改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可能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还有个别“左派”人士，公然把我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指责为“推行私有化”，把我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指责为“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推行自由化”。他们甚至攻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是“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

面对种种对改革的指责，我们重温一下 15 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

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依然是这么亲切，这么深刻，这么有针对性，这么及时、重要、发人深思，真是大音稀声啊！

第三次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也说明，我们不能回避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要勇于创新，积极应对理论上的挑战。15 年前，邓小平同志曾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为了争取时间干，他主张不争论。这是很对的。1992 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正是不搞争论、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干的结果。问题是，不争论没有在思想理论上真正解决问题，到一定时候，它又会冒



1997 年，送别邓小平的场面

出来。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就是如此,因此在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明确表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以后,那些人仍然坚持争论。可见,改革发展到今天,应当坚持理论创新,使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有所突破,这才能统一全党思想,更坚定地打好改革攻坚战。

邓小平的伟大,就在于承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决心创造社会主义新模式,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看待所有制问题,如何看待计划经济,我们需要结合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实践,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要从结构的社会主义观转变到功能的社会主义观上来。去年九月,中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了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研讨会,吴敬琏、高尚全、刘吉、杨启先、王占阳、徐景安等专家学者,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新理论。这是可喜的现象,很值得提倡。

其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也要作科学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有一定理论价值,是我国启动改革的一个理论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设,也为世界经验所证明。我国改革将传统的大一统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人、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当然,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由政府投资、运行和管理公有制企业,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国未来不可能全部私有化是肯定的,但私有制有效率的理论不应被推翻。再如,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是市场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我国目前垄断现象还比较严重,竞争很不充分,信息提供和披露也很不规范,存在许多暗箱、黑箱。要搞市场经济,实现公平竞争,就应当从法规上、制度上、政策上以至观念上朝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化目标努力。此外,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设,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向政治领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个人独立性、选择性、创造力、想象力、责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权利,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这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当然,我国幅员广阔,情况差

别大,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即使如此,保障个人创造力和活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干预,这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第三,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纯粹市场经济”并不是我们的目标。市场经济确实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固有的缺陷。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民众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政治人”,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不过,“经济人”也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经济人”崇尚物的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以及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这样,以物质享受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成为“经济人”的主要价值取向。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从以物为本位转向以人为本位,坚持科学发展,和谐相处,和平崛起,把西方现代化同东方人文精神融合起来,从“经济人”转化为全面自由发展的“和谐人”。这种“和谐人”,是创造物质财富又创造精神财富的人,具有信念又诚实可信的人,具有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人,具有理性精神并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这才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今天,我们依然牢牢记住15年前他在南方谈话中说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责任编辑 萧 徐)

##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与消失

张惠卿

“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寻找一种既不同于苏联,又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尝试,在当时不仅得到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了欧洲以外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共产党的赞同,影响很大。可是这个尝试最终没有成功。大约在1983年以后,这股热潮就逐渐消退下去。“欧共”消失了,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段插曲。

## 形成“欧洲共产主义”的社会背景

多年以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被当作唯一的样板,但许多国家在实践中却处处碰壁。特别是一些具有悠久民主传统和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像西欧各国,始终没有一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尽管大多数已获得合法地位,有的在议会中作为一个大党而存在,有的参了政,在国内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国家究竟通过什么样的革命形式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提出过应当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革命战略,但这些思想从未能取得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情况有了很大不同。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阶级力量对比都相应有了改变。直接影响着国际共运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

在经济上,随着科技革命和先进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普遍高速发展,生产社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人阶级日趋白领化和知识化,新的中间阶层扩大了,出现了一个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包括教授、科学家、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和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西班牙共产党称之为“文化力量”。

在政治上,由于战后西欧垄断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削弱,加上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已无法控制局面,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左翼力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称社会党、工党、工人社会党,下同)的力量则日益增长,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政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有些国家就让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实行改良主义。对共产党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加上极端仇视共产党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相继倒台,这些都在客观上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提供了开展合法斗争和发展力量的有利条件。

在社会思想和生活上,由于欧洲国家的广大人民都经历过两次战争的祸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他们带来的苦难,创巨痛深,



陶里亚蒂

铁托

他们对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和残暴蹂躏记忆犹新。因此，人们普遍憎恶独裁专制，害怕战争暴力，向往民主自由。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上一些国家采取的高工资、高消费、高福利的政策，普遍优裕的物质生活，不可能再产生过去那样的革命形势。这些国家又有着比较完善的民主传统，人民受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较深，因而对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一类概念，“谈虎色变”，避之惟恐不及，而和平的、独立的民主道路则对他们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这些年来，欧洲的许多共产党都开始认识到，不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而“欧洲共产主义”，正是西欧一些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探索和比较研究得出的一个他们认为是可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和模式的共同答案。他们要求在没有外来干涉和控制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探索在和平民主中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 “欧洲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

有人把“欧共”的思想渊源追溯到1872年马克思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一次群众大会上的讲演，

马克思当时说过这样的话：“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们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

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在这篇被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中，恩格斯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提出1848年革命以前少数人革命的形式，筑垒的巷战形式，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他赞扬了议会和选举的效果和作用，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是欧洲共产主义者推崇的思想先驱。早在30年代初期，葛兰西在狱中写的札记和书信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适合于欧洲和意大利的独立思想和主张。他提出由于西欧的上层建筑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沙皇国家，“中欧和西欧各国必须有一个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战略。”工人阶级不仅要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在事先或同时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他认为，在落后的东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不完善，国家就是进攻的目标，可以用正面进攻的革命方法夺取政权，而在比较发达的社会里，进攻的目标则是市民社会，

光夺取国家政权不行，要把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阵地夺过来。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方面的工作，把人民的多数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才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长期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过程中，是最早提出反对国际共运“世界中心”的思想的。他不同意有什么“统一领导”的指导党，主张各党之间应该发展平等互助的关系；他否定苏联模式，主张各党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他提出了“结构改革”的思想，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用改革内部结构的方法，通过和平、民主走向社会主义，不必诉诸武力打碎国家机器。他主张阶级联盟，要求广泛加强和扩大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力量、民主力量的团结。陶里亚蒂的“独立自主”、“结构改革”和“广泛联盟”的政治主张是意共长期贯彻执行的基本路线，也是“欧洲共产主义”理论、战略的思想基础。

战后时期，想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并力图摆脱苏联“指挥棒”走独立发展道路的思想，不仅在西欧各党普遍存在，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1945年12月波兰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华沙声称：“在人民民主政权下，社会变革可以通过演变道路进行，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可以通过同样的道路完成。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使人民民主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1946年2月季米特洛夫在索非亚的一次讲话中说：“各个民族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不会走预先规定的道路，不会走像苏联一样的道路，而是各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这种方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又说：“寻找我们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安东·阿克曼在《统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有没有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德国道路》，他在文中肯定了和平的社会主义道路，声称“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殷切地希望避免新的战争和新的流血……德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俄国和苏联的道路。”南斯拉夫则在关于走独立道路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南共领导人吉拉斯说：“要让各国人民都按同一方式、同一处方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想法的荒谬程度不亚于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兵营，而各国人民都得在其中平行列队。”

而当时斯大林却要把东欧国家更紧密地控制起来。1947年9月成立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就是为了在组织上监控他们。为便于制服南斯拉夫，他有意把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1948年2月，斯大林威逼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合并，结成一个联邦，遭到南斯拉夫的断然拒绝。斯大林一直想把东欧国家纳入到苏联的体系之内，决定分两个阶段实施：先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一个联邦，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组成另一个联邦，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组成第三个联邦，然后这些联邦，即三个新的国家单位同苏联合在一起，成为苏维埃联盟的一部分。由于南斯拉夫的坚决抵制，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无法实现。因而恼怒之极，先对南实行经济制裁，6月间又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日丹诺夫当时宣布：“我们有材料表明，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接着在东欧，也包括在西欧一些党内进行了大清洗，并发动了大规模批判和谴责南斯拉夫独立道路的运动。从此以后，只要一提到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被认为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反革命行为。苏联对各国的控制和高压空前加强了。

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没有被压垮、被征服，他们在几乎来自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攻击声中，坚定地宣布了三项原则：一、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一律平等，反对任何一个领导中心；二、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律平等；三、根据自己的传统以及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有关国家都有权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南共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自治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这些思想和行动，受到了欧洲共产主义者的高度赞扬，认为是奠定“欧洲共产主义”的基石。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领导全国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在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取得了革命胜利，开创了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这对向往走独立道路的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差不多与此同时，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失败了。这也促使欧洲共产党人进一步思考：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各国是不是应该走不同的革命道路。

##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过程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1955年赫鲁晓夫到贝尔格莱德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公开承认错误,苏南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不仅承认通向社会主义存在不同的道路,同时也承认存在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潮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不安,它不仅证明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缺陷,而苏联这个“神圣的模式”本身也在世界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破产了。

同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告解散。6月,陶里亚蒂发表了著名的“多中心论”的声明,他第一次把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联系,指出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也不允许具有约束性了”;“现在正在形成‘多中心体系’,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再也谈不上有一个统一领导了”。他还说:“除非改变对克里姆林宫奴颜婢膝的服从,否则西欧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灭亡。”

当时在一些国家和共产党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解冻”气氛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由思想的浪潮到处激荡。这年夏秋,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事件,情况极为复杂。苏联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把这一浪潮压制了下去。一贯坚持民主改革、反对苏联控制、深受人民爱戴的匈牙利总理纳吉·伊姆雷被处死。

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受到大多数欧洲共产党人的重视和欢迎。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这年4月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行动纲领,经捷共中央全会通过,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中心是要“建立一个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这种具有感染力的新思想,在东欧国家,乃至苏联国内大有蔓延之势,使苏联领导集团极为担心也相当恼火,终于在8月悍然武装入侵,用暴力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苏联侵捷的丑恶行径,彻底暴露了它的霸主的狰狞面目,激起了欧洲及其他地区许多共产党的强烈反对。意共、法共和西共发起,动员了西欧

十七个党对苏共施加强大压力,力图阻止对捷的干涉。实际上也是这三个党作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倡导者联合抗苏的行动。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60年代后期,也逐渐倾向这一新的潮流,积极支持西欧这些党的正义行动。

70年代以来,一些具有类似观点和倾向的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相互接近,加强了联系和合作。他们通过双边会谈和其他的形式,不断交换意见,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想法和主张。例如,西共代表团和瑞典左翼党领导人的会晤;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共代表团和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的会晤;齐奥塞斯库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领导人的会晤;意共总书记贝林格和英共领导人的会晤;贝林格又同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的会晤等等。一些党和南共联盟的接触就更多了。南共联盟天然就是“欧共”的积极和有利的支持者。

很自然地,大家感到需要有一个名称来概括和代表这一个新的思想,但一直找不到恰当的用语。曾经有人用“自治主义”或“改良共产主义”来称呼它,都没有被接受。

1975年在西欧报刊上出现了“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这个词,立刻被意共和西共首先采纳了,尽管它仍然不太确切,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共产党都赞同这种主张,而欧洲以外却有一些党赞同,如日共、澳共等。不过主要在欧洲产生的这个新思潮,这个用语还是比较恰当,也比较响亮。这年7月,西共和意共的领导人会谈,会后发表了《西班牙——意大利共产党宣言》,宣称“两党在一切纲领性的主要之点上意见一致”,同时正式把“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确定下来。接着南共联盟和其他几个党也都确认了它。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认为:“这个名称肯定反映不出这一运动的更深刻的意义,但至少大致地指明了其所由产生的时间和地域的历史条件。”

“欧洲共产主义”就这样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出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 “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欧共”各党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共同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不承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领导中心”或“领导党”，主张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反对必须遵守一个共同的总路线，主张“多样化中求统一”；反对忠于苏联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二、主张通过民主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认为十月革命式的道路并不是到处都适用，各国走向社会主义应有多种形式，具有民主传统的发达国家可以不搞暴力革命，而应充分利用现有的民主制度，通过议会选举，同时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相结合，依靠人民的大多数来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三、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认为“列宁主义”这个概念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和苏联的作家为了“适应当时苏联党内派别斗争的需要”而把苏共的领导权强加给国际共运”而制造出来的，承认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重大发展，但认为他的许多论点已经过时，再说“列宁主义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恰当的。

四、承认党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但强调它的民主性和群众性，认为党是“新型的群众性的党”，不再提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应对不同世界观的人开放，取消无神论的要求，允许教徒入党。在组织原则上，一般同意民主集中制，但反对苏联式的“民主集中制”，因为它实际上是官僚集权制。认为自己并不是国内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承认社会民主党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并在同其他政党联盟中，不要求“领导地位”，而把自己看成是同其他政党和派别平等的伙伴。

五、主张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但不赞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同暴力、一党制、独裁的概念相联系的，不符合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因为“无产阶级”是指工人或工人阶级的内核，并不代表整个工人阶级，更不代表全体劳动者；“专政”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等法西斯制度，是对民主的否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论从“无产阶级”的概念来说，还是从“专政”的概念来说都是不恰当的。

六、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主张采取民主

社会主义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民主自由权利，司法独立，全体公民通过普选定期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允许反对党有存在和活动的权利，如果在选举中反对党获得多数票，共产党遭到失败，也必须尊重人民的投票结果，放弃执政地位，更换政府，同时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以便东山再起。因为共产党不是国家的化身，而是社会和国家的一部分，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党政必须分开，一个党政不分的党如同政教不分的教会一样荒唐。

七、在对外关系上，坚持反对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武力威胁、武装冲突，主张谈判、政治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国际军事集团的对抗，主张对话和合作，赞成不结盟运动。他们把和平的国际环境看作是本国探索在民主自由中走上社会主义的前提。主张与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建立国际新秩序。

在对我国的关系上，他们的态度始终是友好的，这些年来不少党都先后同我党恢复并发展了两党关系。

贝林格说过：“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系列的立场，目的在于寻找一条适合欧洲这一部分特定条件、历史和传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卡里略也声明：“我们主张的解决办法无疑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只适用于我国和发展程度相似或更高的其他国家。”

## “欧共”党和社会民主党

1977年3月，西共、意共和法共的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发表了“在民主和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联合声明。在此前后，这三个党又分别与荷共、英共、瑞典左翼党、圣马力诺共产党、比共等观点比较接近的欧洲共产党，以及南共联盟、罗共等独立自主思想比较明确的执政共产党，加强了联系和合作。到1978年4月西共“九大”，1979年3月意共“十五大”，1979年5月法共“二十三大”，都将“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写进了党纲或代表大会文件中。

在欧洲，当时属于“欧共”或基本倾向于“欧共”的党，除了意共、西共和法共以外，还有英国共

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瑞士劳动党、圣马力诺共产党、瑞典左翼党、芬兰共产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冰岛统一社会党等。亚洲有日本共产党,不过日共并不把自己纳入“欧共”党的范围,认为他们是根据自身的条件独立得出的结论。大洋洲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拉丁美洲有墨西哥共产党和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等。此外,东欧各国和苏联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也持有“欧共”的立场和观点。

从表面看,“欧共”党和社会民主党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前者主张力争在民主中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而后者也提出用和平的方式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两个党在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及对外关系方面,观点都很相近。而在历史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本来是同一个党,是后来分裂出去的。因此,很多人就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或者说是在向社会民主化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欧共”党的领导人一再作出声明,认为决不能把“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他们同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合作理论是有原则区别的。“欧共”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只是改善它,“变革”的目的是要“取代”;“改善”的目的则是“维护”。

但是不能否认,二战结束这30多年来,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北欧各国已经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相当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有的早已是执政党,有的是联合政府中的重要成员,在提高工人地位、改善公众的福利待遇和物质条件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也致力于社会内部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这种改革主要是铲除资本主义一些过分恶劣的弊端,并不触动社会制度本身。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以精神自由、政治自由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并强调建立这个社会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和发展。他们不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意味着独裁和极权,民主社会主义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而“欧共”党所提倡的在民主中走上社会主义,是要通过民主的方式,亦即和平变革的途径用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共产主

义是“欧共”最终奋斗的目标。

但是多年来的实践出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些国家里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固然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而同时又确实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并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可是“欧共”的共产党的处境却很不同,他们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去利用其有利的一面,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下严重脱离了实际,在工人群众中越来越缺乏影响力。

更主要的是,欧洲这些共产党过去长期从属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实际是在苏联的控制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这些年来,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专制政权一直使西欧各国人民深恶痛绝,而这些党却始终未能从苏联的阴影下摆脱出来,使广大群众对他们敬而远之。这是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产生不同命运的另一个根源。因此,他们也必须改弦更张,以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 “欧洲共产主义”的遭遇和结局

“欧洲共产主义”一出现,就立即引起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它首先使西方世界疑惧和不安。美国和西方舆论界,特别是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把它看作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怪物”;是在欧洲游荡的新的“共产主义幽灵”,认定它是共产党人玩弄的大骗局、“一个特洛伊木马”。美国总统福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欧文等人都大声疾呼,警告大家要谨防“欧洲共产主义的阴谋”。他们说,它是“戴着假面具的斯大林主义”;“想以标榜的方式比较容易地上台,但只要一旦进入政府,就会原形毕露,建立起东欧式的专政,这等于让披着羊皮的狼钻进资本主义的民主堡垒,从而摧毁自由世界。”他们认为“这种打着民主招牌、貌似温和,还似带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比叫喊暴力革命、实行专政的共产主义对西方世界具有更大的威胁性和危害性。”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那么要不了多久,共产主义这个“一党统治的裹尸布”就将覆盖欧洲大陆。前卢森堡首相加斯顿·索恩说:“什么欧洲共产主义,我只晓得一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终究是共产党人,他们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的。”

更加激烈的攻击更来自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斥责“欧共”背叛了十月革命,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公然分裂和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同社会民主党同流合污。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暗中策划的阴谋。不过东欧各国的态度有所不同,坚决反对的是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干脆把“欧共”称作是“赤裸裸的修正主义”。波兰和匈牙利则比较缓和,卡达尔甚至还说过:“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道路。”

当时的苏联除了肆意攻击外,还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党进行颠覆破坏,一面在经济上施加压力,同时在组织上分化瓦解,特别是利用这些党内的亲苏派搞分裂活动,制造事端,不少党都分成“欧式”和“苏式”两派,争论不休。

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正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经过一度疑虑以后,都倾向于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是可以有条件接受的东西”;他们分析“欧共”党“以不同的形式放弃那些属于钢铁一般不可分割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组成部分的政治口号”;这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欧共”越来越多地接近民主原则,同时力图摆脱苏联共产党集权的教条主义,这正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强大的标志。

稍后几年,大约从1977年以后,西方舆论对“欧共”的看法有所改变,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就与前任福特和基辛格不同,认为:“‘欧共’给苏联和东欧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对北约的威胁”。他们发觉“欧洲共产主义”可能是一个值得欢迎的改良过程,因为“它对东方的官僚独裁制度比对西方的议会制度具有大得多的危险性。”一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红色共产党变成了白色共产党,这是大好事。”

那些年,国际上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评论,可说是纷至沓来,铺天盖地,但出于各自的立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欧共”各党之间,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状况、所处环境和经历等等的不同,存在很多差异,“欧共”党的一些领导人对“欧共”概念所作的解释,往往也不太一致,令人一时难以捉摸和接受。

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对“欧共”的特点和这几

年的遭遇作过这样的生动描述:“欧洲共产主义都大概能称得上‘民主的共产主义者’:就传统、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而言,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从他们公布的目标和从他们的努力能在民主工业化国家中起作用这点上来看,他们是民主的。他们遭到苏联型的共产党人的攻击并不偶然,因为他们太民主了,而遭到民主国家的某些政治力量的攻击也不偶然,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共产主义者。”

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欧洲共产主义”始终未能摆脱这种矛盾的困扰。人们宁愿信奉已站稳脚跟并给他们带来实际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愿相信这个新出现的即使是相当温和的“共产主义”。这就注定了“欧洲共产主义”昙花一现的结局。

法共最先放弃了这个名称,马歇说:“‘欧共’这个名词像一件太紧的衣服,已经不合身了。”意共后来也改用“第三条道路”来代替“欧共”的提法。西共则因苏联在他们党内制造了分裂活动,元气大伤,在西班牙大选中遭到惨败,卡里略被迫辞职,其他共产党也先后放弃了使用“欧共”的名称。这个风行一时的新思潮就这样慢慢消退了,消失了。

因为这些党发现,并不是“欧共”的原则和主张错了,“欧共”思想仍然是他们必须继续遵循的行动纲领,只是这个名词已造成了误解,不合时宜了。“共产主义”在欧洲人民眼中已成了一个贬词,甚至是个可怕的字眼,一提到“共产主义”,就会使人们联想到“法西斯专政”。因此他们不得不纷纷放弃“欧洲共产主义”这个名称。

卡里略在我国北京大学作讲演时曾说过:“‘欧洲共产主义’,简言之,就是要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适用于本国的实际。”这是“欧共”思想的灵魂或内核,尽管外壳消失了,但它的内核并没有发生变化。

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的巨变,震撼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它表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遭到了失败,已不复存在了。欧洲这些共产党的处境更为艰难了,但同时也说明他们早就选择的摆脱苏联控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前社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 于右任《望大陆》的家国情怀

白云涛

2006年11月25日至26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美国等70余名学者畅所欲言，就于右任先生的书法、生平、业绩等问题，进行了紧张而热烈的交流和研讨。其中，对于右任《望大陆》遗歌的两个不同版本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同时，会议中所反映出来的有关于老晚年的家国之痛和民族之忧，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望大陆》遗歌内涵，提供了新的意义。

## 《望大陆》遗歌的两个版本问题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先生病逝台湾荣民总医院。直到逝世，于老仍然没有留下遗嘱。在于老弥留之际，于老的亲友僚属李嗣聪、刘延涛、王文光、陈肇英、李崇实、程沧波，以及于老长子于望德等，会同启阅于老自用保密柜。众人期望能在保密柜中检出于老遗嘱。不料开柜之后，柜中多为于老生前日记书笱，以及为三子于中令赴美留学筹集旅费给他人所出的借据，此外并无任何贵重物品和财产契券。虽然没有寻出于老遗嘱，但众人却有一重要发现，在日记中发现于老1962年留有遗歌词一首。1962年1月24日，于老身体不适，病中用硬笔作此遗歌。歌词是：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此为日记原文，其中没有题目。有人说是诗歌，有人说是代为遗嘱。从以前于老的日记看，实

际上是可代遗嘱的哀歌。后台湾发表时，加上《国殇》标题，《人民日报》发表时改为《望大陆》标题。但台湾中央社在发表时，末句“山之上，国有殇”误为“山之上，有国殇”。不久，又出现于老用毛笔书写的《望大陆》遗歌，并在有关媒体上发表。毛笔所书《望大陆》，有于老的印鉴，没有于老的署名，也没有书写日期，但书法字迹与于老一般无二。许多学者和书者都认为，于老用硬笔在日记本上写下《望大陆》后，不久又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一个条幅。与用硬笔书写在日记上遗歌不同的是，日记中的第二段“望我大陆”变成了第一段，第一段的“望我故乡”变成了第二段，末句中的“山之上，国有殇”，和台湾中央社发表的一样，变成了“山之上，有国殇”。这样，《望大陆》遗歌就出现了于老用硬笔和毛笔书写的末句不同的两个版本。

1997年11月10日，于右任纪念馆在于老的故乡陕西省三原县开馆，展出了毛笔所书《望大陆》遗歌条幅的影印的巨幅照片，展品说明该遗歌为于老所书。此后各地数次展览，以及出版的各种版本有关于老书法画册，也大多采用毛笔所书版本，并署名为于老所书。

2003年3月18日，温家宝同志当选总理后，在举行的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提问“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他讲：“说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地想起了一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在他临终前写过的一首哀歌”，温总理背诵了于老的遗歌。对此，海内外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于老的《望大陆》遗歌在海内外传诵更广。

2004年，陕西省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于老侄孙女于媛，与台湾陕西同乡会总干事、于老的老部下张佐鹏取得联系，说服张老先生将

珍藏的于老《望大陆》日记手迹在内地公开展出。11月28日,张老先生携带该手迹抵京。30日,该手迹和于老的其他书法作品一起,以“纪念于右任先生著名爱国诗作《望大陆》发表40周年暨于右任先生书法真迹展”为展名,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展出。统战部、国台办、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全国台联等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规格高,海内外来宾多,再加上首次展出《望大陆》真迹,同时展出《望大陆》条幅影印巨幅照片,海内外媒体极为关注,引起很大轰动,使《望大陆》遗歌流传更广。此次在复旦大学召开“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博物馆的于右任书法陈列馆,也展出了《望大陆》条幅的影印巨幅照片,展品说明中也是说该遗歌为于老所书。

对于于老毛笔所书《望大陆》,两岸三地不少学者一直存有疑问。一是上无于老的署名,也无书写日期。二是如果确为于老所书,于老不会书成两个版本而长期不为人知,且于老不会只盖印鉴不署名。三是1962年于老已经八十有四,体弱多病,书写已较吃力,即便书写,也很难书此流畅有力。四是从所书条幅看,与于老书写习惯颇有不同。对于所盖印鉴,不少学者和书者,也有疑义。有鉴于此,不少学者和书者疑为研习于老书法者所书。然而,遍询台港两地研习于老书法诸人,皆不得而知。于是,有学者怀疑是于老的日本弟子所书,尤其可能是日本的长期敬仰于老,得到于老草书真传的金泽子卿所书,但是否为其所书,长期以来未得证实。

金泽子卿,1924年生,15岁时立志成为书法家。1958年,已经修习于老草书多年,对书法已经具有相当成就的金泽子卿,经于老好友、台湾著名书法家李普同介绍,拜仰慕已久的于老为师,成为于老唯一的日本籍门徒。金泽子卿成为于老门徒后,直至1964年于老逝世,六年中,如虔诚信徒般研习于老草书。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金泽子卿书写于体草书,特别是书写于老制定和倡导的“标准草书”,颇具于老神韵。作为于老门徒,金泽子卿还在日本成立“日本标准草书研究会”,自任会长,普及、推广和宣传于老的“标准草书”,并多次组织标准草书访问团等代表团,赴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进行访问交流,展出书法作品。其中从1988年到2002年,金泽子卿及其门徒与中国

内地进行于老书法的展览交流达八九次之多。1992年,于老家乡陕西三原县筹备成立“于右任纪念馆”,金泽子卿还募集625万日元,派弟子天田研石等飞抵三原,将捐款交付于右任纪念馆筹备委员会。

此次在复旦大学召开“首届于右任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82岁高龄的金泽子卿因身体欠佳,未能参会,其弟子天田研石率13名“日本于右任书法学会”会员与会,参与交流。会上,天田研石作了“草圣于右任先生和我的老师金泽子卿先生——日中书法交流之轨迹”的演讲。本文上述关于于老与金泽子卿的师徒交往,以及金泽子卿和门徒与中国的书法交流等有关内容,即是根据天田研石文整理而成,转来介绍,不敢掠美,特此声明。

研讨过程中,主持研讨的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林业强教授提出,关于于老毛笔所书《望大陆》,不少同仁疑为日本方面所书,请日本朋友给予明确答复。翻译将林先生之语译给台下的天田



于老夫人和女儿于芝秀(屈武夫人)

研石。天田研石站起回答：大家所见之毛笔所书于老《望大陆》条幅，非于老所书，为老师金泽子卿所书，这是事实。与会代表询问：金之所书，是在何时？为何不署名？天田研石回答：老师所书是在于老逝世不久，具体时间不清。天田研石并言：我们返国后，将与金泽子卿师商讨，就所书于老《望大陆》事，包括所书时间和为何没有署名等问题，会有一个明确的声明。

天田研石的回答，澄清了长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个疑团，为此次研讨会一大成果。有的代表表示，要感谢日本朋友，解决了这个长久悬而未决的问题。

## 于老与老夫人裂腹恸心的悲烈之情是对《望大陆》亲情内涵的绝好诠释

于老的侄孙女于媛在会上交流时讲了下面一段话：1949年11月于老被裹挟离开大陆赴台时，我大婆（指于老元配夫人高仲林）本来是同去的，于老说你们不要去了，过一两年我就回来了。但没想到于老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诀。忘记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大婆坐在我们于家老宅门前的青石墩上，望着台湾方向，不住地叨念：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久而久之，那块青石墩被大婆的裤子磨得像绸子一样光滑，她不坐时，别人谁也不敢坐了。每次大家围坐在大婆周围，陪着大婆，有的眼里含着泪，有的哭出声，都听着大婆望着台湾方向，不住地念叨：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呀？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你不是说，过一两年就回来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呀？于馆长言及于此，已经哽咽，断断续续，边泣边讲。台下众人，无不动容，热泪盈眶。许多代表，情难自己，把手拭泪。

于馆长讲完不久，年近七十，与于老长子于望德为同事，两人过从甚密，并陪于老进过餐，多次出入于老家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戏剧学主任王士仪教授，眼睛已经哭红，哽咽着被人搀扶上台。王老先生边痛哭边讲道：我听了于媛的讲话，悲从心来，一直在台下痛哭啊！没有想到，于老夫人是那样的等啊！于老啊，大家打开他的保密柜，

里面除了日记，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老夫人亲手做的一双鞋呀！他也惦念着老夫人呀！他的心里苦啊！王老先生边哭边讲，泣不成声，台下众人，不住拭泪。王老讲完走下讲台，坐下后仍然不能平静，悲泣不已，近座众人，眼中含泪，依次上前，紧握其手，不住劝慰王老。

会后当日，笔者与于媛馆长交流，询及于老夫人望台叨念于老，是偶尔之事，还是经常如此。于馆长说：天天如此，老夫人晚年时每天都梳妆整齐，然后坐在那个石头墩上，嘴里不住叨念。我们大家都陪着，围坐在周围。在与于馆长交流的同时，笔者又询及旁坐的王老先生关于于老在保密柜中珍藏鞋一事。提及此事，王老先生立即眼中含泪。他说：那是高老夫人给于老做的布鞋，于老舍不得穿，一直珍藏，睹物思人啊！于媛馆长讲道：于老赴台后，老夫人还经常给于老做鞋，托人辗转香港，送达于老手中。

有关于老与老夫人的哀伤之情，另有许多可述，依笔者所知，补充如下。

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前（4月21日），身在南京的于老，清晨即被裹挟，先至上海，后至广州。结发老妻高仲林与女儿于芝秀按照先前与于老所商，赴重庆等候于老，等候数日不见，再赴成都等候。兵荒马乱之时，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于老急匆匆依约赶到重庆，遍寻老妻不见。11月29日，于老被胁迫登机飞往台北。在飞机上，于老悲愤写下《逾台机中》一诗，“天意抑人意？他乡似故乡。高空莫回首，雷雨袭衡阳。”背井离乡的悲痛和身不由己的苦衷，跃然纸上。

从大陆赴台湾后，随着岁月流逝，越到晚年，于老念妻之情越殷。1956年，77岁高龄的于老在《鸡鸣曲》一诗中写道：“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兴万重，一叶鱼艇冲烟波。”悲戚哀伤之际，恨不得驾一叶轻舟，冲破浩渺无际的烟波，回到祖国大陆，与结发老妻和亲朋故友相见。

1958年，是于老与结发老妻结婚60周年的金婚之年。于老早年所穿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多为结发老妻亲手缝制。被裹挟赴台后，于老一直将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珍藏在身边。金婚前夕，于老从箱中取出结发老妻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鞋袜，抚视良久，睹物思人，写下《忆内子高

仲林》一诗：“两戒河山一枝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一句“白头夫妇白头泪”，道不尽的伤感，言不尽的无奈，读来令人心肝俱痛。

1959年，于老又写了一首《思念内子高仲林》：“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末句“亲见阿婆作艳装”，表明于老可能已经知晓老妻日日梳妆整齐，哀凄心伤地翘首望归之事。上年“白头夫妇白头泪”，于老尚在日间感伤，此次“白头夫妇白头泪”，转入于老夜间梦境。梦境之中，于老夫妇“白头”相见，两老双手互执，颤巍巍哽咽无语，惟有老泪纵横，流之不已。白头阿婆作艳装，凄美之中更增哀伤。此之情，此之景，怎能不令人摧心裂腑，潸然泪下。

1961年3月，章士钊先生由香港回到北京，致信周恩来总理道：“髯翁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妻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髯翁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总理接信后，指示时任革中央常委的屈武先生以于老女婿身份，到西安为于老夫人做八十大寿。屈武向周总理反映，以实际日期计算，于老夫人的寿辰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但按陕西风俗，是可以补寿的。周总理当即指示：陕西既然有此风俗，可以给予老夫人补寿，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而使于先生不安。同时，周总理指示屈武还要带儿子、儿媳和于老在上海的外甥等，同赴西安贺寿。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协助下，在西安书院于家老宅备寿席三桌，为于老夫人祝寿。参加祝寿的，除屈武和儿子屈北大、儿媳汶梅君，以及于老在上海的外甥周伯敏等于老家人外，于老原在西安的亲朋故旧，包括于老的老朋友，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孙蔚如、省工商联主席韩望尘等20余人，也来贺寿。于老夫人非常高兴，再三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事后，80高龄的于老夫人将贺寿照片和自己给予老做的布鞋、布袜、布衣，托人辗转香港，送达台湾，送到于老手中。于老见到老夫人所捎之物，激动不已。

万里高山，隔不断日夜夜的不尽思念；汹涌海峡，阻不住催人泪下的濡沫之情。于老与结发老妻裂腹恸心的悲烈之情，正是对于老《望大陆》遗

歌亲情乡情内涵的绝好诠释。《望大陆》遗歌代表了那一代去台所有人员的心声。也只有既具高尚道德、又有身心感触、兼具诗歌文采、且至情至性的于老，才能写出如此如温总理所言“震撼中华民族”的千古绝唱。

## 家国之痛，民族之忧，是于老《望大陆》遗歌成为震古烁今之绝唱的根本内涵

于右任1949年11月离开大陆赴台湾时，年已七十有余，抵台不久，思乡之情即起。1951年，于老在《生日游草山》中，有“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句。1952年，在所作《再游柑橘示范场》中，有“同人争向中原望，天放晴光亦快哉”句。这两首诗，已经流露出浓烈的思乡之情，但因初来孤岛不久，尚未痛心疾首，悲凉哀凄。

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日夜夜思念结发老妻，梦境中不断“白头夫妇白头泪”的同时，于老的思乡念妻之情一日比一日沉重，叶落归根之意一日比一日情浓，为此常常午夜梦回，热泪湿枕。

1957年《题林家绰写牧羊自传》中的“夜深重读牧羊记，梦绕神州泪两行”，1958年《书钟槐村先生酬恩诗后》的“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1959年《望雨》中的“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1961年《有梦》中的“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白日里深受思乡念妻之苦，黑夜里“梦中游子无穷泪”，不断地伤感，不断地流泪，那是怎样一个辛酸悲苦的晚年啊！

于老一直倡导“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于老设宴欢迎毛泽东，公开支持两党再次合作，和平建国。1949年国共两党北平和谈，于老积极促进，和谈破裂，极为沉痛。同时，于老为自己没有能够来北平参与和谈，趁机留在北平，顿足长叹不已。1949年10月，于老被裹挟至广州，于老本拟在此摆脱裹胁，转赴香港，再寻机飞往北平。因被严密监视，终未成行，并于当年11月底被裹挟赴台。

于老被裹挟赴台后，孤苦生活十几年，日日夜夜经受故乡之思和亲情之念的煎熬，更是力主祖国统一。1958年11月，于老在重题《岁寒三友图》

中书下“破碎山河容再造”一句。“破碎山河”四字吐露了于老内心中对海峡两岸分裂滴血的伤痛，“容再造”三字凝聚了于老内心中对海峡两岸统一真诚的希望。于老还曾书赠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希望蒋经国从中华民族根本大利出发，完成海峡两岸统一大业，以求万世不朽之伟名。于老是多么地希望两岸快快地和平统一啊！

但是，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峙的情况下，于老空有一腔爱国之志。百般无奈之下，一个八旬、有职无权的老人，只有以泪洗面，寄情诗书，远望当归，长歌当哭。

进入1962年，于老已84岁，体弱多病，心中悲苦。于老自知今生已不可能重返大陆，但又怎能割舍得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心中又怎能放得下结发老妻和亲朋故友呢？在于老心中，或许觉得这次过不了这个关了。1月12日，于老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22日，于老又在日记中写道：“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又过了两天，即1月24日，于老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在凌晨写下了那首摧肝裂肺的《望大陆》哀歌，并在日记中注明：“天明作此歌”。

1963年，于老又遭到一次沉重打击。这年9月，吴季玉先生往来港台为于老传递大陆家书的行动被国民党情报机关侦知。吴在赴台时惨遭暗杀，凶手逃往香港。于老闻讯，哀伤过度，卧病在床。蒋介石派蒋经国前往慰问，许诺将凶手引渡回台，予以法办，但结果却不了了之。

此后，于老身体越来越差，终于病重不支，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64年9月，于老逝世前，长期担任“监察院秘书长”的于老老部下杨亮功教授，前往荣民总医院探视。于老头脑清醒，但因喉咙发炎，口不能言。相视许久，杨拉着于老的手问：“院长还有什么话要吩咐？”于老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百思不得其解，请于老用笔书写。于老的手颤抖不已，不能握笔，未能写成。接着，于老又伸出三个指头。当时，于老幼子于中令，正举债赴美留学。杨问：“是不是对三公子放心不下？”于老摇头示意不是。杨更不解，默然良久，只得说：“等您身体好些我再

来”。

这一个指头和三个指头到底何意？后来学者们终于明白，于老的意思是等祖国统一后，把他的灵柩运回故乡陕西三原安葬。于老带着难以瞑目的遗憾，溘然长逝。杨亮功教授也因未能在于老活着的最后一刻，当面向于老承诺此事，致使于老郁郁而终，耿耿于怀地矢志以歿。

对此，跟随于老30年，又是于老研究者之一的台湾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感慨无限。他说：怀乡是人共有的感情，只是右老的感情特别深；统一是中国人共有的愿望，只是右老的愿望特别切。

于老的《望大陆》遗歌，之所以惊天地，泣鬼神，海内外华人，千千万万传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将于老的家国之痛，民族之忧，溶而为一，为两岸人民而泣，为中华民族而歌。

为了完成于老“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遗愿，于老逝世不久，台湾全岛发起募捐，在于老念之又念的玉山——台湾第一高峰，也是我国东南诸省的第一高峰，建造一座连台基共3米高的于老铜像。当年玉山没有索道，山险无路，向上攀岩，异常艰辛，稍一不慎，跌下去就将粉身碎骨。向山顶运输建筑材料的高山族同胞，身背或头顶装满建筑材料的藤篮，双手攀附山壁，将建筑材料一筐一筐地运到主峰峰顶。玉山主峰海拔3997米，加增于老铜像3米，进入世界4000米高峰行列。

于老铜像立于高山之巅，他面向大陆，庄而重之，遥而凝望。脚下海风阵阵，海浪滔滔。一群海鸥，起于海岛，向大陆方向飞去。

或许，于老所期望的祖国统一，就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实现。山之上，不再国有殇。于老，您安息吧！

（本文完成后，曾恭请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王士仪教授、台湾于右任书法研究会陆炳文先生、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于媛馆长、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劲教授、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杨志刚教授、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冠英和季如迅等人阅示，并根据有关意见进行了修改，特此致谢）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馆员）（责任编辑 萧 徐）

#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孙家洲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对它的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出现以来，迄今已经有大约七十多年的时间。其中，前50年的讨论，大体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的体系之下进行的。可以把众多的分歧意见，区分为“三论五说”。三论是：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五说是：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东晋封建说。林甘泉等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就是全面反映这一讨论过程和关键问题的结集之作。而最近2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就是摆脱“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模式，重新审视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如果奴隶社会被否定，古代史分期之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对而言，第一阶段的争论，在社会上引发的关注更为明显；而第二阶段的争论则基本上局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其学术意义之重大或许要在未来才能够充分显示。在这场严肃而又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中，许多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倾注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回顾70年来大讨论的过程，可以说它直接折射出“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贯彻执行。

## “古史分期”之争是“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范文澜、翦伯赞。“战国封建论”的掌门人则是郭沫若。他们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在文化教育界都有相当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作为洞悉沧桑巨变、通达人情世故的大学者，他们互相尊重，没有因为“古史分期”上的不同观点而影响私人交谊。但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在某些场合毕竟会出现如何合作的问题。

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之后，“中国通史陈列”按照何种分期观点来布置，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据曾经长期任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老专家洪廷彦先生回忆，当初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家都很有慎重，因为这是最高级别的历史陈列，带有一定的权威性。一旦确定所依据的理论体系，必然会有利于其学说的传播。而对其它不同观点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讨论的范文澜、翦伯赞两位先生，态度特别通达，主动提议按照“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布展。从而解决了这一棘手的问题。这一陈列体系，一直沿用到20世纪末年，对扩大“战国封建论”的知名度无疑是有作用的。

1961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接受“文科教材会议”委托，撰写《中国史纲要》。作为此书的主编，翦伯赞按照自己的思路，组建了一个由专家学者构成的精练的写作班子。他的《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为《纲要》奠定了基本框架。他的基本思路得到了陆定一、周扬等中宣部领导的全力支持。在“古史分期”上是采用郭沫若的观点，还是坚持范文澜与翦伯赞本人的立场，翦伯赞也曾经表现出犹豫和为难。他表示，古史分期作为学术问题，理应百家争鸣；但编写教材，还是使用统一的表述为好。他甚至准备采用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与国家一级的通史陈列体系相比较，在编写历史教材的过程中，学术观点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更加不容易协调。因为这里不仅有主编人的署名问题，而且对自己并不服膺的学说展开正面论述难免存在障碍，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背景之下，曾有人提议，请中宣部加以决断。当时的领导人表现出提倡百家争鸣的诚意，请学者根据自己的观点著述立说。陆定一明确表示，既然是翦老主编，就可以按照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

来写，这样有利于百家争鸣。他还鼓励翦伯赞：“你都不敢写，谁还敢写！”于是，翦伯赞主编的这部教材，在古代史分期问题上采用了“西周封建论”。同为教育部认定的教材，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并存，实属难得。这实际上成为历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有益尝试。

多年之后，在陆定一经历了“文革”的劫难复出工作之时，他依然把这一开明的决策过程当作实际贯彻“双百”方针的范例来回顾：“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正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教材，对于采用谁的观点有争论。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我把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陆定一还由此引申说，社会科学应该有不同学派的并存，“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提高一个学派。”他认为，这样的蠢事，历史上仅有梵蒂冈教皇、秦始皇、汉武帝干过。（转引自陈清泉《陆定一复出后的五篇文章》，《纵横》2003年第9期）

这样的“内幕”公开之后，人们才得知，当年中宣部尊重学术自由、不以政治权威干预学术争鸣的理性态度，不仅体现出陆定一等人的开明，而且是经过毛主席认可的。在此回顾著名的“双百”方针的提出过程，或许是有益的：早在1951年和1953年，毛主席就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两个口号，当时尚未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它们共同表述为工作方针，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关于“百家争鸣”的内涵，毛主席的解释特别明确：“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之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向党内外公布了“双百”方针。它尽管实际上只是一种口号，但确实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衷心

拥戴。时至今日我们重闻这些论述，也依然感到温馨和亲切。在当时的历史学界，真正自上而下地遵循、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典型事例其实并不太多。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才会把60年代的“古史分期”大讨论中的上述一幕，视为“百家争鸣”的典型案列。

## “古史分期”讨论折射出历史学界的思想自由度

当着“百家争鸣”真正得到尊重和实施时，“古史分期”的讨论，就会得以正常展开；而一旦它成为束之高阁的装饰物，那么包括“古史分期”在内的任何学术问题，都不可能出现讨论的生机。

“魏晋封建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一度很有社会影响，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而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尚钺、何兹全、王仲荦三位先生。但1959年随着尚钺受到批判，“魏晋封建论”明显受到压抑。

尚钺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曾经出任中共满州省委秘书长。不久因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开除出党。新中国建立之后，尚钺的知名度较高，大概与两个因素有关：其一，尚钺1929年在吉林省毓文中学执教时，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学生，就是未来的朝鲜领袖金日成。金日成尊称尚钺是自己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其二，尚钺在50年代的史学贡献，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并为高层领导所知悉。在一次国庆活动中，周恩来总理得知围拢在身边的学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十分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的尚钺老师，论证魏晋封建说，是古代史分期讨论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你们应该引以自豪。”著名文学家苏叔阳，就是当时在场的学生之一。多年之后，苏叔阳对尚钺和韩大成先生联合指导的研究生毛佩琦追忆往事，依然不胜感慨。

20世纪50年代的尚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依托，在探讨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等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讨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在国内引发关注，而且苏联、日本、

波兰都出了译文本。他主持编辑的《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1955年)、《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的片断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1958年)等四部论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他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等



1956年,周恩来与周扬(右一)、范文澜(右二)、翦伯赞交谈

长篇文章,相继在《历史研究》发表。这些不俗的成果,使得尚钺及其学派势头颇盛。

到了1959年,在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中,尚钺被定为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重点批判。他的学术观点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几家有影响的学术刊物,都出了批尚钺的专号;历史研究编辑部将其中的重头文章汇集为《尚钺批判》。此后十余年,尚钺只能作为受批判的对象。在“十年浩劫”期间,尚钺及其眷属受到更为严重的摧残。晚年的尚钺在总算熬到平反之时,在最后一篇文章中如此表达他的胸襟:“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仅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至于谈到多年的学术纷争,他说“我们留给子孙后世的,不应该是鏖战之后的残垣断壁,而应该是一座五彩缤纷的大花园。”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位学者对“百家争鸣”的由衷渴望、殷殷呼吁。

“魏晋封建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何兹全教授。1950年自美国归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至今。何教授的令人景仰之处在于,几十年来不管时局如何变化,都持之以恒地潜心研究,终于成为魏晋封建论的集大成者。在上世纪

50—60年代的多事之秋,何教授做了理性的选择,在自述之作《爱国一书生》中,他以幽默的笔触写到:回国之后自觉地“跟着共产党走,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向共产党“投降”的思想,在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挽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很少受冲击。何教授的理性,应该视之为学术界的幸运。因为这减少了冤狱,保全了一位泰斗。特别是何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现在无疑是代表了魏晋封建论最高水平的重要专著。

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发表了多篇论述魏晋封建论的文章,特别是他1957年出版的专著《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当时是全面论证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作。

对学术问题,学者持不同观点并展开争鸣,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政治运动的背景之下,使某种学术观点受到压抑,就是不正常的形态了。也正因为如此,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战国封建论”学者,在“魏晋封建论”处于低潮时,以“江泉”的笔名发表文章,最早把“魏晋封建论”列为与“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鼎足并立的学说。这说明,真正的学者,是希望在正常的气氛中展

开严肃的学术批评的,因而对论敌才会给予真正的尊重。

至于在“文革”期间,根本谈不上任何正常的学术讨论。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在内的学术权威,都受到了冲击。翦伯赞最为不幸,在经历了多次批判之后,1968年12月18日,绝望无助的翦伯赞与妻子一道服药自尽,以死向黑暗做最后的抗议。1966年5月—6月,范文澜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时正走红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公开指责范文澜,逼迫他做检查。范文澜曾经连续给他所信任的同事写信,请他们“站在敌对方面”对自己“大大抨击”,“愈过头愈好”,原因是:如果自己人“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他还感叹:“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让一位学界泰斗如此诚惶诚恐,几乎接近精神崩溃,文革期间“红色恐怖”之邪恶,由此可见一斑。范文澜要比翦伯赞幸运得多,毛主席适时地出面“保护”了。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活动。毛主席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有了这简单的一句话,范文澜得以避过劫难。当然,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之下,在“分期”问题上,他不得不识趣地三缄其口了。转机似乎又出现了——1968年7月间,毛主席派女儿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身处不安与无奈之中的范文澜,为此而异常兴奋,不顾疾病缠身,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制定计划,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毛主席交付的工作之中。但是,长期以来承受压抑的身体,却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兴奋,范文澜病倒了。他不顾身体并未康复,迫不及待地要出院工作,他向劝阻的亲友述说着毛主席的嘱托,表达着急切的心情,“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结果,在出院的当夜,就因病情恶化而去世了。时为1969年7月29日,距离他的好友翦伯赞被迫自杀不足8个月。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取得了政治支持,但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本人的身心同样遭受摧残。所以,后来他以最直白的语言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既是为了民族灾难的结束,也宣泄了自身重获“解放”的真实感觉。

对于“文革”期间历史学界的概况,杨念群在《中华读书报》上有如下分析:“由于‘战国封建

说’比较符合于当时意识形态构建历史理论的要求,所以被奉为正统,‘魏晋说’自然成为异端,诠释‘战国封建说’的历史著作几乎一统了天下。”这样的分析是否完全可信,或许可以见仁见智,但他道出了人们一种直接的感受。

“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的春风,同样在历史学界呼唤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复苏。“古史分期”的讨论,在沉寂多年之后,再度热烈起来。其中以“魏晋封建论”的复苏,最为引人注目。

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发表在《历史研究》当年12期上的“会议综述”,标题就是《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它甚至可以被视为历史学界思想解放的表现形式之一。

1979年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几乎是最集中的史学话题。《历史研究》分期刊出了一批知名学者的论战文章: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郑昌淦《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兼论商鞅变法的性质及其作用》。尚钺以老病之躯,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还有罗祖基《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发表于《学术月刊》。其它刊物也有类似的文章刊出。而真正代表“战国说”与这股批判浪潮正面交锋的,只有两篇像样的文章: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历史研究》)、田昌五《中国古代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稍后田昌五于1982年出版了《古代社会断代新论》,这是当时捍卫、发展郭沫若“战国封建论”的代表作。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我和同学们在课堂上就感受到了对“战国封建论”的质疑和批评。郑昌淦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他用了多数时间在批判论敌之说。至今我们全班同学都记得,郑先生为了节约课堂板书时间,事先把有关史料抄写成“大字报”的形式,张挂在黑板旁,还揶揄说:我从“红卫兵”那里学来了“大字报”用于教学,大概是“文革”的惟一正面作用了。他说:“战国封建论”者为了论证商代有众多奴隶,把甲骨文中的“众(𠬞)字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他嘲讽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的农民不是也在太阳底下集

体耕作吗?怎么可以把这种劳动场景与奴隶社会相联系呢!”引起的是一片笑声。

1986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古代史分期讨论会”,是在郑昌淦先生的筹划之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北戴河休养所召开的。参与筹备工作的有北京大学的俞伟超(后调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常征等人,均为持魏晋封建论的学者。郑昌淦先生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就是以倡导学术自由、反对“一言堂”为重点的。会议的气氛非常活跃,讨论非常热烈。稍后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也把古代史分期问题作为议题之一,在客观上延续了北戴河会议的讨论。

何兹全《九十自我学术评论》(转引自《国学网 2002-12-25》)有一段话,有助于我们了解几十年来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学界居领导地位的是范老(文澜)和他的西周封建说。文化大革命后应该是‘中’——(引者注),郭老(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起而代替了范说。他们两家之说,都能和毛泽东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挂起钩来,汉魏之际封建说挂不上钩。汉魏之际封建说虽然没有受过政治迫害,压制是有的。空气也有重量,那个气氛是很重的。尚钺同志的遭遇,就是我的榜样,我是看在眼里,惊在魂里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气氛轻松、活泼、自由多了。近年来我写了不少文章,畅谈汉魏之际封建说。不但很少顾虑,而且敢于‘主动出击’和同志们公开争论问题了。”而且,何兹全先生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发表的《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一文,使人更加敬佩何先生的人格和学术风范。作为“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人物,他没有沉醉于以往的争论之中,而是理性地思考争论70年的历史分期问题,坦承“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的淡漠甚或腻烦情绪。”主张“我们先不要谈论分期问题,……要换个角度先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自然段落。”当年大讨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都在以超脱的眼光来回顾这一学术史了——这实际上是新时期学术讨论多元化的象征之一。

“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崛起,也构成了新时

期史学讨论的焦点所在。雷海宗在50年代就认为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他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历史教学》1957年7月号),在60年代遭受严厉的批判,却在80年代重新赢得了声誉。特别是1986年在长春召开的先秦史学会年会上,以张广志、沈长云等人的发言,成为“中国无奴隶社会”说重新崛起的标志之一。

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的新尝试,是史学界令人注目的动态。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通史,抛开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表述方式,而代之以“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此类只有时间意义划分。曹大为等人在编写《中国大通史》时明确提出“不再套用斯大林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演变模式作为裁断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该书把夏商周三代称作“宗法集耕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把秦汉至清中期称作“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谢维扬的《中国早期国家》对古史性质的判断、发展阶段的划分充满了新意。晁福林在2003年出版的近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中把“五种社会形态说”比喻为“陈陈相因”的“太仓之粟”,明确指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形态无法套用旧的说法。曾经尽力捍卫“战国封建论”的田昌五,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体系新论》中,也大大改变了以前的学术思路,构筑了一套新的中国古代史体系,他把五帝和夏商周称为族邦时代,战国直至清朝灭亡为封建帝制时代。这些新观点,其实是在“古代史分期”讨论的基础上加以深化而出现的。所以,不管这场争论的趋势与原本的意图出现了多大的背离,从学术发展史的意义上说来,它的重要性依然存在。

(说明:本文曾经以缩写、改写的形式,在《中国政协报》、《北京日报》发表。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陈其泰《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等论著;并曾向几位前辈学者请教,承蒙他们对初稿加以细心的审查,纠正了许多不妥当的提法。特此说明,并向上述作者和前辈学者深致谢意!修订稿如仍有不当之处,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责任编辑 萧 徐)

# 寻 找 彭 加 木

张梦君

新华社北京 2006 年 4 月 13 日电讯：

中国科学探险队在神秘的罗布泊东缘发现一具干尸，他们怀疑是 26 年前失踪的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遗体。一支科学探险队 13 日在距罗布泊东缘最近的城市甘肃敦煌集结，14 日一早将向彭加木失踪的区域进发，试图确认新的发现是否为彭加木的遗体。

彭加木是何许人也？对于今天 30 岁以下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对于中年以上的人来说，却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著名的科学家，在酶、纤维状蛋白质、动植物病毒等方面有突出的研究。1980 年 6 月 17 日，他率领科学考察队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突然神秘失踪，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抢救彭加木的生命，澄清社会上一些不切实际的传闻，从 1980 年 6 月至这年年底，中央调动了部队、直升机，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搜寻行动，最终也没有找到。

时过 26 年后，新华社的这一消息迅速在全国的各大媒体传播开来，一时间“彭加木”三个字又成为社会的焦点。难道尘封了 26 年的彭加木失踪之谜，真的就要解开了吗？

## 罗布泊：一口令人心悸的黑棺材

罗布泊，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西起塔里木河下游，东至甘肃河西走廊，南邻阿尔金山，北到库鲁克山，总面积达 9.7 万平方公里，跨越新疆、甘肃两省地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山海经》中，便有记载：“东望渤海，河水之所潜也。”所谓“渤”，即“水色黑也”。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直是中外科学家探险和考察的热点地区。罗布泊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不仅没有人烟，就连生物也难以生存。因此，探险家们把罗布泊比喻为，横卧在新疆东南部一口令人心悸

的黑棺材。

根据记载：1949 年，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罗布泊上空失踪，9 年以后，人们在罗布泊发现一架飞机的残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1950 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员，骑马冲出重围突然神秘失踪，32 年后，地质队在罗布泊南岸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不明。1976 年，新疆地矿局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给野外作业的人员运送物资，汽车和车上的三个人神秘失踪；7 天后，当地驻军用直升机找到三具尸体。1979 年，云南第九地质队 28 人在罗布泊遇险，地质队员濒于死亡，靠喝小便维持生命，三天后当地驻军派直升机把 28 人救回。1980 年，新疆石油管理局野外队的三名队员在罗布泊遇险，直升机在一条直线上，每相隔 10 公里，发现了这三个人的尸体。1990 年，新疆哈密市 7 个人，乘一辆客货小汽车去罗布泊搜寻水晶矿，两年后，地质队员发现三具尸体，距离尸体 30 公里处发现了那辆客货小汽车，另外四个人至今下落不明。1995 年，米兰农场一个职工，开着吉普车带领两个亲属去罗布泊探宝，三个人神秘失踪。两年后，探险家发现两具尸体，另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奇怪的是，吉普车完好无损，油箱里有汽油，车上也有水，出事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1996 年 6 月，我国著名探险家余纯顺，决定只身徒步穿越罗布泊，然后再走塔克拉玛干无人区，打破阿根廷人托马斯徒步行走的世界纪录。然而，这位具有 8 年徒步行走经历的探险家只走了 37 公里，便在罗布泊迷失了方向，他提前几天乘车亲手埋下的食物点，虽然有食品、药品、矿泉水等，但竟然一个也没有找到，最后不幸遇难。2005 年“五一”黄金周，北京吴庆斌、李清夫妇去罗布泊探险旅游，在彭加木失踪的附近，为了追踪拍摄野骆驼，竟迷失方向四天三夜，乌鲁木齐和敦煌的有关部门，前后出动四路人马火速赶赴罗布泊营救，均告失败。后来河南《郑州晚报》、郑州电

视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探险队，意外地发现了他们，这对夫妻才死里逃生。这只是一些有记载的失踪记录，那些没有记载的在罗布泊发现的无名干尸却无法确认。

在所有罗布泊的失踪事件中，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的失踪最为神秘。

彭加木曾经三次进行罗布泊科学考察。

第一次是1964年3月5日至3月30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了水样和矿物标本，对当时流入罗布泊的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三条河流的钾含量做了初步的研究，认为

罗布泊是块宝地，很可能有“重水”资源。“重水”是制造核能源不可缺少的物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花大量的外汇购买“重水”。彭加木当年不顾身患癌症的身体，主动请缨为国家搜寻天然“重水”资源。

第二次考察是1979年11月15日至12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日两国电视台组成《丝绸之路》摄制组，到罗布泊实地拍摄，聘请彭加木为顾问，彭加木先期到罗布泊进行了细致的科学考察。他说：“我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的勇气，我要为祖国和人民夺回罗布泊的发言权。”这一次彭加木取得了许多科研成果，纠正了外国探险者的一些谬误。科学考察结束后，他又为中日两国摄制组找到了从古墓地，兴地山进入楼兰的道路，还重走了从楼兰环绕罗布泊到达若羌的丝绸之路中段。

第三次，就是1980年5月3日至6月17日这一次。

## 档案解密：彭加木失踪前的过程

知情人透露，这次罗布泊科学考察，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1980年5月3日，彭加木决定组织一支十人



彭加木

科学考察队，对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可是5月3日正好是星期六，很多考察队员的家都在乌鲁木齐，一些队员希望在5月5日星期一出发，这样可以在乌鲁木齐跟家人一起度过星期天。尤其是这次考察，要一、两个月不能回家，很多人希望在星期天安排好家里的事情。而彭加木的家不在乌鲁木齐，他没有考虑到队员们的合理要求，还是坚持在5月3日一早出发。因为彭加木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又是此次科考队的队长，队员们都服从了他的决定。于是，科考队一行十人乘一辆大卡车、两辆越野车，从乌鲁木

齐出发向罗布泊进发。

6月7日，科考队成功纵穿罗布泊到了南疆的一个小镇——米兰休息。按照原计划，考察工作到此结束，全队应该沿着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

然而，这时彭加木又提出不走平坦的南疆柏油公路，走罗布泊东线继续考察：由米兰东进，经过东力克、落瓦塞、山兰子、库木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红十井、开元、新东一号，然后取道吐尔逊北上，返回乌鲁木齐。这是原来考察计划中没有的，许多科考队员都没有跟家中打招呼，有的队员已经安排了其它工作。因为彭加木是这次科考队的最高领导，队员们还是服从了他的决定。但是，在科考中，汽车的汽油供应以及汽车轮胎的磨损和其它机械损耗，是按着行驶公里数计算的。在艰难崎岖的罗布泊行驶和在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驶，对汽车耗油，轮胎、机械的损耗，不能同日而语。在得知彭加木改变科考原定计划后，司机们曾经向彭提出这个问题，而彭以他是副院长不管行政而没有予以解决。

正是由于临时决定东进考察，而且准备工作不足，所以导致科考队到达库木库都克时缺水、缺油等一系列情况的发生。情况紧急，科考队不得不在6月16日夜里10点10分，由彭加木亲自草拟

电文,向新疆罗布泊中国人民解放军马兰基地发出求救电报:

我们今天十二点到达库木库都克地区西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我们缺油和水,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五百公斤,在18日运送到这里。请示作战处办理,请转告乌鲁木齐。另,捕获一头野骆驼。

长 江

马兰驻军基地的领导收到求救电报后,觉察事情的严重性,立即请示上级有关领导,上级同意用飞机调运急救物资。马兰驻军基地回电:

“报告宿营地坐标”。

6月17日上午9点30分,“长江”复电:

我们无法前进,请飞机前来支援。标志:一杆红旗。地点:东经 $91^{\circ}50'$ ,北纬 $40^{\circ}17'$ 。

6月17日上午11点30分,马兰驻军基地给“长江”回电:

飞机18日到达库木库都克。你们不要动,待命。

6月17日晚9点30分,马兰驻军基地又收到“长江”的紧急电报:

你们的电报没有提到空运汽油。这里缺汽油500公斤。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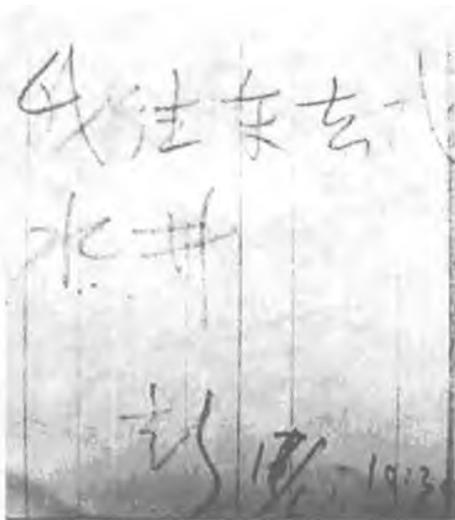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呢?为什么不在这份紧急电报中报告“重要情况”,而要等到凌晨2:00才报告呢?凌晨2:00,马兰驻军基地终于收到“长江”的电报:

彭副院长17日10时一人外出未归,我们正在继续搜寻,请作战处立即告诉新疆分院常委。请派飞机搜寻并告知飞机起飞时间。

马兰驻军基地的领导更加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

## 彭加木失踪,科考队员紧急搜寻

原来,在彭加木给马兰基地发出求救的电报后,又对大家说,我们要尽量自己去找水,这样可以给国家节省许多的费用,用飞机运水太昂贵了,



彭加木手迹

他建议开车去找水井。

然而,从库木库都克到羊塔克库都克再到克孜勒塔格,当时计算了一下,这一线路来回路程有240公里,需要一桶汽油,而当时科考队所剩汽油已经十分紧张。队员们劝他,等与部队联系后再作决定。

6月17日上午9时,科考队吃早饭的时候,彭加木又提出要向东去找水井,如果找到水井,就通知部队不要再派飞机运送水了。有的队员提出等部队直升机送水,彭加木还和几个队员

争执几句,说完他离开了帐篷,坐到他平时坐的越野车里查阅地图。

上午11:30分,科考队收到驻军部队的回电,等把电码转译出来,已经快12点了。科考队副队长汪文先拿了电文走出帐篷,到彭加木的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并没有在车里,汪文先以为彭加木去大小便了,就回到帐篷里等彭加木。

12:30分,司机王万轩去越野车里拿衣服,在越野车里发现彭加木的地图册中夹着一张纸条,纸条有一半露在外面,他抽出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 10:30

彭加木出走之后,当时中午的地表温度为 $64^{\circ}$ ,气温为 $52^{\circ}$ ,帐篷内温度为 $44^{\circ}$ 。

下午3:00时,库木库都克开始刮起了大风,漫天黄沙飞舞。到了下午4:00时,还不见彭加木回来,科考队员开始着急了,他们开着越野车往东搜寻。越野车开了一公里多,发现了一行脚印,科考队员认定就是彭加木的脚印,于是继续沿着脚印搜寻。在行驶了六公里左右的沙包上,依然清晰地看见彭加木的脚印,科考队员继续向前开,又往东开了十几公里,天渐渐黑了下来,已经看不清楚地面,科考队员只得返回库木库都克宿营地。

科考队在给驻军部队发去的紧急电报说,18日凌晨2:00联络,有重要情况报告。他们没有马上把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报告驻军基地,因为他们对彭加木回来还抱有希望。彭加木临走时,带有装

两公斤水的水壶，一袋饼干，一架照相机，还有毛衣和自卫用的匕首等野外工具。以彭加木的体质、经验和意志，是有可能在两天内走出那一带四十五公里的戈壁沙漠，到达有水草的疏勒河故道的。

当天夜里 10:00，科考队员在附近的沙丘上，用红柳枯枝点起两堆火，每隔一小时打三发信号弹，信号弹可以打 100 米高，周围 15 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司机王万轩还把越野车开上沙丘，朝东方向开亮大灯，他们期望彭加木看到火光、信号弹、汽车灯光，会朝着宿营地方向走来。

然而到了凌晨 2:00，仍不见彭加木回来，科考队不得不把“彭副院长 17 日 10 时一人外出未回。”这一重要情况告知驻军部队，并请驻军部队转告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与此同时，科考队员开始寻找彭加木的行动。

彭加木留下的纸条是：“我往东去找水井。”然而，科考队员们乘车沿着他的脚印搜寻的时候，却发现彭加木向东只走了 3 公里，又朝北走去；朝北走了一阵，又掉头向西，走了一个 7.8 公里的酷似“马蹄形”的找水路线。

更为奇怪的是，搜寻他的科考队员走到 7.8 公里处，彭加木的脚印突然消失，光天化日之下竟再也找不到了。还有传闻说，在彭加木脚印消失的地方，最后只发现了他的左脚脚印，右脚脚印无影无踪……

6 月 18 日，科考队员们继续搜寻彭加木。这一天，驻军部队派直升机送来了 500 公斤水。科考队成员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行政处的保卫干事陈百录，还登上直升机超低空搜寻了近一个小时，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身影。

6 月 19 日，直升机又冒着危险、打破禁令，给科考队送来了三桶汽油。有了汽油，科考队员开车又向东北搜寻。在 10 公里外的一个芦苇包上，科考队员马仁文终于有了重大发现。大约下午 4 点，他在一个长着芦苇的土包上发现有人坐过的痕迹，坐印很清楚。旁边的脚印与昨天和前天发现的相同，都是彭加木穿的 42 号翻毛皮鞋的脚印。他还发现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夹在芦苇杆儿上，拿过糖纸一看，是青岛食品厂生产的。他清楚记得，这奶油糖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休整时候买的，由此证明，彭加木肯定在这里休息过！

这一发现，令科考队员们为之兴奋，他们沿着

脚印继续找了十几公里，但依然没有发现。

## 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彭加木

彭加木神秘失踪的消息，在当时是严格保密的。

最早报道这一消息的，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他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发表于 1980 年 6 月 20 日的新华社内参上面。第二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看了内参上的这条新闻，说：“发公开稿！”

北京新华社总社将这一决定电告新华社新疆分社，于是，赵全章马上赶到新疆军区采访，写出公开新闻稿。新华社新疆分社立即将稿子发给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审阅。但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不同意马上发表，提出要征得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同意，因为彭加木不仅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他还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员。6 月 22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通报给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并希望他们做好彭加木家属的工作。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得知消息，立即去彭加木的家里看望了彭加木的妻子夏叔芳，并向她“吹风”。

当时国家主管科技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对新华社内参作了批示，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彭加木。

6 月 23 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 673 期上，作了重要批示：方毅、李昌同志：

彭加木同志失踪尚未找到，他们要求中央下令派出飞机飞行十五架次。此事请和新疆取得联系，并和总参、空军研究如何派出飞机配合地面寻找。

华国锋 6 月 23 日

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开始了。

当地部队首长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领导迅速成立了“找彭领导小组”。时间紧迫，经与各方协商，决定用大型直升机紧急运送先遣部队到彭加木失踪地投入搜寻，后续部队分乘 7 辆汽车，并配备电台 3 部，步话机 3 部，昼夜兼程赶往罗布泊。

当地驻军部队和地方政府共出动 136 人次，空军部队出动直升机 9 架次、安-2 型飞机 3 架

次。地面人员在出事地点 30 公里范围内反复搜寻；直升机则离地面只有 30 米进行低空搜索，范围扩大到 60 公里。安-2 型飞机从甘肃起飞，一直向西进行低空搜索。机上搜索人员在空中飞行 4 个多小时，可以清楚看见地上突然跳出的野兔，还有一丛丛的芦苇和红柳……

然而，这样被称之为“耕耘式”的搜寻，还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踪影。一位解放军战士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彭加木穿着红衣服，哪怕戴一顶红帽子就好了。”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红颜色最显眼，最容易被发现的。可当年的科考队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们穿的都是蓝灰色的工作服，远远望去和地面的颜色很难分辨。

这次搜寻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艰苦的 7 个昼夜里，没有任何人报告过有关彭加木下落的一丝一毫的消息。在阴云笼罩在罗布泊和所有搜寻人员心里的沉重气氛中，负责搜救的采访指挥者解放军某部参谋长朱平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们不得不沉痛地宣布，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第一次搜寻和第二次搜寻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彭加木队长失踪已经整整 10 天，我们再也不敢做任何乐观的假设了。如果彭加木队长还活着，他现在只能在这片死亡地带之外；因此，我们不得不结束这一阶段的搜寻工作，并请上级组织第三阶段的搜索，重点应该是东边具有生存条件的大范围地区。

朱参谋长所说的“我们最初的判断有所失误”，是指人们都认为：“彭加木不会走远，肯定就在附近。”

既然搜寻不到活着的彭加木，也应该能搜寻到彭加木的遗体 and 遗物。这是第三次搜寻的重点目标。

彭加木离开大本营时，身背一个铝水壶，装有两公斤水，还背一架照相机，携带一个地质铁榔头、一个罗盘、一把匕首、一个笔记本和一个灰背包，手上戴一块“上海牌”手表。

1980 年 7 月 7 日，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又展开了。这次搜寻分三路三支小分队，分别从敦煌、八一泉、库木库都克三个地点同时出发。

彭加木失踪后，他的夫人夏叔芳、儿子彭海、女儿彭荔，也怀着悲痛的心情于 6 月 29 日来到罗布泊的驻军部队基地马兰，他们坚决要求前往出

事地点参加搜寻。有关领导考虑到他们的身体和安全，只同意彭加木的儿子彭海参加搜寻。

这次制定的搜寻方针是：地面搜索为主，空中搜索为辅，搜索范围加大。

在这次搜寻中，有人提出了“动用警犬搜寻”的建议。经研究，此建议被采纳。接着，分别从上海、南京、烟台警犬训练基地，选拔有丰富经验的 6 名警官，携带 6 条在平时破案中屡建战功的优秀警犬，分乘火车、飞机、汽车，聚会到罗布泊。

本指望这些嗅觉比人灵敏一万倍的警犬，在搜寻中有重大突破。没想到，来到这如同火炉一样酷热的罗布泊，6 条警犬有的拒绝下车，有的水土不服，有的萎靡不振，有的脚被扎伤。强迫它们搜寻，结果全都是三条腿走路。警犬们智商不低，它们懂得把一条腿悬在空中散热，等哪条腿受不了了再换一换。上海市侯奎武警官携带的警犬“洋泾”，因脚部严重扎伤，裂开流血，心情极坏，当时就有点儿神经质，罗布泊归来终于引发精神病，六亲不认，见谁咬谁，最后不得不使用麻醉枪使其“安乐死”……

8 月 2 日，这一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结束，中国科学院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了这次搜寻的情况：此次行动出动 181 人、48 辆汽车，飞机搜寻 29 架次，飞机运送物资和人员 40 架次，空中搜索达 100 多小时，搜寻范围 4000 多平方公里，历时近一个月。但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遗体和任何遗物。彭加木失踪虽然仍是个难解之谜，但他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则已经断定。搜寻彭加木的行动也告一段落。

## 香港传来的爆炸性新闻，引起了再一次的搜寻行动

1980 年 11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宣布：再一次开展大规模搜寻彭加木的行动。导致这次行动的原因，是从香港传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1980 年 10 月 11 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了大幅新闻报道。报道说：“就在北京透露出彭加木身亡大漠的同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彭加木结识三十多年的老友、中国留美学周光磊却于九月十四日晚在一个饭馆里见到了他。当时惊诧之情，读者可以想见。但还有比

发现彭加木更使人惊诧的，即彭加木竟然否认自己是彭加木。而且迅即与两个同行的美国人离开了这家饭馆。”周光磊说，与他一同就餐的朋友中，有两人熟悉彭加木，他本人和彭加木30年前就认识，1979年回国时还与彭加木见过面，岂有认错人之理？

此消息经《中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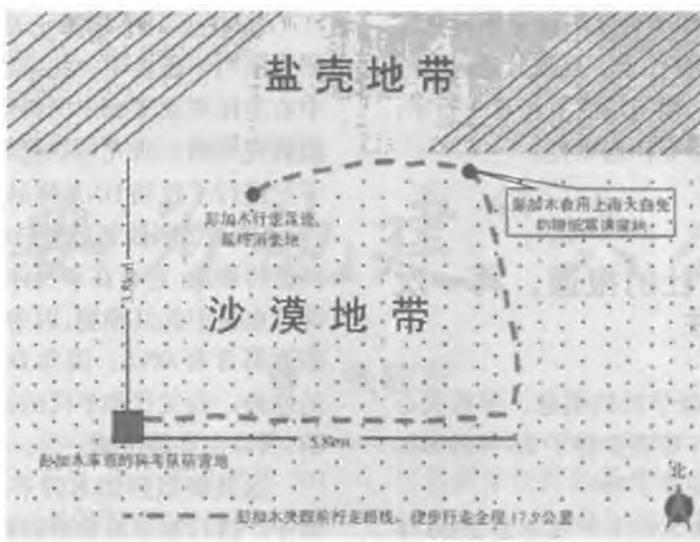
一发表，美国合众国际社立刻转发；“美国之音”也迅速广播；日本《产经新闻》马上转载；台湾的广播电台也反复播出。一时间，彭加木逃往美国的传闻和消息纷纷扬扬……

为了驳斥彭加木逃往美国的传闻，中国科学院果断决定，再一次组织大规模搜寻，时间从1980年11月20日到12月20日。这一次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都是前几次所没有的，人们下定决心：就是活着的彭加木找不到，也要找到彭加木的遗体 and 遗物。

这次大搜寻的队伍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军区独立5团、通信兵部队、汽车56团、兰州407部队等八个单位组成。从地方和部队抽调油罐车、水罐车、电台车、物资装备车、越野吉普车共18辆，司机20名；携带电台3部，配有7名通讯报务员；还带有6顶大帐篷、两口行军锅、两支信号枪以及数发信号弹和生活用品。搜寻的范围是：库木库都克大本营周围，彭加木脚印消失处周围，疏勒河故道周围，八一泉周围，红十井周围。

搜寻的方法是：改变前几次为了搜寻活着的彭加木，采取跑线为主的搜寻方式；而采取“拉网”战术，点、线、面相结合的方法。分组分段，使用罗盘，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80米，凡是找过的地方插上红旗为标志，提出的口号是：不丢一个沙丘，不拉一丛芦苇，不留一处空白！遇到低洼地带，甚至用上了钉耙扒寻，但这次没有动用飞机参加搜寻。

时间毕竟过去了5个多月，因为后勤基地远



彭加木失踪前行走路线图

在敦煌，油、水、粮、煤运送一次往返要六、七天，给养供应非常困难。罗布泊的冬天极其寒冷，搜寻队员长时间在野外啃冻馍，喝冰水，许多队员先后病倒。最后被迫决定，12月20日全部撤离罗布泊。

这次搜寻共持续了41天，参加搜寻的有1029人次，搜寻面积1011平方公里。最

终的结果：依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遗体和任何一件遗物，彭加木失踪依然神秘！

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彭加木革命烈士称号。上海和新疆两地，为彭加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彭加木的失踪地点，竖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碑，上面刻着：“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1990年9月22日，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随著名艺术家黄宗英拍摄《望长城》大型纪录片时，专门来到彭加木纪念碑旁埋下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普普通通，长大约30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左右。铁盒子里面有彭加木的遗像，有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所电子显微镜室全体同志和夏叔芳老人的合影，有彭加木女儿彭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留影，照片背面是彭荔1990年9月的亲笔留言：“万分地怀念着亲爱的爸爸！”

除照片之外，铁盒子里，还有夏叔芳老人留给路过这里的人们一封充满感激和希望的短信：

衷心的祝愿，有朝一日，路过此处的尊敬的同志们能在周围搜寻到彭加木的遗体与遗物，万分的感谢与期望。彭加木爱人夏叔芳、子彭海、女彭荔。1990年9月22日

在另一张便笺上，还写有这样一段话：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加木，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十年前曾在此找寻过你。叔芳，1990.9.21 敦煌。

在“古来征战几人回”7个字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横线。这7个字或许代表了夏叔芳老人当时极其复杂与悲伤的心情。便笺最底下还有一行字：“明日将西行至库木库都克你遇难处。”

## 26年后新华社的报道，再一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2006年4月13日新华社的消息，所有关心彭加木的人们为之兴奋。难道尘封了26年的彭加木失踪之谜，真的就要解开了吗？

其实，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并不是2006年4月13日被发现的，而是早在2005年4月11日，就已经被发现了，而且干尸还险些被拿去展览卖钱。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到底是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呢？

见到这具干尸的人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这就是彭加木的遗体，原因是：一、这具干尸身高1.72米左右；二、脚穿42码鞋；三、死者年龄55-60岁；四、死亡时间在30年左右；五、留短发；六、牙齿可疑。这些特征都与彭加木基本吻合。

一些人认为这根本不是彭加木的遗体，原因是：虽然这具干尸的特征与彭加木的特征基本吻合；但是有几点比较可疑：一、死者右手拇指留长指甲，彭加木没有这个嗜好；二、死者额头极窄，仅3厘米上下，与彭加木宽额头差距太大；三、死者全身赤裸，身边没有发现彭加木不锈钢链手表、皮带、翻毛皮鞋、铝水壶、铁榔头、照相机、匕首、罗盘等遗物；四、死者是头部朝北呈艰难爬行状，身边有一根红柳拐棍和一块墨绿色矿石，极有可能是从南面阿尔金山找矿的遇难者；五、发现干尸的地点距离彭加木的脚印消失处有20公里左右，如果是在普通地带没有问题，但是这里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的罗布泊，而且，彭加木失踪的1980年6月17日那天，气温高达60度，他身上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壶水，这种情况，他翻越沙丘走20公里的可能性很小。

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人们想到了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作为“最高法官”进行判定，这一判定的方法就是——DNA鉴定。

2006年4月17日，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员刘武等专家，对疑似彭加木干尸进行了现场DNA样品采集。

DNA也叫脱氧核糖核酸，简单地讲就是人体的遗传物质。它存在于身体的每一个有核细胞中，除了血液中的红细胞，因为它没有核细胞，其它的细胞都含有DNA。因为DNA鉴定是通过遗传学的原理，而父代和子代的遗传都是遵循遗传规律的，所以它比较准确。

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尚有残留的毛发，在对干尸进行初步检验的时候，邓亚军发现干尸的风化很厉害，他们采样了干尸大腿骨的骨头、毛发、一些变质的皮肤组织进行DNA鉴定。

2006年4月26日，邓亚军博士作客人民网科技论坛，详细谈了疑似彭加木的干尸的DNA鉴定问题。

邓亚军提出：“我们这次提取的样本，我很有信心，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次的DNA鉴定，是能够非常准确地认定干尸是彭加木或者不是彭加木的。跟我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我们俩对这个尸体检验的推断是一个中年男性，没有排除是彭加木的证据，我们倾向可能是彭加木。”

在对疑似彭加木干尸遗体进行DNA分析鉴定之后，还要对彭加木子女进行DNA分析鉴定，只有将疑似彭加木干尸的DNA分析鉴定，与彭加木子女进行DNA分析鉴定进行对照后，才能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然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拒绝了。

罗布泊一次又一次传出发发现疑似彭加木干尸的消息，让彭加木的家人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伤痛。因此彭海提出疑问：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有百分之多少的把握是彭加木的遗体？

专家回答：在没有做DNA鉴定之前，只能说有50%的把握。

彭海回答：“对这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除非有90%以上的把握是我父亲的遗体，我才可以做DNA鉴定。”

看来，要揭开彭加木这个跨世纪的失踪之谜，还要有待于新的发现。

(责任编辑 萧 徐)

# 雷宇： 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

张敬东

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在北京301医院病房，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其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杰克逊说：“古往今来，中国有许多伟人都是秘书出身的。”

邓小平说：“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他滔滔不绝地引述古今例子，显出惊人的记忆力，“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袁木当过纪登奎秘书，雷宇当过任仲夷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邓小平只讲了个雷宇作为拔擢党政高级干部的例子呢？这就异乎寻常，耐人寻味了。

## 与华国峰当面争论

邓小平说雷宇当过任仲夷的秘书，并不准确。雷宇在任仲夷身边那时的角色，其实就是古代的“幕僚”，现代社会称之为“智囊”、“智库”。雷

宇是颇受任仲夷器重的。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2月，雷宇随同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到被毛远新把持多年的辽宁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0年11月雷宇又随同任仲夷从辽宁调任到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先走一步的广东。老前辈任仲夷特别看重雷宇做官为民敢讲真话的优良品格。2005年6月，即任老逝世前数月，在参加广州市组织的到西北地区考察途中，他动情地对雷宇夫人韩益杰说：“我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也不愿意参加别人的生日宴请，但这几年我都给你婆婆送生日蛋糕，因为一是我熟悉的百岁以上老人不多，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你婆婆；二是她生了一个敢说真话的儿子。”

雷宇确实是敢讲真话的人，历来心直口快，不管对谁，较起“真”来“寸步不让”；他为自己勾勒的个性特征是“我从不盲从，不随波逐流，总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服输。”1980年7月2日晚，在大连棒锤岛7号楼，雷宇曾就物价改革问题与华国锋争辩起来。雷宇说：我国有个方针叫做物价基本稳定，总的说没有错。但如果过分强调物价基本稳定，也会走向反面。物价总是稳定在一个水平上，就会像个大锅盖，把很多问题都盖住了。不下决心、看准机会、创造条件，迈出物价改革这一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工作这盘棋还是很难活起来。华国锋说：你站着说话不知腰痛。意思是你不当家，不知道物价改革牵一发动全身。雷宇说：这些我都懂。但也不能认为它有风险，就裹足不前，连试都不敢试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是任仲夷出来解围，他说：华主席呀，雷宇同志是我们当中思想比较解放的，请你不要见怪。其实，华国锋虽然不同意雷宇的看法，并没

有流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回到省委机关,却有人对雷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小子胆大包天,敢跟中央主席争论!对此,雷宇不以为然,答曰:他不是让大家说吗?既然让大家说,有这个机会,我就说说。雷宇的耿直磊落由此可见一斑。

## 海南改革的闯将

俗语说:“三岁看到老。”雷宇早年便显露锋芒。1934年7月出生于广西横县一个破落书香之家的雷宇,自小便好学善读,在知识海洋里泡大。后来受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的大哥雷起予和读中学的同学、地下党员谢清波等人言传身教,11岁成为地下党情报联络站的联络员,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6岁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最可爱的人”。

“腹中贮书一万卷”,早年的经历使雷宇磨砺成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抱负的人;担任“幕僚”的几年间又积累了经验,积贮了激情。这个时候,他期待的是一个能实现“思想、操作一肩挑”,独当一面施展才华抱负的舞台。

机会终于来了,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1982年7月,雷宇调任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兼公署主任、行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

然而,这一调任,对雷宇来说,既是机遇,又是重担。说是机遇,那时中央领导频繁视察海南,及时指导,并给予海南越来越优惠的政策;还有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的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在广东担纲、领航。毋庸置疑,那的确是开发海南的黄金时段。又是重担,因为海南是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尤其是那个“边”字和“穷”字。这里所说的“边”,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而且在人们的心理位置上,都是“天涯海角”。信息闭塞,观念落后,严重缺乏商品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说到这里的“穷”,更令人望而生畏。不少山村仍沿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相当一部分黎苗族同胞住的是又窄又暗的茅草房。即使在全岛中心城市海口,贫穷落后的印记也随处可见。越穷越留不住人才,越留不住人才越穷。面对此情景,想短时期内扭转局面,难!

雷宇不愧为一员改革大将,在海南开辟改革

之路,他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物。为了突破难点,打开局面,雷宇使出浑身解数,全力以赴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人说雷宇有“三勤”:一勤下跑。下工厂、访黎村、串苗寨、走学校,进行环岛考察,深入了解民情社情,为建设海南制定整合资源,发挥东、西、中部和山区各自优势的经济区划,勾勒全岛发展总体规划。二勤上跑。他起早贪黑,跑遍中央、国家机关中的29个部委办,不管接访人官大官小,他都诚恳耐心地如实汇报情况,争取支持。三勤外跑。积极开展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让一批基础设施逐步上马。对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深受感动,曾在一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说:我倡导国务院各部门工作的同志,要学习雷宇同志的工作精神、工作作风、工作干劲。工夫不负有心人,雷宇在海南任职3年间,不仅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地上了一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微波通讯、电站、糖厂及创办海南大学等建设项目,同时开通了海口至香港的空中和海上的客运航线。更重要的是把干部群众搞开发、干“四化”的劲头鼓起来了。在全岛上下一致努力下,宝岛的平静被打破了,海南的人才外流大为减少,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景象。

在投身海南的开发建设中,雷宇一如既往地敢说真话勤做实事,为海南争取了许多支持。令雷宇的秘书谭可诚终生难忘的是,1983年2月11日上午,雷宇在三亚海军小礼堂向胡耀邦汇报,请国家支持海南建设一个煤矿和一个电站时,胡耀邦说:“可以搞小煤窑,发动群众,不要用国家投资。”雷宇说:“耀邦同志,我想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我是学采煤的,海南不是山西,随便找个地方都可以挖出煤来。而且,这里地质结构复杂,又是属于低热能的褐煤,需要特殊的技术设备才能处理好。这里建煤矿,我看还得国家给钱。”当时有人给雷宇递眼神,雷宇不听,据理力争,因为他想的是海南太穷,不能为了讨总书记高兴就说行啊!胡耀邦就是胡耀邦,他并没有因雷宇的言语“当众冒犯”而生气。到第二天早上,胡耀邦当着雷宇和国家计委甘子玉副主任的面,告诉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让他转告煤炭部长高扬文,给海南解决建设煤矿的资金。1984年4月,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召开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当雷宇在大会发言,要求中央在莺歌海天然气利用上给予海南必要的照顾时,时任总理的赵紫阳说:“海南虽然近水楼台,但不能先得月。”雷宇说:“我不是海南人,不怕打成地方主义(分子)。海南能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这句话显然不对,但确实需要考虑。’事后有人说雷宇实在不是当官的料,在大官面前总是实话实说,连个弯都不拐。然而,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实话做实事的雷宇,正是一剂苦中回甘的良药。”

## “海南汽车事件”中的雷宇

说到雷宇在海南,不必要也不应该回避的一个大问题,主要是在1984年7月至11月这五个月间发生的“海南汽车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当年中央主流媒体未知何故,在《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的报道中,恰恰回避了“汽车事件”是怎么引起的事实真相。据此,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汽车事件”这一年的年初,海南黎苗族自治州乐东县物资局曾违反中央关于当地用自有外汇进口的17种产品只准在岛内销售的规定,将19辆从日本进口的农用车转卖到本省岛外某县。雷宇发现后,当即明确提出对该局有关领导严肃处理。与此同时,还通报处理了海南区二轻局违规将进口大批尼龙布倒卖出岛事件。二是在1984年7月,到山西太原市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行政区工商局长,在会上传回国家工商局的六条意见。按照“六条”,海南“汽车可以出岛”;内地集体、个人持区、县以上主管部门证明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自用的,应予放行。海南区主管外经工作的负责人得悉此精神,认为是特大喜讯,并向区党委一把手汇报,明确应抓紧实施。“汽车事件”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对于国家工商局的意见,当时广东省政府杨德元副省长曾给国家工商局领导打过电话,不同意关于“汽车可以出岛”的规定,但得到的答复是“六条”意见是经过局党组讨论通过的,是符合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的。于是,才引发了海南大批量

地从日本购进汽车:内地除西藏、青海外,所有省区都涌到海南购买进口汽车。

就雷宇个人来说,政策拿到手后,他还是很谨慎的。他说:“政策赋予权限越大,责任越重。”他当时对购买进口汽车,有个“控制”数量的设想。他算过一笔账:进口汽车1.3万辆,每辆卖出赚1万元,加上进口转卖别的机电产品,合计共能赚2亿元,用于开发海南,初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改善培养人才的教学条件就可以了。雷宇清楚,不是进口汽车越多就越好,如果进口转卖汽车太多,赚钱太多,必然会事与愿违。可惜,他想是这样想的,说是这样说的,但得力措施却没有跟上。比如,对进口汽车的审批权就存在着多头审批的现象。尤其是分管外经工作的行政区领导,批得过多过滥,连下属单位申请进口别的物资,他也批进口汽车。雷宇发现后立即撤销了一批批文,但为时已晚。用雷宇自己的话说:“就像开车一样,虽然你刹车了,它还要按着惯性往前滑一下。”结果,造成严重失控,共订购汽车8.9万多辆,实际进口7.9万多辆,其中上缴国家5.8万多辆,自销2.06万辆。

代价很沉重——雷宇被当作“海南汽车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雷宇历来廉洁从政。他在海南、广西任职共7年,没带家属,只带个秘书或司机。在海南,雷宇不像别的外地调入海南的领导一样住招待所,而是住在机关院里,吃饭就到饭堂解决。夏天的海口酷热难耐,雷宇的住房非但没装空调,连一台旧风扇也是到1984年夏天实在太热才配置的。他从不搞特殊化,生活就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在海南如此,在广西也一样。雷宇不愿按当地政府的安排到饭店吃住,就和司机搬到一个家属院宿舍去住,平时自己买菜做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做饭就到街边吃盒饭。离开海南后,雷宇回到广州,住在省委干部宿舍,当时在省委办公厅任职的邓杜廉登门造访,发现这位“高干”家里竟然没有一件值钱的物件:厅里坐的是破旧的木沙发,看的是黑白电视机,房里睡的床是两张凳子上铺的木板,发黄的蚊帐挂在墙角上。

危难是一面折射灵魂真相的镜子。虽然雷宇自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但他还是先为别人着

想。众所周知,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处分最重。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断然作出大量到香港进口转卖汽车决策的,并不是雷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雷宇外出公干,作出这一决策的是区党委一把手。因为就在此时,参加全国工商局长会议的海南区工商局长,从会上传回可以进口转卖汽车的六条意见,有关领导迫不及待地到区党委一把手家向他报信,他很高兴,当即表示根据他在佛山抓外经工作的经验,办此事宜早不宜迟,并由他指派有关领导赶赴香港洽购进口汽车事宜。如今谈起此事,有关领导记忆犹新,但局外人士却一无所知。待到清查“汽车事件”,行政区政府一把手雷宇和行政区党委一把手都被召回广州,让住在小岛向广东省委写检查,行政区党委一把手也曾如实地交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并检查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可是在递交省委前与雷宇交换检查稿征求意见时,雷宇把其交代的这段话全部划掉了。雷宇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这样写送到上面去,绝对没有你的好,你没有必要这样写。你今年都59岁半了,再有半年你就要退下来了。你要是在临退下来之前还处分一下子,那你以后就不好办了,生活待遇所有的都不好办了。反正我是‘封神榜’上有名的,在劫难逃。这种事,有一个出来顶账就行了。你就不要出头了。再说,我今年才50岁,我相信,只要自己不自暴自弃,中国只要搞改革开放,总有一天还会用我。”显然被劝的那位党委一把手也权衡了利弊,他上交的书面检查也就没有这一段话了。也许就由于这个缘故,雷宇便成了这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处分最重。

### “只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

处分下来后,在家里赋闲3个月,雷宇调任花县县委副书记。位降未敢忘忧国,金子放到哪里都永远是发光的。在这里一年多时间,雷宇时刻关注企业的发展,特别重视解决基层所面临的问题。当他了解到该县赤坭水泥厂搞技改遇到缺乏资金的难题,而铁道部门正在花县筹建冷冻机车厂需买水泥,便主动为两者牵线结缘,动员后者“预付货款”帮前者搞技改,前者以优惠价供应

后者水泥。结果,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1987年,雷宇任增城县委书记。他在这里工作不到一年,他深知路通才能财通。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采取各种灵活变通做法,多方筹集资金,用于铺设8条公路、2座桥梁,还建起1个海关,从而破解了这个山区县交通不畅、进出口货物不方便等难题。不难想象,不到一年就干出“8、2、1”件事,会遇到多少周折,会耗费他多少精力,他会想出多少办法啊!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总是那么胆识过人,足智多谋,这就是雷宇!

说到雷宇在广州这一段,黎子流是最有发言权的。据黎子流介绍,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和雷宇打过交道。那时雷宇给他留下的是思想解放、作风深入、工作务实的印象。待到1990年黎子流调任广州市长时,雷宇早在该市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当时不少同事对黎子流不熟悉,有的还有疑虑。雷宇主动作介绍,从黎子流的为人到他在顺德、江门工作显示的才干都详细叙述,使大家对黎子流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在两人共事中,黎子流对雷宇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看到雷宇的脑瓜很灵活,思路很清晰,办事雷厉风行,一心扑在工作上,可以说他对广州的经济发展是倾注了全力的。而且,黎子流还惊喜地发现,雷宇从未因犯过错误受到严厉处分叹过一声气,也从未因为原来是自己的上司现在成了副手而发过一点傲气。彼此坦诚相见,配合默契,合作得非常融洽。这时在黎子流的心目中,雷宇的形象更高大,是一位不为名利,不计得失,完全把心眼放在党和老百姓事业上的好干部。

雷宇在“海南汽车事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新加坡一位老华人曾预言:“只要中国继续搞改革开放,雷宇还会被重用。”果然如此,1992年4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雷宇被召至北京谈话,中央决定调任他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同年6月,雷宇走马上任,但不从广州乘飞机直达首府南宁,而是开车沿广西边界线一路考察而去。上任第二天,雷宇就开始边检查边调研边解决难题。他将在边境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种敏感问题,及时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研究对策。对之前的“汽车事件”,他不回避,反而常常以“汽车事件”为前事之师,吸取教训,避免再犯同样的

错误。对边贸问题,他坚持既要搞活,又要活而不乱。在广西任职近4年间,雷宇主要分管对外工作、沿海开放、内外贸和工商等,都取得可喜变化。特别是对外工作,他豪迈地提出“让世界了解广西,让广西走向世界”,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很快打开局面。据《广西统计年鉴》公布的统计数据,在雷宇来前的1991年广西全区实际利用外资6636万美元,他到来后的1992年便增至2.37亿美元,1993年9.24亿美元,1994年10.47亿美元,1995年9.64亿美元,与1991年相比,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多倍。同期外贸出口额,也从8.32亿美元增至22.46亿美元,增幅近两倍。

### 百姓要为他建“六公祠”

1996年,雷宇“急流勇退”,主动辞去广西的职务,回到广州照顾96岁高龄慈母的起居。雷宇幼年丧父,五个兄弟姐妹全靠母亲劳秀贞抚育成人。母亲独力支撑贫家的艰辛,雷宇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参军后,他奔赴朝鲜战场,浴血奋战,母亲终日提心吊胆,牵肠挂肚;转业后,他走南闯北,在外一晃就将近半个世纪,是名副其实的“少小离家老大回”。对此,雷宇一直心怀歉疚。他说,我尽了几十年忠,现在也该尽尽孝了。辞职后,他和老母亲一起生活,尽一份为人子之责。

转眼间,10年又过去了,年已106岁高龄的劳秀贞老太太仍然健旺。这全赖雷宇及其家人平日对老太太无微不至的照顾。当年看到有关“海南汽车事件”的报道时,老太太曾问雷宇到底犯了什么错。雷宇坦诚地告诉母亲,是工作错误,是管理不善的错误,是执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而没有顾及国情的错误。但绝对没有以权谋私,绝对没有做违背良心的事。老太太听了儿子的话,心里坦然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一直舒舒朗朗地活成了百岁以上老寿星。

这些年来,雷宇已经淡出公众视线,“汽车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也逐渐模糊了。可是2004年2月,林桃森案的平反判决,又一石激起千重浪,



雷宇(左)与本文作者2007年1月摄于广州

重新勾起了人们的回忆。林桃森曾是海南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是“海南汽车事件”中唯一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行政区领导。对于林桃森案,雷宇多少是知情的。控告林桃森的材料说,有人在1984年12月9日上午10点钟,在林家客厅里给林桃森送了3万多元人民币。但是那个时间林桃森正和雷宇等人在广州公干还没有回到家,根本不可能受贿。雷宇当即向有关方面反映这一情况,在雷宇离开海南后,林桃森还是被捕了,海南中级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林桃森以没有投机倒把的故意,没有接受赃款为由上诉,被驳回。

雷宇自始至终都惦记着这件事,他认为林桃森是无辜的,坚持为林申辩。多年来,雷宇和了解此事的同志、朋友们,始终在为林桃森的平反上下奔波,然而事情一直“搁着”。1996年7月11日,雷宇回海南访友,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探望已经病危的林桃森。他为自己的同事长期蒙冤深感不安和悲伤。讲起同志们为林桃森平反而奔走的事,当时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林桃森泪如泉涌。事隔不久,林桃森带着冤屈,离开人世。直到林桃森逝世8年后,才终于等到一纸迟来的平反判决书。逝者长已矣,但也总算是还了他一个清白,当

可告慰其在天之灵了。而对此事多年奔走呼吁的雷宇等人来说,这也是一份可贵又可叹的礼物。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宇干革命搞建设走南闯北,最令人感念又悲壮的是在海南这一段。记者从采访中感受到,海南干部对雷宇的感念之情,溢于言表。曾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后任海南省副省长、中央候补委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的王学平,谈到雷宇非常激动。他说:我尊称雷宇为“雷公”。也许在海南干部中我接触雷公的时间最短,可印象最深。我陪他下基层,跟他上北京,同吃同住同工作,从中体会到雷公是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表率。人们都说学雷锋,我看群众学雷锋,干部还应当学雷公。我以雷公为好榜样,写一副对联挂在厅里,鞭策自己。上联是“一生忠贞一生忧”,下联是“两袖清风两眼乐”,横批是句双关语“乐为黎民”。记者在采访中同样感受到,海南群众对雷宇

评价很高,大凡到海南思古抒怀的人,都会去名胜古迹五公祠参观。该祠是为纪念唐宋两代被贬谪来海南的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而建。事隔多年,如今人们向记者谈起雷宇,还感念不已,说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南的百姓为在“汽车事件”中雷宇受贬鸣不平,要为他建“六公祠”。据曾任广东省委办公厅一秘副科长,分工负责中央领导和省委主要领导批转文件处理工作的邓杜廉回忆,1986年7月17日,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陆定一,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写过一封亲笔信。赵紫阳在此信上批示:请转广东省委林若同志。林若将此信批转省委各副书记阅。陆定一此信的大意是: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有个书记叫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

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接着,陆定一说,像雷宇这样勇于改革开放的人物,应予重用。陆定一还引用了春秋时期秦穆公善于用人的一段历史佳话,以古为鉴。雷宇在海南任职总共才3年,但海南百姓一直在怀念他。“公道自在民心”,民众认为雷宇一心为民,出错也是为百姓办事出的错,都谅解他;认为他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有很强的改革开放意识,有很强的廉洁自律能力,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出了错还勇于承担责任,都赞扬他。所以,雷宇被撤职了,人们同情他;雷宇将离开海南时,人们挽留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按需出版 继续征稿

我公司“按需出版”广告自2004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反响,至今已为国内外的中老年作者出版了数十种个人传世作品,并获得信誉、服务及质量的良好评价。现继续征稿。

三大优点: 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 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 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 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 印数: 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 自费。以20万字288面为例,印制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参阅本刊2004年第9、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或赠送。

印制质量: 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为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

邮编: 100088, 热线: 010-62359410, 手机: 13901158422。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7年1月

# 《贺龙大传》与夏曦

李乔

中央电视台与各大报纸每天都有一个栏目——“永远的丰碑”，介绍革命先烈的事迹。每当我看到那些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结局时，心里总感到很悲怆，同时又生出无限敬意。这些烈士，大量的牺牲在战场上的，也有很多牺牲在刑场上，但也有的是死于我党内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这些死于“肃反”的革命烈士，数量是相当惊人的。他们的悲壮而又悲惨的结局，总是让我心绪难平，忿忿不已。对于那些杀害这些革命烈士的“左”倾权势人物，我特别地感到愤恨。夏曦，就是特别让我愤恨的一个。

夏曦是王明、博古当政时党内的一个权势人物，是因投靠了米夫、王明而得势的。在执行“左”倾错误肃反政策上，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形容湘鄂西的肃反。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的烈士段德昌（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位极优秀的红军将领，就是被夏曦杀害的，另一著名红军将领柳直荀（红三军政委），即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也是夏曦杀害的。谢老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本来也在夏曦肃杀的黑名单中，只是因为被敌人所俘，关押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连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了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作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夏曦还

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

这一段痛史，我每一次思及，都要扼腕叹息。最近读了刘秉荣同志写的《贺龙大传》（同心出版社出版），对这段痛史，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也更加感慨系之，对夏曦的恶行，也更加感到愤恨。

书中写到夏曦整人、杀人的情况，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甚深，一是夏曦太残酷，二是他的杀人理论既可怕又荒谬。

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王、陈曾分别任教导第一师师长、政委）三位红军将领，无端地被夏曦怀疑为改组派，夏曦为得到所需要的口供，不惜使用重刑。夏曦下令说：“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也不招。对他们，我们还要用重刑，一定撬开他们的口。”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了数百名所谓的改组派分子，然后将这些人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在游街时死去。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残害人的方式，与封建官府的审案用刑有什么区别？与白公馆、渣滓洞的刑讯逼供有什么区别？夏曦的残酷用心，又与明朝锦衣卫的缇骑有什么区别？与军统局的徐远举有什么区别？

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给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英勇的气概，多么伟大的人格！苍天也要为之动容，鬼神也要为之俯首。但这却没有撼动冷血的夏曦，没有使他回心转意，夏曦居然真的就残忍地用刀把段德昌砍死了！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立即被处死。这是多么残酷、多么丧尽天良的恶行！

夏曦抓人、杀人，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既可怕

又荒谬绝伦。《贺龙大传》在写到夏曦与关向应谈论关于肃反的方针时，写道：

关向应说：“肃反不能停，不过，杀人要慎重。”

夏曦说：“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夏曦的杀人理论，说轻了，是典型的宁“左”勿右的理论，说重一些，就是血腥的法西斯理论。我猜想，大概谁看了夏曦的“宁可错杀，也不漏掉一个”的主张，都会油然想起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难怪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也许有人会说：夏曦与蒋介石想杀的人不同。诚然如此。但试问，在杀戮红军的结果上，两者有什么不同呢？要说不同，那就是：夏曦杀了那么多红军高级将领，这是蒋介石想做也做不到的！小平同志曾说，“左”的东西很可怕，好好的一个局面，也会让它给断送掉了。每当我想起小平同志这句话，总是会油然想到夏曦的肃反。

夏曦抓人、杀人的理由和逻辑之荒谬，常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红军将领卢冬生率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大家都为之兴奋，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他对关向应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竟战绩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经过关向应的劝阻，夏曦才没有抓卢冬生。这叫什么鬼怪逻辑？打了胜仗，消灭了大量敌军，却成了投敌的证据，天下哪有这样投敌的呢？这还有什么理可讲？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打了胜仗，却也被认为是投敌，但那是皇太极施行的反间计，而夏曦呢，则是无端地凭空怀疑。

夏曦的荒谬，还特别表现在他罗列段德昌的罪证上。夏曦认定段德昌是改组派，其根据是什么呢？《贺龙大传》写道：

夏曦面目一沉说：“种种迹象表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首领！”

贺龙说：“段德昌出生入死为革命，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善于用伪善的面孔蒙蔽人。”

贺龙问：“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证据就是打了败仗。”

请看看夏曦的逻辑是多么荒谬：为革命出生入死，倒成了伪善狡猾之处，倒成了是改组派的证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难道贪生怕死，倒成了不狡猾，成了忠于革命吗？夏曦的另一个证据，是“打了败仗”。夏曦所说的打败仗，是指贺龙率部与敌周燮卿旅作战失利的事，此役之败的责任，本在夏曦指挥上的失策，但一向争功诿过的夏曦却怀疑是段德昌暗中通敌所致，于是把打了败仗作为证明段德昌是改组派的证据。这又是在凭空猜想。前面说过，卢冬生打了胜仗，夏曦认为是卢冬生在伪装，在段德昌身上，他又认为打了败仗是因为段德昌通敌。总之，不论打了胜仗，还是败仗，反正都证明你是坏蛋，是反革命。这种随心所欲，反复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整人伎俩，与封建王朝的酷吏，与陷害忠臣良将的奸佞，与清朝以刀笔杀人的恶师爷有什么不同？共产党人在思想方法上，本应讲唯物论，讲实事求是，但夏曦搞的却完全是唯心论、唯意志论那一套，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没有了共产党人的气味。从他的思想方法和杀人逻辑看，他已丧失了一个正常人应有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更丧失了人的良心，这就必然导致了他的行为涂上了浓重的极“左”恐怖色彩。

曾险些被夏曦杀掉的谢觉哉，曾做过一组诗，专门斥责夏曦。诗云：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局，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死，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这是一组极为沉痛而又燃着愤怒之火的诗，从诗的字里行间，仿佛又可以看到夏曦杀人的刀光和死难烈士的鲜血。谢老是以亲历者的身份来写这组诗的，这使这组诗更具有“诗史”的性质。

正如谢老所写，夏曦的杀人恶行，完全是他“抹尽良心横着胆”干出来的，这使多少英贤命丧黄泉。

夏曦何以“一指障目不见天”？这是他的荒谬思维造成的必然结果。夏曦自以为很聪明，“唯我独革”，实际却是刚愎自用，愚顽透顶，结果只能是茕茕子立，成了光杆。“自残千古伤心事”，谢老也许想到了诸如太平天国那样自相残杀的一幕幕惨烈史事，而眼前发生的肃反悲剧，不正是那种种“自残”痛史的重演吗？怎能不让人思之垂泪！在最末一首诗中，谢老讲到了自己险些被夏曦杀害的经历，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中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老革命，他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也没有死在敌人的黑牢里，却死在了专案组、造反派的手中！实际上，夏曦的阴魂并没有散去，“左”倾肃反的痛史，也没有真正终止，在文革中，这种痛史被大大地续写了。贺龙元帅在被关押期间，曾向夫人薛明谈起了湘鄂西的肃反，可见他是把文革与湘鄂西肃反相比拟的，同时他也深知，文革之祸，是大大超过湘鄂西肃反的。贺龙元帅没有死在夏曦手里，却死在了文革动乱中，贺龙终究没有逃过“左”祸。

1934年底，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夏曦的肃反被制止。起初，夏曦不认错，但后来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恶，并痛感肃反乱杀人是“还不了的账”（夏曦语）。夏曦一生，当然也做过好事，贺龙评价他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他“两头好，中间错”。这个“中间”，指的就是夏曦的肃反。薄一波前几年写了一本谈党史人物的书《领袖元帅与战友》，其中披露了贺龙在谈到湘鄂西肃反和对夏曦的评价时的激愤情绪和言词，贺龙说：“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得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这段话，涉及到了极“左”现象的发生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问题，很有启发性。实际上，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许多搞极“左”的人，个人品质都很成问题，夏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1936年2月，夏曦在行军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

亡。这无疑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

“永远的丰碑”在报道那些烈士的死因时，只报了死在战场上和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两种，没有报道死于错误肃反这一情况，如关于段德昌之死，只写了下面几个字：“1933年牺牲，年仅29岁。”从这个介绍看，人们一般只会误认为他是牺牲在战场上的，而实际上，他是死于“左”倾错误肃反，死在夏曦的刀下。不知主事者是出于何种考虑，但我总觉得是个缺憾。我认为，应当让人民，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历史真相，让人们知道革命的道路曾经是那样的崎岖艰险，革命的胜利是那样的来之不易，同时，也让人们从中汲取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书屋 2007年第4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回顾  | 陶恒生              |
| 学界新论 | 林则徐和渡边华山的西洋研究<br>接触英美<br>——中日近代最初的西洋认识<br>草色遥看近却无<br>——“后小泉时代”的“耻感文化” | 赵德宇<br>郭丽        |
| 旧事新识 | 鲁迅的一个世纪<br>鲁迅：四城记   | 刘畅<br>朱正         |
| 法制经纬 | 一杯价值百万美元的咖啡<br>自由与“生命”之间的取舍   | 陈伟<br>任东来        |
| 茶余饭后 | “我亦东林复社孙”<br>——冒鹤亭与冒辟疆一段隔世情缘<br>后宫轶事                                  | 秦燕春<br>张志东       |
| 裁书刀下 | 将进酒<br>——文盲随笔之五<br>You are all liars!                                 | 高尔泰              |
| 女性立场 | 道是无情却有情<br>——凌叔华与徐志摩<br>和伍尔夫一起写作<br>——《古韵》的西方视野                       | 黄文华<br>唐小兵<br>桑农 |
| 灯下随笔 | 江大年的手<br>猴子和她的独立战争  | 江森<br>祝勇<br>狄马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h5314@263.net

# 胡耀邦与电影《代理市长》

欧 初

从1983年7月开始，我离开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常务副市长的岗位，转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4年，著名电影艺术家杨在葆来采访我，要我专门谈谈如何当市长。原来杨在葆正在广州拍摄电影《代理市长》，由他执导兼主演，因而希望深入了解广州市政府改革开放的一些具体做法。

《代理市长》的剧本，源自一出反映广东改革开放的话剧《南方的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等，坚定执行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同时大胆提出全省财政包干等特殊措施，使广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先走了一大步。任仲夷1981年主持广东工作后，又开创出新的局面。我的老朋友、著名书画家李苦禅从北京来到广州，看到广州的情形十分振奋，对我说：“过去大革命时你们广东是策源地，现在改革开放广东又是策源地。”

我的次子伟雄当时是广州市文艺创作室的专业作家。受到改革热潮感染，他与合作者杨苗青、姚柱林一道，到白云山制药厂深入体验生活，根据该厂靠三口大锅起家、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胆起用人才、发展成现代化大企业的真实故事，写成《南方的风》。广州话剧团把《南方的风》搬上舞台，受到热烈欢迎。1984年国庆期间，剧组应邀到北京演出，产生轰动效应。剧中人物大胆改革的形象，引起观众强烈共鸣。演员的台词，不时被台下的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11月6日，《南方的风》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演出前，伟雄专程到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家中，邀请杨及其夫人、老戏剧家李伯钊观看演出，杨尚昆夫妇欣然答应。观

看当晚还有北京卫戍区政委许志奋等军政领导干部，以及戏剧学院的师生员工。

当晚演出相当成功。杨尚昆接见演员时，特地谈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刚于当年10月20日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杨尚昆强调：“十二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首次提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我们想不到全会刚结束，广东的同志已经把市场经济的戏带到首都舞台来了。”说到这里，杨尚昆指着伟雄大声说：“所以我说，小欧同志有先见之明！”

杨尚昆的高度评价，令剧组全体成员深受鼓舞。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邀请剧组11月29日到中南海礼堂演出。《南方的风》于是成为广东省自行创作的话剧中第一个进中南海演出的戏。演出那天，通常观众不满三百人的礼堂来了六七百人，习仲勋、陆定一、王兆国、朱穆之等领导以及许多老同志到场观看演出。习仲勋祝贺演出成功，并特别强调：“你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写，大胆地演，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伟雄和他的合作者根据专家和观众提出的意见，将话剧剧本加以扩展，故事的背景从企业上升到一个大市，写成《代理市长》电影剧本大纲，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北影厂派剧作家马林任制片人，陈怀皑导演。

杨在葆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他在电影《血，总是热的》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激情洋溢的当代改革者形象，1984年荣获中国电影第四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第七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他希望继续为改革开放呐喊，因此一



大力拨乱反正，深得党心民心。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

听说《代理市长》的故事，便马上主动请缨主演。后来陈怀皑因病退出摄制组，杨在葆又接过导演筒。

我在广州市人大办公室与杨在葆谈了几个小时。我告诉杨在葆，习仲勋、杨尚昆在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做了大量工作，除了提出办特区，更重要的是为大批干部卸下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包袱，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基础。杨尚昆十分重视经济工作，他要我兼市委秘书长，同时兼市外经委主任，提高外经工作的地位。

杨尚昆还派一个规格很高的代表团访问香港，代表团成员包括梁湘、范华、我等几位市委书记，还有汤国良和梁尚立两位副市长。我们访港期间，会见了郭德胜、胡应湘、郑裕彤、冯景禧、董浩云等大批企业家，探讨合作途径。我们还参观了许多项目，从发电厂到股票市场，还有准备开发的大屿山以及垃圾焚化场等市政设施。

我对杨在葆说：“改革开放，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访港回来，由我执笔，我们这次访港的负责干部联名写了一份报告，谈如何参照香港的方式，解决电力问题。我们的报告还提到香港有数千菲佣，每月工资三千元，两年一换。珠江三角洲历史有“自梳女”外出帮佣的传统，可设想组织人到香港做佣人，至于具体做法，可另行研究。杨尚昆后来提到，当时有人看到报告十分不满，说：

“这是亡国奴思想！”不久广东开始筹备建广深高速公路，有人顾虑说：“建了高速公路，农民的牛走哪里？”

我在市政府工作期间，许多事情都有波折。引进外资、火柴加价一分钱、修桥修路收过桥费等等，都引发争论。鉴于当时广州全市的电话总共才几万台，我们提出按沙特阿拉伯的模式，引进外资迅速扩大电话容量，有人却强调保密问题，同时认为解放以来广州的电话容量增加速度已经足够快了。我们开过多次会，我还到北京找曾在广东工作过的

的两任邮政部长文敏生、杨泰芳。但直至我离开市政府，电话升级换代问题仍未解决。

广州市中心与番禺距离很近，但被河道隔开，来往不便。何贤、霍英东等几位番禺籍的港商提出投资建设洛溪大桥、以征收过桥费偿还投资的方案，几经周折后终于获批。因为建大桥牵涉很多主管部门，设计、施工过程中许多问题都要市政府出面协调解决。洛溪大桥跨过珠江后航道，为了确定桥面高度，我主持开了十几次会议确定下来。

杨在葆采访我之后，与马林两人通力协作，日夜奋战。马林改完一段剧本，杨马上接过来写分镜头剧本。我介绍的一些细节，被他们吸引到剧本中，剧组还选定洛溪大桥的施工现场作拍片的外景。

《代理市长》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归侨工程师萧子云出任瀛洲市代理市长。他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一上任就当众宣布要为全市人民做十件好事。为了缓解交通紧张局势，他号召农民集资建桥，并得到一批富裕起来的农民积极回应。萧子云还支持白云制药厂厂长刘力勋，大胆起用尚未平反的技术人员李华心积极研制新药，做出很大贡献。李华心的女儿、技术员李玉芳考试成绩优异，但有关部门因为李华心的“问题”不批准李玉芳出国进修。萧子云知道此事后，

建议由白云制药厂出资送李玉芳出国留学。

萧子云代理了三个月市长，做了五件好事，却遭到了许多责难。一直支持萧子云的市委书记罗挺，也认为萧的一些做法欠妥。萧的妻子薇红、女儿肖肖为此感到不平。萧子云对改革坚定不移，坚信“万事利于国，万事利于民”就是和中央保持一致。他向罗挺直率阐述改革主张，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为了实现上任时所许“做十件好事”的诺言，萧子云要求再代理三个月市长的职务。

片子拍摄完，杨在葆留在广东剪辑。北京电影制片厂催杨加紧完成，赶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放映。据当时文化部负责人周巍峙的小儿子周八月告诉杨在葆，周巍峙看了《代理市长》觉得很好，说：“杨在葆是个演员，还导了部电影。”《代理市长》很快获文化部电影局批准公映，还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放映，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长们看完电影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不久，中南海的星期五电影晚会也放映了《代理市长》，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宋任穷等出席观看，丁峤、石方禹、艾明之等电影界负责人也在场。电影放完，胡乔木和邓力群要丁峤等留下，批评这部电影有反气。其中一些台词，如说“过去老百姓生活苦没人管”，说“有本事的王八蛋比没本事的白痴强”。他们特别强调“宁犯天条，不触众怒”一句，一定要改。

北影厂负责人胡其明找到杨在葆，说：“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对这部电影有意见，要改。”杨听了很生气，直接找电影局长石方禹问：“你不是说这部电影很好，你看了很感动吗？怎么要改？”石方禹说：“我是说过这部片很好。但是领导说了话，丁峤要我传达。我是一级官员，我要传达。你是艺术家，改不改在你。”

杨在葆坚决不肯改，马林也支持他，而且建议他写信给胡耀邦。当时伟雄在深圳体验生活，杨在葆与他通话，一致同意不作改动，同时立刻上书。杨在葆就在马林家中找一张大纸，抬头竖写为“耀邦、启立同志”，然后写道：我拍成电影《代理市长》之后，有领导同志对此有意见。我不懂人情世故，给您们写信，请抽空帮助指导。

杨在葆写完信后，谢绝了托熟人转信的提议，借了马林的自行车直奔中南海。在《代理市

长》中饰演李玉芳的女演员陈丽明陪杨在葆一道去投书。他们先到中南海北门，经卫兵指点又转到西门。陈丽明当时还是军人，不方便与卫兵打交道，杨在葆遂独自走向中南海西门。

杨在葆还未开口，站岗的卫兵已经认出他，脸上浮出微笑。杨说：“我有封信，想交给耀邦同志。”卫兵请杨在葆到传达室，但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说按规定不能直接收信，要杨到邮局寄挂号信。杨在葆正试图说服值班人员收下信，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说：“让他把信留下吧。”杨在葆连忙转身问说话的人：“同志，贵姓？”那人说：“姓张。”原来他就是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当时恰好经过西门。杨在葆告诉张，写信是为了一部电影，张耀光说耀邦在北戴河开会，信先留下，一定转到。

过了五六天，杨在葆刚回到上海，就接到胡其明的电话，说胡耀邦已经在杨的信上作了批示，将信转给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长朱穆之等三人。批示的全文是：“转启立、厚泽、穆之同志：我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不错，比那些跟四化不沾边的好得多，不知好多少倍。有点儿刺，有什么不可以？”

胡耀邦的批示一经传达，《代理市长》的上映一路绿灯。电影先在北京放映，受到高度评价。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等先后请杨在葆等座谈。然后，杨在葆率剧组从广州开始，经武汉、郑州等地，将电影带到东北，一路掀起“《代理市长》热”。往往电影才放到一半，观众就热烈鼓掌，为剧中人物的言行叫好。有一期《大众电影》杂志还专门开出专栏，刊登了《代理市长》的精彩台词。

这部影片反映的改革胆略观念，对刚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产生强烈的冲击。辽宁省朝阳地区某矿党委书记说：这部电影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大美女，没有缠绵的爱情，但是好看。影片的主要创作人员事后总结说：“这部电影没有精雕细琢，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当时我们有个使命感，觉得需要振奋人心的大声呐喊，需要把声音喊出来。正是这种促进改革的强烈呼号，在上至总书记胡耀邦、下至各地群众等不同阶层都引发共鸣。杨在葆凭借《代理市长》中的精彩演出，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周艾若

此行益阳,为纪念母亲百岁冥寿。老一辈人过生日,兴的是农历。母亲诞生于丁未年正月十八,到今天整岁百年。

纪念即回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35年。她去世的时候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

父亲诞生于丁未年十月初二,比母亲小八个多月,都是1907年出生。他们相识于外婆家。家中设有私塾。延聘的姚老师牵线搭桥,为这对两情相悦的人两全其美。尔后母亲伴父亲长沙读书,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文化工作。文化而在地下,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那年,父亲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坚定信念,显示出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年轻人中有志者的无畏气概;他的文化生涯,也就在那血雨腥风中昂然起步。他所接触的新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支配着他一定要推翻地狱般旧中国,有着九死不悔的决心;他要用他文化的智慧参与呼唤国运的未来,挽民族危亡于既倒。那时的生活,大体是带着自家的财产,连同各自的性命,在不断躲避特务的搜捕中,频繁找租界,不断换房子。母亲紧随左右,照顾安全,相互温存,提供资用。表面上是个普通且睦邻的知识小家庭,一切都平平常常,若无其事。父亲闭门写作,翻译,日夜埋头书案,较少出门;也常有熟面孔入室,聊天欢笑,甚至住下,便于密谈。母亲则大模大样,一桌麻将,外间望风。或教我唱歌跳舞,描红临帖,唱京戏。我最喜欢《麻雀与小孩》,这是湘潭人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研究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历史地位的。但也极少有人像我心中如此珍藏这一经典至今不忘。这是一出引导儿童要懂得爱的曼妙歌舞。加上母亲独自教我,



后排左起:外婆、二弟、母亲、父亲;前排为本文作者(摄于1931年)

那母爱伴着母教种植我心田的东西,是一种柔和情爱的东西,奠定了我喜爱文艺的情性,以及后来我那以母爱为人类一切爱的源头的伦理认定。记得那时还带我去电影公司拍过电影,曾与扮演小贩的著名影人韩兰根对戏。长大后母亲告诉我,那影片名《粉红色的梦》,没有让我演到底。导演要我笑时我哭,要我哭时反哈哈嘻嘻。回想起来,虽然我缺乏表演悟性,但作用于我对艺术的亲热,可谓终身享受。

那年月在上海的生活,看似平常却紧张又离奇,充满惊险;虽然懵懂无知的我并不怎么觉得。

却也有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细节：住日租界虹口时，我曾写过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一天，听说日本人挨家搜捕共党，殴打中国警察，吓得我赶忙把标语撕毁，自行解除了警报。其实真正的危险在成人保护下小孩子是难以遭遇的。数十年后的80年代，父亲住进北京医院还没有成为植物人的时候，给身边侍候他的我二弟讲过一个30年代在上海发生的故事：两位从益阳脱逃被通缉的青年女子在上海找到父亲。其中一位据说是益阳当地农民领袖。父母商议的办法是立即在附近再租一间房子，让父亲与那个农民领袖扮成夫妻模样，另一位为小姨子，三人同住以遮人耳目，力保安全。这情节听起来，像电视中的胡编乱造，而生活中是何等危险，充满变数。那时母亲的种种表现，令父亲数十年后仍感叹不已。他归结为这样一句：“你妈妈真是十分纯粹的人。”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大批追捕杀害共产党人。左联五烈士就是这年被杀害的。处白色恐怖中的日子，在老家的亲人尤其是外婆极为牵挂，于是下半年母亲领着我们回到益阳。到1937年秋冬时局十分混乱之际，偏有人暗地里从肤施（即延安）捎来一套父亲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给我母亲，还带给我一件紫红色呢外套。捎东西的人是一位著名的早期女性共产党人。那些年的冬天，我总穿着它在桃江、修山脚下外婆家到处玩耍。逃难期间如此穿着，在绿色田野中额外招人注目。那时外婆已经病得不轻，母亲与舅舅围绕身边，随侍左右。两年后外婆去世，母亲悲恸欲绝。半月中每天走很远的路领着我们去外婆坟地哭诉。这是我生命经历中遭遇的最为悲惨的场景。哭坟比哭灵更惨绝人寰。也许只有集悲号与悲歌于一体，才能释放出心中深沉的悲痛。原本是最能将悲苦严严实实包裹心中的母亲，从不流露出一星半点苦楚悲情的母亲，在这荒野无人，身边只有拉着她靠着她陪着她一道流泪的两个儿子的情境中，她才会如此一缕缕申述着失去外婆的绝望心情。她深藏久蓄的无尽哭诉，也只能面对那旷野无声中外婆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

生离死别，人生常态，人间苦况，尽在其中。外婆过世，母亲因无法承受的悲苦而郁悒不起，重病卧床。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

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的期望，但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看着母亲肿胀的脖颈，而全身骨瘦如柴，说话已无力气，我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当时家境，已一贫如洗，经济没有进项。请医生诊治，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一批批卖掉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来不及卖掉时干脆以瓷器相赠酬谢医生。母亲卧室中那一排红漆玻璃立柜中琳琅满目的器皿，逐个依次消失。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有个医生则使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近筷子般长短的什么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我实在是不能再看了。虽然我没有听到过母亲扎针时的叫唤，我总是全身充满恐怖，神经紧缩，以至泪流满面。她就这样忍受着。月月年年，不论日夜，从不呻吟，从不喊叫着内心或皮肉的任何巨痛。直到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母亲悄然而逝。她没有任何遗言留给她钟爱的三个儿子。她的忧伤，她的耐力，她的遗言，连同她的厄运，一起包揽了去。她从未有过任何怨怼，只留下一生的宽厚与善良。她是一位连微笑也清澈而深蕴着人间厚德的母亲。正如父亲所赞叹：她是一位纯粹的妈妈。

母亲去世，我忽然觉得一下子长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我先后在我伯父任校长的周氏祠堂内得英小学，与村保国民小学当教员。村保国民小学就办在自家大屋正厅。有伯父的照顾，又有自家大厅做教室的条件，加上那点中学初二的学历，再加上我们全大屋兄弟姊妹都每天大唱抗日歌曲的学堂氛围，16岁那年，终于教小学了。但不知母亲在天之灵，知不知道？

接着日寇犯湘，我只得另谋出路。趁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之际，我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与鞭炮声中，经湘入黔抵修文县，加入了青年远征军二零五师一个以益阳知青为主组成的机枪连。在那里取得了与重庆新华日报社的地下联系。从而将我写给父亲关于母亲此时的悲情长信，转到了延安。这中间的联系人是何其芳。从此有半年多的相互通信，未曾间断。二五师一直驻修文“阳明洞天”附近，没

有挪过地方。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传到营地当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呐喊声响彻云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什么是普世欢腾的爱国热情。遵照何其芳指点，退伍后我没有回乡，立即奔走南京，带着他的信去梅园新村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适逢国共又一次和谈。美国马歇尔从中斡旋。每周固定一架飞机在南京与延安之间往返一次。有一天原本安排了我的座位，偏偏那天通知我时，我游中山陵去了，座位让给了别人。命中注定我在继续等待下一趟飞延安的专机时，恰巧父亲也到了南京。他在办事处知道我在南京，便立即来找我。那时我住白下路表哥胡有萼家。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夜，我正在楼



1979年11月1日，周扬在全国四次文代会上作报告

下乘凉。院子里散布着外交部门的家属成员。打赤膊，著短裤，拍蒲扇，赶蚊虫，说着闲话。忽见大铁门外一西装革履客人直奔我打听胡有萼。他显然是目标明确地发现了，而我定睛于他后顿时生出了意外的喜悦。难道是我父亲突然来到？！黄浦江边分别时我不到七岁，而此刻我十八岁了。父亲，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一阵兴奋，便拉着他的手进了楼门，上了楼梯，后面还有两位同样绅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来。正在楼梯拐角处，他停住脚步把我拉近身边问我：“你就是艾若吗？”是啊！”顷刻间相互证实了各自的判断，凭乡音凭相貌也能做出的判断。他便立即回头介绍：“这位是潘梓年……”我只顾向楼上喊表哥快出来。

这次父子见面后，我几次去南京新华书店楼上父亲的暂居处。而他们此行南京，是美国邀请中国学者去美国讲学。国共两党各组团应邀参加。父亲是共产党这边的团长，正在办理出国手续。这段时间内，父亲让我赶快回益阳把两个弟弟带出来，以便从上海坐船北上，走张家口先解决上学问题。我便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回益阳，找到两个弟弟，还有堂姊表兄等等，一起赶到南京。而父亲头天已去上海。他在表哥处留下的两个地址是上海的邓颖超与章汉夫。当我们赶到上海新华书店章汉夫所在地，又是头一天父亲已北上张家口。原来应邀去美国讲学的共产党三人小组被国民党卡住，这才折回北方。在上海我们男

孩子住朱葆三路新华书店楼上，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进步书刊。女孩子住静安寺路周而复家。开始等章汉夫为我们买船票去天津。当时的局势是国共合作又一次破裂，北方打起来了，船票没有买成，而且保证不了我们前去的安全。在章汉夫的多方劝说后，我们只得再回益阳。从此又断掉了与父亲的联系。

解放战争中的1948年秋。我与原在青年军结识的益阳朋友周一萍等五人，从武汉北上，在驻马店化装为商人穿过封锁线到了刚解放的许昌。我与周一萍加入了当时的刘邓大军。军区立即与我父亲联系并特许我再扮商人模样回益阳把弟弟接到解放区来。于是我又一次穿越封锁线回益阳把两个弟弟，两个表妹，还有好友蒋力田等一行六人带回军区。按父亲的安排，我们六人继续北上到北平分头转入华北大学与育才中学。当我兄弟三人终于在北平见到父亲时，父亲对我们说了些什么现已不大记得，但其中的一句是无法忘却的：“我对不起你们的妈妈啊！”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上世纪80年代在医院还对我说过不止一次。在我六岁以前的日子里，我记忆中的父母之间，只有爱与和谐；在我已经60岁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人道主义思考的普遍真理性。我父亲压根儿就是个人道主义者。

(2007年3月7日·益阳)

(责任编辑 萧 徐)

# 我和孟氧的交往

谢韬

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中共中央请吴玉章老担任校长，成仿吾、范文澜二老任副校长，校址初设在河北正定县。我当时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吴老知道我曾在金陵大学开过课程，教过书。因当时华北大学学生很多，而教师正缺，所以，吴老把我调到华大担任哲学系教员，在社会科学系担任系支部书记，做何干之同志的助手。华北大学1949年3月迁入北平，大批年青的研究生和学生留校担任教学及辅导工作，这些年青同志都是在学习和工作中表现很优秀的。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个优秀的青年教师群体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承担了全部的教学任务。这个优秀的群体，我接触到的一些人，很多都成为新中国卓有成就的学者，成为党在新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如清史专家戴逸，清代医学史专家吕英凡，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高放、理夫、刘佩弦，经济学家苏星、孟氧、方生、俞明仁，中共党史专家王奇、刘炼，近现代史专家彭明等。这些同志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都有独立的卓越的学术成就，而且在学术成就与个人品格方面都是才德双全的。但在这个优秀的学术群体中，惟独孟氧有着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性格。他的遭遇特别困难，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革命中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坐牢13年。面对死刑，在长达13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依然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令人匪夷所思，其坚毅的品格令人钦佩之至。

我也曾被关押在狱中，历时十年之久，我深刻体会到这种监狱生活在精神上的折磨人和身体上的折磨人，长期关押对人身摧残的残酷性。抛开那些改造的官话套话，实际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就是要把人变成一部听话的驯服的劳动工具，没有精神、没有思想、没有性格、任人摆布的政治商品，是中世纪原罪论的永远背着十

字架的精神苦役的负担者。在这种严酷的条件下，在面对死刑判决的精神压力下，孟氧能够镇定自如、沉着冷静、从容不迫地从事学术研究。在材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他不仅仅是在经济学的本行，而且还在法律、历史、古代史和梅林的《马克思传》中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在狱中写成的每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逻辑严谨的论证，这真是令人惊异和敬佩的。孟氧这种惊人的毅力，惊人的才能是来源于惊人的学术根底和惊人的人格品质，惟有这样，才能在这种条件下取得如此令人佩服的成果。

孟氧是奇才，他在青年时就选择了注释《资本论》历史典据的艰巨的课题。马克思《资本论》中涉及的知识面之广，涉及欧洲以及世界历史的各种事件，包括历史、法律、文学、哲学、经济、社会、宗教等各种知识，要追踪其中的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典故、一个思想、一个人物、一本著作、一个争论、一个神话、一首诗、一句戏剧台词的来龙去脉，这些见于何处，何年何月何地等等，以及本意和引申意。从事《资本论》历史典据的注释，其艰巨困难，对于一个中国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教师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作，而孟氧做了，做得独有成绩。他的各个时期的版本，曾为很多大学重复印刷，广为流传。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005年版本，一共注释了词条359条，40万字，从最初1954年草稿本279条15万字，几经补充修改、增订，最终由孟小灯整理完成的是最新版本。孟氧的注释成为各界学习《资本论》的重要参考材料，许多学识渊博的经济学界的专家和历史学家都从《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中得益，提高和加深了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理解，孟氧真的成了人们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优秀助手。一个人能够在一生中做出一点成绩也很不容易，而孟氧

做出的是对伟大的马克思创作的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历史典据的注释，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做了基础的、扎实的工作，他的贡献将伴随着《资本论》而长久流传。

孟氧的讲课也是很受学生研究生欢迎的，他能把高深复杂的经济学原理结合实际，通俗、生动地帮助学生理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消化掌握所学到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来观察、分析问题。孟氧讲经济学充满论证，逻辑严密，用历史观点，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来龙去脉讲得津津有味。他拥有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语言词汇的丰富多彩，使他能用平凡生动的语言和例证来说明理论思想的深刻性，善于用比较的方法来阐述经济学上的各种理论和观点。他平易近人，对学生平等相待，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一次，他在与我闲谈中曾说：一个大学如果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课本，不让学生独立思考，不鼓励学生打破陈旧观念，不去开拓创新，这种大学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除《资本论 历史典据注释》之外，孟氧另外还有两本著作《恩格斯传·经济学篇》和《经济学社会场论》，也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场论》体现了他独巨匠心的创建和成就。

这篇序里，我还要特别称道的是孟氧的女儿孟小灯。一个只有中学知识储备的孩子，在她父亲被关入监牢的时候，她深信父亲是好人，是无辜的，几次冒着危险去狱中看望自己的父亲。在孟氧去世后，她夜以继日的一字一句地辨认孟氧的手稿，竟然整理出《资本论 历史典据注释》，而且还整理了这些狱中的文稿。这种毅力和艰苦勤奋的学习精神，也是令人惊异和钦佩的。我为孟氧有这样的女儿而十分高兴和安慰。我见过许多我们这一辈人的子女们，在我们受难时或受难后能得到子女的理解，并有共同语言的就很不容易了，更不要说在知识悬殊的条件下去整理自己父亲的遗稿。在整理的同时，她不但自己学到了知识，又取得了成果。孟氧死而有知，他身后有如此勇敢、智慧、勤奋的女儿把他凌乱潦草的手稿整

理成文而出版，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感到无限安慰！

我的这篇序写得很零乱，说了些正常写序所不常有的话，要知道像我这样年届八十六的老人，就一生波澜起伏，所闻所见，而能在晚年写这种序，是我的幸运。我老泪横流不知多少次了，面对孟氧这样的学者，这样的悲惨遭遇，这样的著作，这样的思想光彩，这样的女儿，这样的父女情深，这样的人间少有的超凡的毅力和勇敢，又有谁能不动心啊！我捧着这本书，这本来之不易的书，这本充满苦难和智慧的不平凡的书，这当中充满了多少艰辛、忍耐，而又大气磅礴。

漫长的狱中十三年寂寞岁月，虽然很难度过，孟氧却把自己提升到历史眼光的最高点，人品的最高点，他的狱中之作，其中每一个字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和智慧，他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这里所留下的不是几篇普通的文章，而是一个学者的光辉人格，字里行间跃然挺立着一个悲剧时代受难者的可敬形象。从这里我们看到用墨写的文章熔融着作者用生命的血写就的思想光彩和历史的反思。暴力只能摧毁人的躯壳，而永远摧毁不了人的灵魂。流泪的人民，会在流泪中觉醒成长，孟小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成长的，她和她的同辈们会比我们老一辈更坚强，更拥有历史凝聚的智慧和知识的力量。

(2007年1月28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 本刊更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3期第67页右栏第5、6、14行中的“批邓”应为“批邪”。第75页左栏第33行的“萌牙”应为“萌芽”。第4期第4页照片说明应为：“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合影”。第10页照片说明应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郊区和平乡八户樁村维吾尔族农民报名入社”。第14页、15页的“赢”应为“羸”。第18页右栏末行“(下转56页)”应为“(下转58页)”。第58页左栏“(上接15页)”应为“(上接18页)”。第66页、71页照片说明中的“作者”应为“巫宁坤”。谨此更正，并向读者和相关作者致歉。

《炎黄春秋》编辑室

# 给大学以“精神空间”

——关于大学教育问题对董健先生的访谈

丁芳芳

丁芳芳：董老师，您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其中谈论教育的部分，更是引起了特别的关注。我想也是因为目前大学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的缘故。比如最近人大的“张鸣事件”，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大学的官本位、行政化等问题。请您谈谈对中国大学现状的看法。

董健：其实中国大学的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一句话，就是旧体制与改革开放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目前大学的状况，令国人不满意，更令有识之士担忧。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有公论，人类有共识。我们看到了“现有”与“应有”之间不小的差距，故而理所当然地表示不满和担忧。

在我看来，欲知一国文化品位之优劣、精神文明之高低，以及传承人类文明之力的强弱，首先要看她的高等学府。这是因为大学是出思想、出人才的地方，是国家民族的最高文化标志，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我国明末清初的一位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这意思是说，国家遇到有分歧、有争论的问题，皇帝也不敢自以为是，而是交到大学里去研究、解决。天下真理不是出自最高政治权力的中心——朝廷，而是出自最高学术的中心——大学。这可以说是现代大学理念在我国最早的萌芽。西方大学产生后，大致也是这么看的。在现代，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成为最高、最大的精神产品的产地，也只有首先成为这样

的产地，它才能称得上是国家的“人才库”、“思想库”。回顾历史，中国现代的大学都是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今天，中国大学仍然承担着现代启蒙的重任。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认为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所以他主张改变大学日益专业化、科层化和国家化的趋向，重新恢复和光大大学自产生以来就具备的启蒙主义功能和世界主义的色彩。“启蒙”西方的表达是 Enlightenment，即以理性之光照亮人的头脑。中国讲“豁蒙”、“开启民智”，大抵也是这个意思。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实现其目的：在这个“量化”、“物化”的时代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想品格和创新精神的人才，而不是把学生制作成“格式化的一代”。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不要把学生造成“有用的机器”。

丁：要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大学最缺的是什么呢？

董：中国大学最缺的是“精神空间”——从学校来说，是独立办学的权利；从师生来说，是探求真理、钻研科学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目前中国大学尽管在财政拨款上得到的支持，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还远远不够，但不管怎么说，大学的“物质空间”已有很大的改善，有些学校的硬件设备一点也不比发达国家的差。但中国大学的师资水平和“产出”（毕业生与科研成果）质量却与世界一流大学差得很远。难怪人大代表洪可柱愤怒地指责说：“巨大投入没有相应有价值的产出，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

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的价值和思想方面,众多名校作为甚少!”这批评,这指责,应该说是尖锐、有理、有力的。

丁:这几年人们常常引用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话,同样的意思,一位美国大学校长早在1874年就说过。我想,这实质上谈的就是精神空间的问题吧?

董:是的。你所说的美国大学校长,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始人、该校第一任校长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我国大学这几年的发展,眼看着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一所所经合并、升级、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颇有“大跃进”虚夸之风)而来的“新大学”规模越来越大,而“大师”却不见踪影,大学的“精神”日见萎缩。精神萎缩的直接表现就是:“官场”之风未见其少,“商场”之弊又乘市场经济之势而来;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下降,应付作假的“本事”看长;大学风气(学风和学术空气)恶化——抄袭剽窃,屡禁不止,非法收费,屡有所闻。几年前我曾撰文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不过,今天面对人大代表这样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我却有一些为大学的校长、书记们与师生员工们抱屈了——问题虽然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根源却在我国教育几十年不改的僵化体制上。这种官本位的、非民主非学术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再加商品化大潮的袭击,使大学失去了起码的“精神空间”,异化为机关衙门、异化为商场,甚至听说一些黑社会式的“潜规则”都居然被“引进”了大学的校园。大学早已失魂落魄!大学精神溃不成军!

丁:确实,把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仅仅归结于高校的领导或教师身上,不仅有失公允,而且误解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常常也听到许多高校教师反映工作压力大、各种指标考核过多、管理僵化等问题,使人整天陷于“忙”与“累”甚至“烦”之中,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

董:中国大学的头头们忙不忙?很忙!中国大学的老师们累不累?很累!他们出的“成果”多不多?单就文科来说,实在是不少,也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各种“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近几年博士生培养的数量,差不多是世界第一!

那为什么还会引来人大代表的批评和指责呢?说起来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些“忙”和“累”,与那种独立自主的、遵循着教育规律的,简言之,具有基础性和创造性的大学本职工作(教学和科学研究)大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恰如机器之空转。也就是说,做领导的并没有“忙”在真正的“大学之道”上,做教师的也大都未能“累”在真正的科学、真理的探求和人才的认真培养上。行政性、事务性以至商务性行为侵占了大学的许多本该用于教学和科研的宝贵时间。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垄断了各种权力与几乎全部资源的格局下,面对那些应付不完的“评估”、“检查”、“汇报”,填写不完的报表、材料,争取不完的种种标志学校“水平”、“地位”的这类“点”、那种“站”的申报(从硕博点、博士后站到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不等),还有各种名头的会议、活动、接待……等等,谁敢怠慢?对许多教师、研究生来说,不是出于学问的兴趣而是为了职称、学位而不得不炮制那些买版面登在“核心刊物”上的“论文”和买书号出版的“著作”,为了能在目前体制下生存,不得不去申报并“按要求完成”那些自己不感兴趣也无甚研究价值的“项目”(这些项目由谁来选定?批准给谁做?都大有问题),再加上本单位为了“创收”(多多捞钱)而额外加在他们头上的这个“班”、那个“课”,……谁能不忙?谁能不累?

丁:谈到“忙”与“累”,我联想起据有人考证,西语中的“学校”和希腊语中的“闲暇”基本同义。这是否意味着教育的本位应该是一种“闲暇教育”与“自由教育”,其本质应该是一种自由而宽松的精神与思想的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董:是的,“忙”与“闲”看似一个时间的松、紧问题,其实不然,而是一个“精神空间”之大、小、有、无的问题。

这个问题现代西方教育家有论述,亨利·纽曼(Henry Newman)曾发表《大学的理想》的著名演讲,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大学是为“自由教育”而设,而不应仅仅是狭隘的专门化教育。我们的老祖宗也有精辟的见解:明代思想家、戏剧家汤显祖说:“何谓忙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

也,即有闲地焉而甘之。”显然,在这里“闲”与“忙”并非指事之少与多、时之松与紧,而是指人的精神之自由与不自由,即“精神空间”之大、小、有、无的问题。汤显祖本人的传世名著《牡丹亭》(这是对人类有普适价值的贡献)就是从“忙地”到了“闲地”(处于精神自由的境地)之后才创作出来的。显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怀疑、批判,突破、创新,要做到这些,太实用、太势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行,要能担待、能超脱,要有人格。这些都是成就了汤显祖和一切在科学、艺术、文学上有重大创新者的基本因素,对我们今天的大学难道就没有一点启发吗?

我曾说过全世界大学的领导和教师,恐怕没有像中国同行这样“忙”和“累”的。然而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忙”和“累”呢?当今的状况让我想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的“忙”和“累”。我那时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们“苦战”24小时(不曾合眼),用小高炉“土法”炼出了巴掌大一块“钢”,当然是废物,还敲锣打鼓向校长献了礼。狂热而蒙昧的我们浪费了资源,虚掷了精力。我们还以“大批判”开路,两月之内集体编写了一部60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作为“大跃进”成果报过喜,但不久就作为废纸处理了。我们今天“鸟枪换炮”,阔气多了,但我们的“忙”和“累”,在受制于集权主义僵化体制、违背大学之独立精神和教育之客观规律这一点上,与1958年似乎并无二致。而当今的 leadership 在统得死、管得严、要“数字”、要“政绩”这一点上,也似乎与58年的 leadership 没有什么不同。细想起来,其实我国的教育领导体制几十年来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年年叫“改革”,只是“口号”有些变动而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是不提了,但这一口号下产生的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行政化手段和行政化运作模式则并无根本改变。而这种高度集中又无监督的权力一旦与市场经济下“钱”的魔力结合,就会做出许多可怕的事,会从根本上掏空大学之“魂”,破坏人民的教育事业。“哪里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高尔基语)。如果政治再插上“钱”的翅膀,文化教育就更要被赶到边缘,没有什么“精神空间”了。但机器空转,虚假繁荣,骗过了不少人的眼睛,他们看不到缺少“精神空间”的教育

的危机。

丁:在实用主义价值理念因为种种原因盛行于校园的今天,要保持大学的独立性,拓展大学师生自由、创新的精神空间,您认为可能吗?要想创造出这样的精神空间,关键是在哪儿呢?

董:我认为完全可能,虽然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这有赖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和谐进行。大学的独立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精神。政治改革的首要目的就是民主和法治秩序的建立,这也是大学的希望所在。从温家宝总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文章和讲话中,已经看到了这种希望和可能。说到大学的独立性和大学师生的自由精神、创新精神,我觉得大学校长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她)应该是大学精神的忠实的守护神。不用说,蔡元培是现代大学校长第一人。从他的《教育独立议》就可看出他教育思想的光辉。他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大学不交与教育家去管,必然变成官僚化、行政化的机关。1927年,蔡元培曾提出大学管理要“改官僚化为学术化”,但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与推行党化教育而未能实现。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已经有了实现蔡校长教育思想的条件,也完全有这种必要与可能。要防止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就必须实行教授治校、教育家管教育。

有一流的校长,才会有一流的大学。大学校长不应该是政府官员,应是很高文化修养的教育家,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应是大教育家。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北京大学前有蔡元培,后有蒋梦麟、胡适之,清华有梅贻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有罗家伦,南开有张伯苓,浙大有竺可桢,燕京有司徒雷登,等等。应该说这些前辈在当时都是一流的大学校长,也是一流的教育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各不相同,但尊重学术自由、维护教育独立则是一致的。今天尚在世的、为数不多的一流学者和科学家,大都是在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建国后也有一些好校长,尽力维护大学教育的独立和尊严。像南

京大学的校长匡亚明，他在“文革”之初被康生等抛出，就是因为他作为教育家在那些摧残教育的“党棍”们的眼里是个“另类”。记得“文革”刚刚结束时，匡校长复职，他不顾流行的政治框框，迅速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重新聚集卓越人才。“文革”中被开除出党、还戴着“叛徒”帽子的著名作家、戏剧家陈白尘，被匡老聘为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被武汉大学发配到街道上“监督改造”的著名学者程千帆，匡老派专人去请他到南大任教。等到几年后，他们的冤案都平反了，有些单位也想用他们了，但早被匡亚明占了先！这些在华国锋时代是“违规操作”，但对教育来说却是功德无量的、有远见有学术眼光的善举。陈、程二公的引进南大，至今传为美谈，与这两年那些花大钱互挖墙脚的做法有本质的不同。我想，一个“很会做官”、把政治看得比教育更重要的人，是不会有此善举的。在匡老领导下的南大，有官气的人吃不开，学者文人受尊敬。这是个文化价值观念问题，在不少大学里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丁：像匡老那样一种开明、通达、远见卓识的办学眼光至今还让人怀想不已！在回顾历史时，我们甚至可以听到“世上已无蔡元培”的感慨，您怎么看呢？

董：当今众多的大学校长们，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能人，但他们均被体制安排成当官的，有的还是“副部级”，并被告之要争取当“政治家”。他们在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面前，一个个都是“听命”的下级，只能被卷入僵化体制的“大机器”中跟着转，不可能作为独立的教育家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的学者文人，本来还有些远见卓识的，但他们不是去冲破体制，而是慢慢适应体制，学会了做官。先是开会不习惯，不会说假话；慢慢开会习惯，会说一点假话；最后不开会不习惯，在公共环境假话连篇。这个“三部曲”真实反映了管理体制对教育本位的腐蚀。在“官本位”的大学里，行政管理人员比教学科研人员多，当官吃香，教书做学问吃憋。此为多年痼疾，迄未解决，这就是腐蚀着我国教育的大学行政化的表现。只要校长是教育家，大学有了“精神空间”，办学自主，教育独立、教授治校，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丁：关于“高校教学质量评估”，其中的“弄虚作假”、“奢靡腐败”等丑恶现象甚至已引起公愤。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说，他曾就此问题在2005年的政协全会上提交议案，但并未能得到重视。

董：评估问题确已引起公愤。首先是全国的大学都被纳入同一个评估体系之中，不分地域，不分层次，不分类型，考察的都是博士点、院士、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的多少。全国所有的大学都朝一条路上挤。有的师范类学校，有自己很好的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传统和优势，也被迫去与那些研究型大学拼高低，去争什么博士点。甚至花钱买一个院士装点门面。一到评点时，大学的领导们就得忙着找路子、跑关系。这方面，藏污纳垢，人所共知；丑闻多多，不屑再谈。其实，现在在官僚化、行政化的管理中，实行的那些意在推动大学发展的激励模式，差不多已经完全失灵，甚至变成了教育腐败的“由头”，如学位点、重点学科、研究基地的评估，就是如此。我有《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专写此事，见《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第18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所谓评估，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行政指令性行为，缺乏学术独立性。专家组（包括评学科点、社科项目、评奖）的组成，也缺乏学术权威性。量化管理的结果使得在评估过程中，专家被削弱了发言权和最后的决定权，使得真正优秀的人才未必能得到公正的评估，从而掩盖了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而行政管理人员仅凭统计表格就可以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

我认为这些评估之类的活动可以暂停，给各个学校以充分的自主权，任其按实际情况重新调整。大学应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只要教育部放开来，不要垄断一切，不要把所有大学都赶进一个模子里，允许有思想的教育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施展才华，办各种类型、各有特色的大学，我国高等教育就一定会走出困境，得到健康的发展。

丁：董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相信您对大学教育问题的深入思考会给人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也希望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责任编辑 萧 徐）

# 文坛低俗化

## “三头主义”大行其道

马识途

我们作家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对建构和谐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用我们的笔,形象地、深刻地描绘中国人民在建构和谐社会中不懈的奋斗历程,描绘在各种矛盾的纠结和演化中,他们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追求和迷离,希望与失望而终于前进的曲折过程。表彰伟大的民族精神,优良的道德风范,歌颂真善美。揭露一切阻碍历史前进、残害人民的黑暗势力,批判假恶丑。用我们的高尚的思想,优美的文采,真挚的情感,去抚慰人们的心灵,鼓舞他们的斗志,娱悦他们的生活。

但是,我近年来对中国文坛静观默察,看到在文学和影视创作中出现某些低俗化倾向。在利益的驱动下,低俗、庸俗、媚俗、恶俗之风,不胫而走。花花绿绿,摆满书市。有意打“擦边球”的泛黄作品,所在皆是。以至身体写作之类,“三头(枕头、拳头、噱头)主义”之作,大行其道。至于戏说中国历史,乱改红色经典,歌颂封建帝王,淋漓尽致展示性生活,已是充斥书市和荧屏,司空见惯了。

与此同时,一直作为文学主流的高雅文学日益边缘化。读者越来越少,出版越来越难,印数越来越少,稿酬越来越低。有人告诉我:你50个高雅文学作家创作50部高雅文学作品,平均每部只印几千册,还不如书商炒作包装一两部无名作者写的擦边球地摊文学,印它50万册100万册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听起来不觉悚然!

造成高雅文学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我们作家自己。反躬自问: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到底如何?我们的确是“三贴近”了吗?我们是不是把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英雄业绩,反映广大人民的艰苦创业,反映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革命和建设的风雨历程,反映民族精神作为我们的主旋律?我不反对多样化,并且主张多样化,但是我一直不赞成多样化到“淡化革命,颠覆英雄,否定崇高”的地步。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的确经历过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中国历史上直到现在

的确涌现过无数伟大的英雄,世界上的确有崇高的事业。在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些绝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我想提一下也许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的文化霸权主义问题。有些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作背景,把自己强势的文化产品,输入到弱势国家,占领文化市场,潜移默化地灌输自己的主流意识,希望最后取本土的主流意识而代之。这种文化入侵和意识的占领,有时比公开的武力入侵还有效。一旦占到主流,便可以呼风唤雨,什么颜色的革命都可以搞。到了那时,受侵者悔之晚矣。对付这种文化入侵的办法,不是闭关主义,而是充分放开,取其优势文化之优,弃其不适合本民族的文化之粕,以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以之凝聚人心,振兴国家。绝不容许仰人鼻息,放弃自己的民族主流意识。在文化阵线上工作的人,对于反对文化入侵,坚持自己的主流意识,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作家要做民族精神的传承者,民族主流意识的固守者,民族灵魂的铸造者。

### 敬告作者

一、投寄我社的稿件,三个月内未接到拟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二、不刊用的稿件,凡打印文本和手写短稿,不予退稿;手写长稿,如作者要求,可退稿,请在投稿时付足退稿邮费。

三、向我社投寄稿件时,不要寄拟配发的照片,待我刊决定刊用后再与作者联系。

四、拟向我社投寄两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和长篇书稿,请先与我们联系,经同意后再寄,以免丢失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五、向我社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详细联系方式及作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炎黄春秋》编辑室

# 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

王海光

中国当代史是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大时代的历史。置身其中的人们，将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提供文化积累价值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薪火传递的文化使命。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变迁，是三千年未有过的大格局。我们置身在这个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经历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其复杂性可能是后来人难以想象和难以体会的；同时，由于这是一段在跌宕起伏中疾行的历史，历史场景变动极为频繁，不免会给后人留下许多空白。所以，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正是出于此意，韩钢教授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当代人要写当代史，立刻得到了学界同仁广泛赞同。足见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能否为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鉴往知来的历史感知能力。一份留有許多空白的历史记录，会造成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和误解，甚至会对后人的历史观产生严重误导。这从我们代际传承的文化责任来说，则是“罪莫大焉”了。然而，复原历史的工作难度很大，仅仅靠留有大量文献档案材料和影像资料是很不够的，还得需要知情人的说明和补充。档案中保留的原始文字资料和当事人追记的回忆录，是复原历史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如果把档案文献资料当作历史现场的物证，回忆录就是历史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历史不仅是档案文献，更多的是表现在字外文章上。当事者和知情人的记述，有着档案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存史价值。

第一，档案文献对历史的记载是有限的，文字记录缺失，文字记录不存，文字记录有误，这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都是屡见不鲜的。以中共中央出兵朝鲜决策为例，迄今为止，即便是官方出版物，都未曾公布过中央高层几次会议商讨的记录。有研究者推断，很可能当年的会议没有记录。在缺乏文献的情况下，彭德怀的自述、聂荣臻的回忆、杨尚昆的访谈录，这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便显得弥足珍贵，否则，出兵决策过程很难知晓。

第二，档案文献中记录的资料，有许多是经过选择性处理的。有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有些是在选择性的记录过程中被过滤掉了。以1967年“全面夺权”的决策过程为例，如果只看到毛泽东对上海一月夺权的支持和肯定，似乎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实际上，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的生日家宴上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图。这次生日家宴的参加者，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物。毛泽东即席讲了很长的一篇话，主题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表示了他要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决心。家宴自然不便记录，幸赖王力有个事后回忆，人们才知道“全面夺权”的来由。（《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100—104页。）

第三，档案文献的记载对当时历史场景往往忽略不记，而这样的历史场景可能是比文字记载还重要的历史记忆，离开了这些场景就有可能说不

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后人很难具有那种生动具体的历史现场感。以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为例。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文稿中说的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有的当事人回忆，毛泽东当时在会上讲的是，“谁叫我是党的主席呢？！”两段话的语气态度完全不一样。再以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成为以后发动“文革”的起因之一。但仅从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还不足以看出来毛泽东有多么大的不满情绪。具体情况只有来自知情人的回忆。曾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毛泽东私下说“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之类很有情绪的话，只有在他们面前才能讲出来。（《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第432页）也正是由于曾志和其他当事人回忆了这些细节，我们才能得知毛刘分歧发生的严重性，看懂一些他们讲话记录中的弦外之音。

第四，档案文献是对当事人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记录，在这些当事人言行中的情态、感受和复杂的思想动机，是不容易把握住的。这就需要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一补充，才能窥其真意。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例。薄一波作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事先准备在会上的发言稿是原要讲一讲“大跃进”的缺点和问题，但上山后看到会议的风向变了，不敢再拿出稿子来，转而又违心地参加到批彭德怀的行列中，才得以侥幸过关。（《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67~869页）他的这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在相当多的高级干部中具有普遍性，也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回忆录才能袒露出来。

对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录，不仅要有档案文献，还要靠当事人的回忆录，否则一些重要的情节和参与者的情感心态是很难清楚的。如1959年庐山会议的真相，人们长期是知有其事而不知其详。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的回忆录出版，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世人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所以由纠“左”转到反右的具体经过就全然清楚了。

## 二

回忆录的存史方式，最适宜保存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情态”反映的是人们在历史现场中的历时性作为，描述在历史事件中不同当事人的态度、神

态、言行等等现场表现，是复原历史中最难把握的知性方面。对于历史发生过程中的“道理”，后人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是能够认识清楚的；但对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则是后人难以准确摹写和真切感受到的。

梁启超先生论史，最注重历史的情态。认为情态是“过而不留”的事情，文字传写困难，为史者“摹体尚易，描态实难”。（《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历史的知性本是生动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记述一旦缺乏情态，也就成了所谓“得肉遗血，得骨遗髓”的粗劣摹本，论人述事自然不免是隔靴搔痒，得理而不得其形，得形而不得其神，历史也就成了一部生硬刻板的教科书。

或许正是由于过去的历史撰述过于刻板，近些年来又有纪实文学题材的历史作品大为流行。此类作品于史实之外，施之于作者的个人推断和合理想象，平添一些情景描述和人物心理分析，以求得历史的生动性。但这种凭借合理想象得来的历史生动性，最容易误导不熟悉历史的读者。这种例子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仅举一例：有一位老将军请一个文学青年整理他参加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个细节是，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写了一个证明叶群是处女的条子。这本是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匿名信写的。但这位文学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的想象力极为丰富，用了三四页的篇幅写叶群生性放荡。上中学时就已经失贞，在延安又和陈伯达等人吊膀子，继而色诱林彪，在新婚之夜又暗藏了一个带血的短裤冒充处女……（《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第68~71页）作者从人物动作、对白都是描写得栩栩如生，犹如当夜是在现场窥视一般。尽管老将军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但经过这位文学青年富有想象力的再创作，谁还能认为该书还有存史价值呢？所以，在从提高历史知性的意义上讲，与其要后人凭想象编写出那些文学体的纪实历史，还不如让当事人保留下更多实实在在的历史记忆。毕竟，离历史现场最近的人对历史现场的临摹，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有理性的一面，但非理性的一面可能更多。只有对历史情态有所了解，才能具有历史的史感，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合理中有不合理，不合理中有合理。当事人写当时事，一般能够有比较准确的史感。例如林彪秘书张云生写的《毛家湾纪实》，

客观讲述了他在林彪身边工作的所见所闻,提供了研究林彪事件的第一手材料,史学界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后来作者和女儿一起在香港又出版了一部同类的书,篇幅更大。这或有舐犊提携之意,但新书画蛇添足的错讹地方太多,存史价值反不如前。如,龚育之对“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的回忆,李雪峰对“文革”发动情况的回忆,都是当事人写当时事,述事清晰,情理交融,有着其他人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对我们认识“文革”发生过程的复杂性是极有帮助的。

### 三

回忆录的写作,有“公撰”、“私撰”两种。“公撰”是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式。撰者一人的叙述,有一班人马帮助记录整理,查找核对资料,分头撰写成章。因是组织行为,资金宽裕,档案材料使用比较方便,在事件叙述上具有原始资料的权威性,同时叙述方式上最讲政治,也比较拘谨。但这类回忆录,忌讳最多。一旦牵扯到事主的历史作为,则都是相当敏感的,往往不免隐恶扬善,文过饰非,掺加私笔。这是读者不得不格外留心的地方。

“私撰”完全是个人化的写作。因是撰者亲历亲为,文责自负,忌惮较少,思想放的较开。而且因为所述之事,情真感深,印象深刻,可以提供具体的细节,所以在叙述上是以情节生动、描写细腻见长。坊间流传,多为此类。但由于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有高有低。

存史首先须有历史的公器意识。各种回忆录中,作者的撰写动机如何,直接决定其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作用,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是价值递减的。

回忆录毕竟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存史方式。即使是从对历史负责的愿望出发,作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出现撰述的误区,仍会有涉及人事上的避讳之处和对自己当时言行的撇清之举。历史的大关节处清楚,未必在小关节上也清楚。这种事情在回忆录中是非常普

遍的。甚至一些文情并茂、真实可信的佳品,也是在所难免。韦君宜的《思痛录》,是笔者认为近年来写得最好的回忆录之一,但个别细节也有不实之处。书中所述1943年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李锐和范元甄、黄华和王龙宝、魏东明和冯兰瑞”三对夫妇因运动离异。冯兰瑞最近著文说,这三桩家庭变故,恰恰全不是因为运动,而都另有隐情。(见冯兰瑞:《“真话”中的谎言》一文,由此可见,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袒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撰写回忆录,是一项恢复历史记忆的工作,需要对历史负责,不能虚饰,不能挟私。不仅需要有事求是地审视自己和审视他人的客观态度,还需要借助当时的日记、笔记和文件等原始资料恢复历史的记忆,特别是需要有其他历史当事人的交流、印证和相互补充。例如周海婴回忆说,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曾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学界立刻有人对此事提出质疑。随后又有黄宗英等人证实确有其事。这种“质疑——询证”的往复过程,其实并不带来难堪,而恰好是还原历史本然的要求,体现了探求真实的科学精神。许多史实或许经过这样的过程仍难求证,但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一定会向真实又靠近一步。可以这样说,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但如果在启发大家共同回忆的群言环境中,可以最大限度地修正这个误差。

史学一途,向有“孤证不立”的老话。从存史的意义上说,不但需要大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小人物的回忆录;不但需要正面人物的回忆录,也需要反面人

物的回忆录。从存史的价值上说，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无论是出于自我标榜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辩解的需要；有公心固然好，存私心也可以，都可以将自己经历的历史写出来，公诸于众。公众自会鉴别。各种类型的回忆录越多，对校正历史记忆所起的作用越大，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复原历史来讲，不怕众说纷纭的嘈杂，只怕“舆论一律”的孤鸣；不怕百家争鸣的质疑，就怕鸦雀无

声的寂静；不怕百花齐放的繁芜，就怕一花独放的单调；不怕当事人的回忆出错，就怕连出错的回忆录都没有。历史的经历者，特别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现场中硕果仅存的当事者和知情人，无论为了对自己有交代，还是为了对世人、对后人有所交代，都不应带走一段历史，而应有更为积极的存史态度。

(责任编辑 萧 徐)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刘太医谈养生	刘弘章	35.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 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5.00
西北军演义 上下)	骏 声	68.00	8.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7.00
走进怀仁堂 上下)	董保存	55.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39.80	7.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7.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7.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7.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从“董怀周”到申江青	汪文凤	18.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 庆	28.00	6.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西北军演义》此书系《桂系演义》、《少帅传奇》之后，又一部介绍国民党非中央系武装力量的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自己家世、拜访众多的西北军后人，在查阅、考证了大量海内外出版的军事、历史、人物传记基础上，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翔实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西北军”整整 20 年的战斗历程，填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一段空白。

《风雨彭门——彭德怀家风·家事》一书记述了彭德怀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坎坷多舛的命运和他的高尚品格坚贞气节，是一部以全新的视角研究和描写彭德怀人生的传记文学作品。材料来自彭德怀一手抚养成人的七个侄儿侄女、熟悉彭总的老将军、老干部，有极高的可信度。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蒋介石日记揭密》一直以来，蒋介石日记被列为与公众无缘的密档。该书辑录了蒋介石自 1915 年——1949 年逐年的日记 1000 余则，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政治、党务、外交以及游治、家事等活动，是人们平素难以见到的珍贵资料。该书的出版，可以使我们尽量置身于那个时代，从更多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了解蒋介石的真实面目。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 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庞 旻

在与老一代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即退了休，才能（才敢？）畅所欲言，说真话。比如——

董乐山，翻译过《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九八四》等名作，获得过“中美文化交流奖”的翻译家，虽然年轻时代就显露出写作的才华，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是“戴着镣铐跳舞”，只能靠有选择的翻译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直到晚年，退休前后，他才开辟了一个相对能够自由挥洒的领域——用杂文、随笔来直抒胸臆。他以锐利的笔锋，深刻的见解，抨击了文化专制主义，揭露了国民性中的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无情地嘲讽了封建主义传统和官场的腐败。他的《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等集子，一时成为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一面旗帜。

严文井早年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小说家，延安整风后知趣地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避风的小港湾。后来他担任文艺界领导，讷言谨行了一辈子。退休后，他洗尽铅华，回到书斋，开始对灵魂进行严格的反思与拷问，开始了求“真”的心路历程。他说：“我仅存一个愿望，我要在到达我的终点之前多懂一点真相，多听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用他的传记作者巢扬的话说：“晚年的严文井成为了一个勇者，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他这一生，被政治折腾得七荤八素，当从怪圈中冲出来之后，他开始在自己的文章中大声呐喊真理。”他写真话，甚至不惮得罪人，就是“希望今后人人讲真话，希望中国不再重蹈过去的灾难。”

尽管在大难过后的“新时期”，韦君宜领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了“思想解放澎湃洪流中一朵翻腾奔涌的浪花”，但她真正写自己想写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还是在1985年退休以后。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以“杜鹃啼血”般的无畏精神

写出《露沙的路》和《思痛录》，这两部敢于吐露真言、充满忏悔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的作品，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一场震动。《思痛录》出版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版，一连印了好几次，被誉为“继巴金《随想录》之后又一本真正讲真话而方显品位的书”。洁泯先生说：“她是怀着明辨是非的勇敢精神而勤奋写作的。她的《思痛录》是真实的。我想，也只有勇于面对人生并说真话的人，才值得人们的敬佩。”

袁鹰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是文艺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温厚长者。他和《人民日报》副刊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在这个特殊的思想文化阵地为尽可能求真求善求美而默默耕耘，其间自有种种坎坷与无奈。1986年退休后，他开始反思亲历的这段历史，用自己的笔再现时代风云，总结经验教训，呼吁一个更加科学与民主，更加宽松与和谐的社会。最近出版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就是这样一本讲真话抒真情的书。书中追忆新中国办报史上件件令人扼腕的往事，为读者留下了一部“史鉴”式的作品。

随便想到上面几个例子，其实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萧乾说：“要尽可能地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在退休后；

赵丹说出“党对文艺不要管得太死”的真言，不但是在退休后，而且是在临终前；

舒展、牧惠等老作家，写出辛辣大胆，带“刺”的杂文，是在退休后；

张中行写《怀疑与信仰》《月是异邦明》《刚直与明哲》《吃皇粮与颂皇权》等颇有见地的散文名篇，也是在退休后；

就连大半辈子研究戏曲，并未对风云变幻的政治历史多说什么的章诒和，也是（下转66页）

# 每于寒尽觉春来

## ——《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序言

王 光

本书的编著者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机关退下来后，致力于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越花甲，逾古稀，届耄耋，一干将近二十年，贡献是很大的。前年他告诉我，归他承担的任务已完成，后续工作有人接替，从此可以卸下担子，安度晚年了。我向他祝贺，为他辛劳半生，终能得到东坡先生说的“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向渺茫”的自在生活而高兴。同时建议他，趁健康状况尚好，不妨随兴之所至，经过独立思考，再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把晚年生活安排得更丰满一些。他心有所动，只是未置可否。

今年春节，他打来电话，说这些年在积累当代史料的同时，还收集了不少当代人的诗词，记述了从“反右”到“文革”这段既沉重又往往荒诞的历史。他几经甄选，加以串缀，穿插进自己的感悟和议论，编写成《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一书，交我校读，嘱我作序。收到这部文稿，我一夜读完，欣喜地发现，这位长期从事理论、史志工作的人，老来转而游兴于诗词之间，把理论、史志、诗词三者生动地结合起来，的确是个很好的选择。同时，也为他老骥伏枥，嘶鸣不已，勤思不倦，笔耕不辍的精神所打动，喜看老树又抽新枝，祝愿不断地开新花，结硕果。

真诚，是这本书的最大特点。不论是读诗还是读文，令人感受到的，是一股浩然之气，一片赤子之心，一派直言无讳的勇气，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时代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反思精神。“文化大革命”，以及它的前奏“反右派”、“反右倾”和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造成的痛苦和创伤，是必须正视而不能回避或施曲笔以自解的。本书为此作了努力，值得称道。实事求是地回顾和记述历史，特别是深入解读历史的因果教训，必须从所谓“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封建道德桎梏下

解脱出来，勇于自省，敢于批判，而不能事事讳莫如深。古人尚且明白“讳疾忌医，病不可为”、“讳恶不悛，卒至亡灭”的道理，何况我们这些具有开放意识的现代人呢？我们也不能以所谓“投鼠忌器”为借口来规避现实。这里所说的“器”，乃是“禹鼎”“庙彝”一类的传国之重器，而非小家碧玉闺房中的瓶瓶罐罐。把藏在钟鼎重器之中的几只老鼠撵出来，消灭掉，是护“器”，而非伤“器”，何“忌”之有？我们也无庸担心如西谚所云：“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须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是顶天立地的巨人，而不是澡盆子里的“孩子”。冲洗掉巨人身上的污垢，只能使之更加光辉健伟，怎么可能与脏水一道被委弃于沟壑呢？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神经衰弱不足以成大事。我们必须具备唯物主义者那种大无畏精神，敢于揭自己的疮疤，排体内的瘀毒，以坦荡的胸怀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这样才能甩掉历史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包袱，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真正意义的现代化。

从“反右”开始到现在已半个世纪，“文革”结束至今也已三十年。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已成为海内外的一门“显学”。研究者有的侧重于史实的辨析，有的侧重于理论的探讨。而本书的编写者却另辟蹊径，把收集到的当代诗词加以串接剪切，以诗为经，以文为纬，诗文交织，诗史互证，对这段历史作了鲜活的记述和深沉的咏叹，读来既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又给人以感情上的撞击，的确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本书所收诗词的作者约一百二十多人，他们中间有百战疆场的开国功臣，有矢志理想的革命党人，有刚正忠直的爱国人士，有蜚声中外的名家学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莘莘学子，也有最富理想色彩和叛逆精神而又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他们涵盖了那个难忘年代的各个社

会层面，他们的声音呼唤和刻画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他们虽然大部分不是诗人，而他们的呐喊，发自胸臆，结为韵句，是那样的率真而又卓犖不凡，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时代之声。

白居易说：“诗人多蹇。”韩愈说：“文穷而后工。”拜伦说：“愤怒出诗人。”收入本书的五百多篇诗词，都是在特定的时代重压下逼出来的“穷”“蹇”之作，“愤怒”之音。这些诗词的风格各异，有的豪迈雄健，有的慷慨悲凉，有的深沉缅邈，有的亢奋张扬，有的桀骜不驯，有的凄恻婉转，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放言无拘，直抒胸臆，其势不亚于李白的“壮浪纵恣”，其情不逊于杜甫的“浑涵汪洋”。有些诗词，振聋发聩，脍炙人口，足以与千古名篇媲美。

试看在那“翩翩魔影舞神州，大地迷茫妖雾稠”的荒唐年月，在那“光天竟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的危难时刻，我们的时代菁英是怎样面对这一现实的。他们不减当年横刀跃马的英雄气概，笑对幽囚荒郊的悲凉晚境，戏称“平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他们气壮而情长，念念不忘“井冈晓日延河月”，发出“莫叹相逢是梦中”的感喟；痛切怀念“不死沙场死铁窗”的战友，怒发“是谁仇敌谁朋友”的天问。在无端的诬陷和凌辱面前，他们表现了“罢官容易折腰难”、“掷地遗篇作鼓声”的自尊，显示了“信许丹心托日月，敢将四体试兵刀”的倔犟，倾吐了“只要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的情怀，宣泄了“岂无黄土埋忠骨，自有青山伴白头”的悲愤，也咏唱了“丈夫多难宁非福，铁槛低眉一粲然”的乐观。他们置身牛棚，身系囹圄，仍以人民的安危为念，“忍看生灵成草狗，幽窗和泪写诗篇”；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指问“城狐社鼠猖狂甚，一局危棋付与谁”？然而，他们并不灰心失望，而是怀着“隔窗风雨看红梅”的激情，抒写出“拚将晚节护芳林”的豪气。这样的诗篇，大义凛然，气壮山河，谁能读了不为之动容！

在“左”的政策路线的阴影下，知识分子一直是个被猜疑和防范的群体，常年生活于压抑和扭曲之中。他们的诗词，隐晦曲折，沉郁愤懑，读来给人以百感丛生的况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当年丹心许国，一片赤诚，疾恶如仇，勇于直言，然而，得到的不是信任和鼓励，却是相反的回敬。他们怨愤“文章满纸书生累”、“浮名已为多言误”，懊悔“不

看风向竟扬帆”、“率真偏遇奈何桥”，痛诉“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虽然如此，仍是书生意气，宁折不挠，击节盟誓：“红羊不死丹心在，要舍余生再执言”。这种忠诚和执著，多么可敬可爱。许多知识分子，当年是迎着我们党高举的“民主”、“自由”的大旗进入革命行列中来的，然而，建国后他们看到和体验到的，与他们先前的愿望相去很远。他们为接连不断的运动、斗争、批判所苦，谨小慎微，动辄得咎，喊出“至今身在盘丝洞，处处蜘蛛结网罗”的憋闷，道出“情知精卫难填海，谁信曾参不杀人”的失落，自嘲“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的无奈。有的国学大师，为求“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环境而不可得，又不甘混迹于“文章唯是颂陶唐”的流俗之中，只落得过那种“不邀明月不清游，病锁高楼似小舟”、“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寂寞生活，浪费掉多少做学问的珍贵时光。有的文学巨匠，放弃了人格的独立，泯灭了思想的光辉，时而成为虔诚的“奴在心者”，时而成为驯服的“奴在身者”，终致文思枯竭，笔重如铅，从此再无真正的创作可言，老来只能怅然发出“半生寂寞半生艰，秋色已尽唯冬寒”的叹息。特别令人悲痛的，是那些在“文革”中惨遭杀害的热血青年。他们少小辞家，献身革命，对党从无二心，只因一言获罪，终致万劫不复。在系狱待决的日子里，从“梦回冷泪湿薄袖”的凄惶，到“肠断眼枯立西风”的绝望，到“那许山河私帝王”的控诉，直到临刑前留下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绝命词，谁人读了能不拍案而起，热泪长流！生者写下了“愿倾银河水，洗君芳洁身”的挽诗，然而，银河有意，世事无情，斯人长已矣，芳洁何处寻？“文革”中涌现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这个群体，也是整整的一代人。他们从“弄潮儿志在风雨中”的浪漫，到“一代知青路几条”的迷惘，到“血泪文章笔下倾，写来满纸向谁呈”的苦诉，让我们这些身为父兄的人读了能不汗颜，能不自责？而他们狂热之后的冷静，梦魇之后的清醒，几经磨难之后的成熟，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希望之所在。文中所引彭德怀、陶铸、邓拓、廖沫沙、聂绀弩、阳翰笙、陈寅恪、萧军、林昭……诸家诗句，均见本书，不一一注明作者及篇名）。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逐渐聪明起来。读一读这本《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对于经历

过或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是有益的。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单靠热情不行,一味蛮干不行,专横强制更不行。必须发扬民主,顺应民意,而不能独断专行。必须尊重科学,服从规律,而不能主观盲动。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记住“工业比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而不要抛开经济建设,没完没了地搞阶级斗争。要记住六十年前毛泽东说过的一段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论联合政府》)不要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傻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亿万人的共同事业,有赖于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人们对精神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性诉求,正是释放全民族的潜力,实现中华振兴的必由

之路。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为政治报告的讨论做总结时,朗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且强调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马克思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曾义正辞严地质问普鲁士书报检查当局:“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是,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应当经常想一想这些久经历史锤炼的至理名言,它会帮助我们深刻认识那段令人痛心的历史,反省自己,警惕今人,告诫后代,开创未来。

从“反右”到“文革”已如寒冬过去,玄冰渐解;开放改革有如春回大地,伏蛰方苏。晚清诗人张维屏说:“每于寒尽觉春来。”这个“觉”字,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原副书记)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 63 页)在退休后写出《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虽有争议,但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再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参照与记录。

这就让人不能不想,为什么这些“说真话”的文字,都是写于或发表于作者退休以后?

固然,退休后,他们才有更多的闲暇思考,总结,疏理,感悟,并把结果付诸文字。

但一个事实是,他们退休前,大多也是从事文字和写作工作,只是那时的写作与发表,自觉不自觉地多了一些禁忌。几十年的政治风雨,早已教会人们要谨于言而慎于行,不如此不足以自保。

更重要的是,退休前,他们都有一个“单位”,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职务。他们是单位人,职务人。这就使他们的写作与发表,不能仅代表他自己,而不能不有所顾忌。不仅在“单位”说话做事要三思而行,就是在单位以外,在媒体、社会上发表与出版,也要谨小慎微。这就像唐僧给孙猴子套上了紧箍咒,立地画了一道圈,你只能在那个圈子里活动,稍有逾越,就会尝到苦头。

而退了休,虽然那个单位还在,但职务已卸。

无官一身轻,他们与单位的联系已很松散,这时他们的写作与发表,才获得了相对的自由,才能想过去所不敢想,写过去所不敢写。就像孙猴子摘下紧箍咒,迈出师父画的圈,还了个自由身。许多“说真话”的文章,只有在这种心态和环境下,才有可能呼之欲出。

退休,使他们脱离了职务人,回归到自然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做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

平心而论,能在退休后相对地畅所欲言,说真话,已经是历史了不起的进步——曾几何时,管你是什么人,都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因言获罪已成为可笑可悲的历史。

但我们还是有疑问:这个进步难道就够了吗?为什么只有在退休后,人们才能获得这种身心的释放与自由?如果是凭着良心说出的真话(尽管它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不能在退休前就得到一个自由发表的环境?人们在谈到“宽容”这个词时常爱引用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样的观念,什么时候才能被我们的“师父”——以及单位的单位的领导们真正意识并奉行?

# 《张学良：毁誉由人》序言

刘济民

2006年8月30日，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了远在沈阳的赵杰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即将出版的书稿《张学良：毁誉由人》，并转达了赵杰嘱我为此书作序的愿望。

关于赵杰，我的确有话要说。

这是一位奇人，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个品牌。

前几年，我初到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就听办公室的同志和一些同行，时不时地议论到地方政协文史委几位卓有成就的同志，其中就有赵杰。以后又见到真人，每年开会都有机会见几次面，赵杰谈吐文雅，又豪爽、幽默，说话直来直去，典型的东北人，是有大学问的，以后又读到 he 写张学良的几本书。我不只为张学良将军的伟大功绩、高尚人格、英雄气概肃然起敬，也为赵杰执着的追求、真挚的感情、质朴的文笔、勤奋不息的精神所感动。从那些书中，我感受到一种动人魂魄的、心灵的震撼。那是激情的迸发，那是心音的绝响，那是从作者心中流淌出来的篇章。

古人对史官有德、才、学、识四个方面的素质要求，一直沿用到近现代。这些年接触文史工作后，我总觉得，作为政协文史工作者，只有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的素质还不够，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感情、激情、精神，或者叫情结，可以叫史情。应该是德、才、学、识、情五个方面的素质要求就全面了。史情，应该是对政协文史工作者特殊的素质要求。

史情的形成，史情的提出，其实就是从赵杰那里受到启发，从青海、天津、安徽、江苏、北京、上海、河北、河南等各地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们那里得到启发，大家异口同声称之为文史情结。2004年在西安办了个政协文史干部培训班，办公室的同志嘱我讲点什么，我就着重地讲了德、才、学、识、情这五个字，尤其突出地讲了史

情。讲史情，又着重讲了赵杰写张学良所表现出那种激情，那种精神，那种情结。当时在会场上有热心人立即给远在沈阳养病的赵杰发去短信，说我在西安又讲到赵杰。赵杰同志直到现在还把几年前的那条短信保存在手机里，以为纪念。这说明我们的感情是相通的，说明政协文史工作者的情结是相通相联的。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其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和敬意。赵杰就是这样的文史工作者，他写张学良，写“九一八”，他做文史工作，可以说是德才兼备、文史兼通，温情和学识并茂。

赵杰从事张学良和“九一八”的编写、研究工作，已达20年之久。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他每年都要发表数十万字的专著。迄今为止已出版有关张学良的文史专集六本，散文集三本；有关“九一八”的专著五本。此外，他编著的有关张学良、“九一八”的专辑已难计其数。赵杰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的工作作风特别勤奋。他为了写真、写活、写好张学良，不辞辛劳，忘我工作，全力以赴，多次赴台湾，去香港，渡日本、飞美国，走访大陆各地，专访张学良将军及有关人士。

在台湾，他曾三上阳明山，曾沿着将军当年在台湾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走访。1999年在美国，他曾陪伴将军一周，为将军推轮椅，他们朝夕相处，倾心交谈，能不感人！2000年6月，他率团到夏威夷为张学良百岁祝寿。20多年来，为了写张学良，写“九一八”，他在海内外究竟采访多少人，已难计其数了。真正是“等身书卷初著成，通天绝地写真情”。我们称他是当今国内外最了解张学良将军的专家和知名学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绝不为过的。

赵杰同志对我中华民族宝贵历史的这种温

情和敬意,在他的《张学良:毁誉由人》这本书里,体现得更丰满,更充沛,更集中,甚至可以说有了一种新的升华,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张学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千古功臣、顶天立地的少帅将军,他的奇特的经历,他的非凡的壮举,堪称中华第一人。人们至今谈起70年前的那桩往事,依然为之动情,为之称颂,为之惊叹不已!非常可贵的是,赵杰的这本书,不仅继续用浓墨重彩写了将军的大德大智、大勇大谋,更是细致入微地、多侧面地写了他的大情大义、大彻大悟。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不仅是张将军的金戈铁马、叱咤风云,还让我们领略了将军的另一面,领略了他的真性情,他的凡人真趣。将军既是伟人,也是凡人,同普通人一样,是有血性、有个性的人。我们既看到了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也看到了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者把将军冷观

世事、优游清逸、毁誉由人、褒贬自适的一面写得鲜活淋漓,非常感人。那些文字,有干有华,有骨有肉,有情有趣,有声有韵,有曲有直,有灵有性;赵杰把一个独一无二的张学良展现在读者面前,真切可信,可爱可敬,可触可摸,可悟可谈,一个活脱脱的张将军呼之欲出。

赵杰写张学良的那些文章,是可以反复诵读的。读那样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心灵的净化,甚至是一种圣洁的洗礼。

赵杰把他的智慧、激情、心血、辛劳,把他的创造精神,融入了他所热爱的人文事业。他的道德文章,他的辉煌的业绩,使我非常敬佩。

(2006年中秋写于无锡)

(作者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 读者来信摘登

看到《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发表的段仁汉先生的短文。文章内容是回忆当时他所在单位划右派的过程和自己的责任,同时向受害的叶叔筠和赵洪钧两位同志表示道歉。这可以说是50年来第一次看到公开道歉的文字,实在是难能可贵!

其实,段先生有一千条理由用不着道歉。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就是那样的严峻,容不得哪个人心慈手软,否则就要被“靠边站”。例如著名的哲学家杨献珍,在中央党校主持校务工作,由于没有抓出一个右派,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找去谈话。问:你们抓了几个右派?答:一个也没有。刘说:你们站在右派的立场去查,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更严厉地训斥道:我看你就像个右派!于是,杨献珍被停职,由别人来主持运动。(《我所亲历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可以这样说:当时的形势犹如下棋,每个人都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谁干什么,只有听从棋手的调遣。在棋手看来,为了夺取胜利,“车”“马”“炮”都可以牺牲,更不必吝惜一个小小卒子了。你一个小小的地方七品芝麻官,能对抗得了吗?所以,根本就没有必要道歉。

但是,段先生还是公开道歉了,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对受害者的人文关怀和自己人性的回归,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想一想:人家受了几十年的冤枉苦,为什么不能给人家一个道歉,换来心理的稍许平衡呢?仅仅从这个理由出发,段先生这样做了。此外,他自己的心灵负担也得到了解脱。因为这两位受害人毕竟是通过自己的手,把他们推进了火坑的。从良心上来说,也应该有一点负疚之感。

应该说:叶女士毕竟是幸运的,她活下来了,而且亲耳听到了当年加害者对自己的道歉。这个结局真的令许多有相同命运的人羡慕不已,他们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平反的那一天,或者也没有任何人向自己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段先生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因为他毕竟只是执行人,而不是决策人。人家又公开道歉了,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像段先生那样,回归人性,扪心自问一下,难道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胡显中

# 五二一事件

## 摧毁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

穆广仁

60年前,1947年的5月下旬起,一场有60多个大中城市的几十万青年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史称五二一运动。这是一场被毛泽东主席称为“第二条战线”的真正的群众运动。

说它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是因为:在内战方殷、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特定情况下,学生们出于生存自救,为了维护他们以及整个人民的切身利益而自觉地、主动地举起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他们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从而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5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的评论中,高度评价了这次学生运动,他说:“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国民党政府用水龙、狼牙棒、马队、机枪等暴力手段对正义的学生进行镇压;同时,又竭力散布学潮是“有背景的”,是被共产党操纵的。当时,大文学家茅盾就驳斥这种谬论说:“我以为无论什么运动,决不会凭空发生。运动之发生必有其社会的政治的原因,而一年来政治上之失尽人心,经济崩溃,物价狂涨,内战火热,使全国人民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这一切就是学生运动发生的背景。”

中国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广大群众为他们切身利益的奋争,没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任何力量都不能“运动群众”,“制造”、“操纵”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同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革命政党的支持和正确引导,运动可能走偏方向、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作为五二一运动的参与者,我体验到:这次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成功典型。

这里,不得不把五二一运动的过程作一简要叙述: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机关撤回解放区,开始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所需的经费,1946年占政府全部经费的60%,到1947年头几个月就增加到80%。蒋介石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一下子把法币急剧贬值,美元对法币的比值从1946年9月的1:3050跌到1:12000元。这等于把老百姓手里的财产凭空夺走四分之三。四月,南京的物价比1946年12月上涨了4.3倍。政府规定大学生每月的副食费为2.4万元,到1947年5月,这点副食费只够买两根半油条。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5月10日贴出公告:“每月两万四千元的副食费不能维持到月底。特召开桌长会议共商办法。”

这张布告像一枚火种,立即点燃了群众的怒火烈焰。要求增加副食费、改善师生待遇的大字报在民主墙、饭厅门口铺天盖地贴出来。在要求增加副食费的文告上签名的学生约有2000人,约占四牌楼校园学生的三分之二,其中也有三青团员。有些同学结合所学专业,贴出独具匠心的大字报,被许多学校抄录、转贴,被报刊转载。如,经济系同学的大字报:《对物价指数与副食费之比例的研究》,通过1946年底到1947年5月各类食物、燃料价格上涨幅度的调查算出平均上涨4.3倍,说明副食费应提高到103200

元。医学院同学的大字报:《维持最低健康标准所需各类食物分析》,说明当前副食费所能提供的食品的热量尚缺 725 大卡,补足最低健康标准所需的热量,每月的副食费需增加到 115000 元。理学院的大字报是一道几何求证题:运算结果证明,内战经费占本年度预算支出的 80%,为 48 万亿元,运算到每月每日每时每秒的战费,证明每 2 分 37 秒的战费等于中大全体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闪烁着青年智慧和才干的大字报,展示着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中央大学教授会此前也发表了要求提高教育经费和改善教员待遇的宣言。

运动的发展极其迅猛。11 日桌长会议决定,按照 2 月份的标准开伙,能吃几天算几天,吃完再说,看政府怎么办。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自 13 日开始罢课,并向教育部、行政院请愿。《文汇报》在报道这一事件时称之为“吃光运动”。南京金陵大学等大专院校立即响应,上海、平津及其他大城市院校也纷纷声援,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具体要求,举行罢课、请愿、示威。学生们分散的要求最后集中到反饥饿反内战的目标上来。从 5 月 10 日起的一周内,就有 14 个城市的 27 所大专院校罢课,响应南京学生的斗争。5 月 20 日南京血案之后,斗争火焰迅速燃遍 60 多个大中城市,并且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大力支持,使蒋介石政

权陷于完全的孤立,濒临土崩瓦解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并成功地领导了这场斗争。其成功在于:

第一,是因势利导。没有那个形势,制造不出那样的群众运动;有了那个形势,才能因那个势而导之。1947 年春,中共代表团(对内是南京局)被迫撤回延安后,党的地下组织改由组建的上海局领导。在中央大学从重庆复校南京的 4000 多学生中,尚未建立党的支部,只有个别有联系的党员。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建立的地下组织新青社却有一百几十名成员(其中有若干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上海局派卫永清到南京接原由南京局联系的新青社的关系。他通过在成都入党的党员蒋祖榆(陈敏苇)与中大新入党的颜次青(新青社领导人之一)联系。当群众反饥饿的烈焰熊熊燃烧起来时,颜次青和蒋祖榆都认为,群众斗争的高潮已经来临,应当积极支持;蒋祖榆还对颜说,生活斗争必然会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反内战)。颜次青和新青社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他和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朱成学(新青社员)等人议定,紧急召开学生系科代表大会。大会以绝对多数表决通过,从 13 日起罢课,向教育部请愿。从 13 日到 15 日,中大、金大学生三次到教育部、行政院请愿。

斗争之火烧到这个份儿上,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势已呈现,以刘晓为首的中共上海局适时作出了一个宏观决策。上海局成员

沙文汉以写家书的方式通知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汉之妻)到上海开会。刘晓对陈修良说:根据当前形势,学生群众在饥饿威胁下已经十分愤怒,展开了反饥饿斗争,我们应当适应群众的要求,组织一次各地学生参



五二〇运动中的场面

加的大规模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在上海、南京，首先在南京发动，北平、天津也同时发起。刘晓对陈修良说：“南京是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学生能不能打个头炮？”陈修良知道中大有一支强大的新青社队伍，还有南京地下市委领导的一些党员，当即慨然承诺带这个头。她立即回南京，向南京地下党青委书记王明远等人传达了上海局的决定，作出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上海 14 所大专院校学生 7000 余人的大游行，为上海、杭州、苏州进京请愿的学生代表送行。可是直到这时，卫永清和他联系的新青社，尚未与南京地下市委接上关系。新青社员们既不知道上海局的决定，更不知道远在延安的党中央 2 月间给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开辟“第二战场”的指示，但是他们与广大青年群众的行动与党中央、上海局的决策完全一致。因为，党的决策，是符合当时群众的斗争实际的。

5 月 18 日，蒋介石发表“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声称要对学生“采取断然措施”。同一天政府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学生游行，违者将执以法绳，绝不姑宽。形势十分险恶。颜次青和新青社核心战友们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是退还是进？他们临危不惧，一致决心按照预定计划于 20 日举行游行示威。上海、苏州、杭州赴京请愿代表 19 日抵南京，于次日举行了京沪苏杭 17 院校 6000 余人的大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镇压。五二一血案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把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加上了“反暴行”。上海地下党学委根据新出现的形势，把“反暴行”改称之为“反迫害”。此后，全国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持续了好几个月。

第二，地下党对于群众、对于其中的先进分子，给予充分信任，充分发挥他们在斗争中的智慧和主创力。当时在国民党多次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党组织处于非法的地下状态，不可能在斗争的前沿站出来指手画脚，下达什么指令。而且，在许多学校中都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或者只有少许党员。在整个 40 年代，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依靠中共南方局在大后方建立的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组织开展起来的。这些青年组织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练就了团结群众，同国民党当局抗争、周旋的本领。5 月 19 日晚，在临战前夕的严重关头，

京沪苏杭 16 院校代表开会讨论五二一游行示威的具体问题。他们在是否增加“反内战”的口号问题上存在分歧。主持会议的主席团成员朱成学等，考虑到各校来京请愿要求不完全相同，为了照顾多数，游行队伍打出的大旗是“挽救教育危机”，各校游行队伍自己则可以增加“反内战”口号，从而达成全体的一致。在这个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充分显示了那一代学生领袖人物当机立断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

当游行队伍遭到血腥镇压，又被阻于国府路，与国民党的马队、军警对峙的严重关头，朱成学等人为了避免学生再蒙受重大伤亡，决定停止前进，采取群众斗争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他们与国民党军警、要员进行艰苦的谈判，在谈判中既坚持原则，要求政府严惩血案凶手，释放被捕同学，赔偿学生损失，撤除拦阻游行队伍的军警的五道防线；同时又有灵活性，在政府答应上述承诺、军警撤退的条件下，游行队伍可以不到国民政府门前示威，从而取得谈判的突破，赢得五二一游行示威的胜利。在这个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关头，朱成学他们只能“临场发挥”，上级不可能给任何指示。在学生与军警对峙时，王安民（现名安民，中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进步同学）在马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阐明学生正义要求，控诉政府暴行。他既没有发言稿，也无须请示任何人，却令在场的 40 多名中外记者倾服。这时，卫永清也在现场，他只能站在马路边观察事态的发展，赞叹学生们的勇敢、才智。

第三，群众犯错误的时候，耐心地说服他们改正。青年有时会冲动，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过火的行动。这时地下党只能耐心地讲道理，靠说服，让群众自己去纠正错误。5 月 20 日，北平学生举行盛大游行之后，回到北大广场举行集会。会上有同学提出：定于 6 月 2 日为“全国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大中城市一致行动，罢课、罢教、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主持大会的同学未经慎重考虑，在大会上付诸表决，以鼓掌通过，并在报端发表。针对这个“六二总罢”的号召，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全国进行大规模镇压。当天，北平的地下学委（包括由华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北系，和上海局领导的南系）立即发现了这个错误，分头说服学生取消“六二总罢”，改变斗争方式，在校内举行反内战活动。上海

局负责群众斗争的钱瑛同志闻讯，心急如焚，指出“这种事先宣布斗争部署，同反动当局硬拼的冒险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她立即通知各校学运骨干，取消罢课游行，改在校内举行各种活动。处于五二运动中心的南京学生，已经致电响应北平学生的六二号召，准备示威游行，无限期罢课。卫永清连忙找到刚刚建立的中大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人罗炳权，传达地下党的意见。包括颜次青在内的骨干成员以及绝大多数新青社员、积极分子都思想不通。经过反复耐心说服，阐明当局将在六二实行大屠杀大镇压的形势，以及长期罢课已经引起部分同学的厌倦和不满的情况，终于，他们被说服了。在中大学生系科代表大会上以 112 票对 3 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游行，结束了罢课。几十年后，当年南京学委书记王明远不胜感慨地说：“我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我认为，五二运动比一二九运动更加成熟，更加高明了。群众运动能放手发动，该收的时候又能及时收。运动中涌现出人才济济，很了不起。”他说，群众运动的成熟，也反映了党领导的地下斗争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的成熟。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共产党是靠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来领导群众运动的。而政治上的影响力则源于她提出的纲领、政策，最大程度上顺应了群众的切身要求。换句话说，是民心所向。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高举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旗帜，

是民心所向。抗战胜利后，她又提出建立独立、和平、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成立联合政府，又是民心所向。在整个 40 年代，在国统区青年中建立的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就是以这个纲领为奋斗目标的。团结在这些青年组织周围的广大学生群众，也都倾慕这个纲领，虽然他们的起点很不一样。他们当中很少人学习过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有些只不过刚刚从文学殿堂跨进社会科学殿堂的门槛；绝大多数是爱国者、民主自由正义的追求者、真理的探索者。面对丑恶的现实，专制政权的镇压、逮捕、监禁、屠杀，他们寻觅真正支持他们的力量，探索正确的人生。严峻的现实使他们别无选择，包括那些读书救国论者、远离政治的清高主义者，最终大多也只能走共产党所引导的革命道路，加入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来。

以五二运动为代表的“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了 60 个年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这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应当作为党的宝贵财富加以总结。今天，中共是执政党，情况已经今非昔比。但回顾那段历史，总结地下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包括她和群众的亲密联系，指导群众运动的某些方针、方式方法，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2007 年 3 月 24 日改定)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上接 80 页) 1928 年北伐成功后，北京改名为北平。当时北平第一任市长是何其巩先生，他为了伸张正义，凝聚人心，就职不久，就决定在北平浙江会馆召开追悼会，隆重追悼新闻界的两位先烈——林白水与邵飘萍先生。邵飘萍先生是北京《京报》社长，也是 1926 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

何其巩先生为了宣扬国民党是革命党，革命党实行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封建军阀大相径庭。为了彰显新政带来的新气象，何其巩将此次追悼大会布置得十分隆重而严肃，到会代表约一千人左右。会场正面悬挂“国家正气，革命先驱”八个大字，烈士遗像两旁写有“以身殉报”与“为国捐躯”一副对联。会场内外张贴大量挽联，内容无非都是赞扬林白水与邵飘萍两位烈士的高品质与光辉业绩。何其巩市长带领大家向孙中山先生和两位烈士等行三鞠躬礼，并宣读祭文。然后由社会各界代表发表演说，充分赞扬烈士的正义行为和高尚人格，同时

严厉谴责军阀官僚的无耻与罪恶。北平市政府这一举措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是国民党当局对林白水、邵飘萍两位烈士的平反与昭雪。

纵观林白水的一生，被他抨击的军阀，除张宗昌、潘复外，还有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曹锟、许世英、陈锦涛等人。林白水深知办报有风险，并且已经尝够了报馆被砸、三进牢房的苦头，但他还是不改初衷，义无反顾地坚持办下去。因为他办报的宗旨，就是要“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即便遭遇不测，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林白水先生的可贵之处。

林白水先生的牺牲，乃是中国新闻界的不幸。广而言之，也是中国社会的悲剧。1985 年 7 月 30 日，林白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林白水先生泉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矣！

(本文作者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 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

胡伯威

解放初(1950—1953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以前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那时的上海中学为什么好,为什么在全国赫赫有名,归根结底是那里英才荟萃。其中当然也包括学生生源好(考进上中很不容易,这有矛盾的短篇小说为证),但最重要的还是上海中学的老师棒,几乎个个都棒。至少我觉得听他们讲起课来比我后来在北大的那些老师还精彩。

广袤校园的西北角有许多一式的,带有小花园的西式平房,朝东一排、朝南一排,排成丁字尺形。这是教师的住宅,一家一套。所以说上中的教师待遇比许多大学教授都好,我刚进校就听人家说,解放前一些大学想聘请上中的教师去当教授,他们大都推辞不就。因为在他们看来,上中教师的身价和名声至少不比一般大学教授低。

我进去的时候刚刚解放一年多,所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老师们都还比较鲜明的保留着自己的个性,于是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鲜明的,至今他们一个个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还栩栩如生。

头一学期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贺仁麟先生。他在我们班担任了短时期的班主任,据说他以前当过记者。贺先生个子偏矮,但是俊雅斯文,一袭长衫飘洒得体。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大却娓娓动听。一堂堂的课听下去,你不能不折服于他的学问渊博,思想深邃,很有魅力。他教过我们政治课,也许还教过一段时间语文。那年年底掀起轰轰烈烈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运动的时候,他在学校的有线广播台给全校同学作了“人生观问题”的专题大报告。他不是党员,他这个报告的马列主义有多少我没有水平判断,但是听得津津有味,在一些问题上很有“顿开茅塞”之感。可惜他给我们班上课直接接触的时间只有大约一两个月,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有这一点点了。

讲课最精彩的,是给我们上平面几何课的老师余元庆,他体态微胖,戴一副深色框架眼镜。他说话略带宁波口音,中气足,而且讲起来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他能够像说书先生那样来讲解逻辑严谨的几何问题。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何况解几何题本身就像下棋一样有趣。余先生在上海本来是一位名师,他和他弟弟余元熙也是上中数学老师,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原上中理科主任朱凤豪(我们进校那年他已经调到吴淞中学任校长)三个人合编的高中数学课本颇有名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余元庆先生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余元熙则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

由于我们一进上中就听了余先生的课,却苦了下个学期教立体几何的女数学老师汪伯珏。平心而论她也不算差,但是比之余元庆难免相形见绌,听着不过瘾,我们班上这些同学,特别是高中一年级开始就进校这一批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但是大家有一个“毛病”,对老师的教学很挑剔,甚至可以说口味很有点“刁”。第一学期学平面几何的时候余元庆先生的精彩讲课把我们的胃口吊高了。第二学期女老师汪伯珏教立体几何压力就太大了。偏偏立体几何要求有特别强的空间想象力,教的人要有超越纸面(或黑板面)的描述能力,汪先生在这方面似乎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使不少同学越听越烦躁。在课堂上开始对老师有一些不客气的表现。汪先生四十

好几了,长得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不清楚的时候着急起来的样子可怜巴巴的。但是同学们也因为对学习认真,听不懂的时候也着急。由于认真而较真,对她不肯轻易放过,出现了提问“轰炸”,甚至发展到起哄,有一次课堂上还把她急哭了。记得那一次是讲“全同”和“对称全同”的区别,她总把这概念表达不清楚。但是哭过之后的第二天,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忽然兴高采烈地走进我们教室来,手里拿着一双手套走到讲台前大声说:“你们昨天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去问了余元熙就是余元庆的弟弟,当时好像已经当了教务处副主任)先生,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简单,对称全同就好像这两只手套,形状完全一样,但是一只正一只反,以此类推就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老实人!讲课讲不清楚的时候她只觉得对不起大家,吃不下睡不好,毕恭毕敬去请教比她年轻的同事。找到答案后欢喜雀跃迫不及待来告诉学生们,并不讳言是余先生教她的。就这点科学精神和诚挚负责的师德,你能说她不是个好老师?

生物老师褚圻风格别致。生物形态和分类早在初中动、植物学中教过了,所以他讲的主要是细胞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基本理论。看起来他在遗传学方面特别有心得,也许主要是因为苏联遗传学的那场“革命”在解放初开始触动了中国学界。褚先生不甘落伍,也发表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遗传学的米丘林路线》,发给我们每个同学一本作为参考书,因为那时的教科书还没有来得及放进这些内容。这本书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魏斯曼、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唯心主义遗传学”。把“物种不变”、“后天获得性不可遗传”和“染色体是遗传基因载体”等观点都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的伪科学。热情宣传了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革命的唯物主义遗传学理论”。我因为一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为之倾倒,给我理解生命世界的种种奥秘“开了天目”,所以觉得他批判的这些“资产阶级学说”当然都是错误的。因为,按我那时简单的逻辑,如果物种不变还有什么进化?如果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各种生物特性靠什么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而演变?那样复杂精巧的生物的一切秘密都会包含在那几对染色体排列组合的密码里,难免过于神秘而不可思议。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科学家”犯着什么要弄出这些“反

动理论”来呢?据解释,一是为了宣传“上帝创造一切”,用“宗教鸦片”来毒害人民;二个是为了宣传“存在的一切都是永远不变的”,不许革命;三是为了反对革命人民改造大自然。后来这种给自然科学理论乱贴“阶级的”、“政治的”标签的事见多了,才知其可笑可恶,狗屁不通。不过褚先生本人的确是很有学养的,整个生物课讲得引人入胜。

地理老师陆人骥,地理知识十分渊博,但讲的时候总喜欢东拉西扯添加一些花絮,经常扯到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去了。他在插科打诨的时候,表情却极为严肃,一点也不嬉皮笑脸,只在得意之际翘起下巴抿紧了他的阔嘴,瞪圆了银丝边镜片后面的眼睛,紧瞅着下面对他的宏论有什么反应。他这些题外话里往往不知不觉地偷偷塞进对自己的无伤大雅的吹嘘,偶尔还要摆摆自己的“进步历史”。

有一次他不知又从哪里开始,七拐八弯地扯到他曾经掺和进一次学生运动,他承认自己在其中只当了一个摇旗呐喊的不要紧的角色,但却也被混着“抓进去”了。这倒给了他一个表现英雄气概的机会,警察局里讯问到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回答问题时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掐准分寸,大方得体”。“你是干什么的?”学生;“姓什么?”陆;“叫什么名字?”人骥”。

讲到这里,他得意起来了:“你们看,我回答得是不是简洁而毫无破绽?要是换了别人,人家问他名字叫什么,他一定说:‘我叫陆人骥’,啊哈!既然前面已经说了‘姓陆’,又说‘叫陆人骥’,那我不是变成‘陆陆人骥’了吗?”之后,同学们在背后就改叫他“陆陆人骥”了。

“抗美援朝”深入以后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教育,“陆陆人骥”也积极响应,在教材里加入了解放初期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伟大号召下开始筹建的几大水利工程,安徽的佛子岭水库、河南的石漫滩水库、板桥水库等(后面两个水库不幸在1975年8月大洪水中垮坝,带来历史上罕见的大灾,我正好去参加了那次暴雨、洪水的调查),他讲得有声有色注入了爱国主义和颂扬新社会的充沛感情。但是到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他差点为自己那喜欢插科打诨的毛病吃了亏。团组织发动同学帮助老师改造,要大家平时注意教员们的言行,特别是在上课时有没有反动或错误言论。于是我们便很注意寻找蛛丝马迹,特别在“陆陆人

骥”身上挑出过一些毛病。但具体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有个口头禅是喜欢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汇前面加个：“所谓”。当然也包括在一句正面的话或一个庄严的词汇前加上“所谓”，这就含有贬义了。讲地理难免涉及到政治，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有人提出他这是别有用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会“上纲上线”。好在那一次“思想改造”只是把他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敲打了一下，洗了个“烫水澡”；当时没有深究，只要以后别再“犯事”。

美术老师（实际上只教图画）是我们的校长孙福熙。是“党外知名人士”，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大概还是同乡，因为他说的是绍兴国语。从他的神态看有一点年纪了，但是皮肤白皙而滋润，头发漆黑光亮。叫他当行政领导大概不大合适，只能摆摆样子。他本来不善辞令，又不知什么原因似乎有些拘谨。他这个校长的角色好像只表现在每星期一上午全校大会上拿着稿子用他那绍兴官话念一个工作计划报告。开头千篇一律是：“饼（本）周的中心工作……”那时的“中心工作”不谈教学，总是关于当前政治活动方面的，他大概对这个很不在行，所以只好照“饼”宣科了。然后是党支部组委、副校长陈光祖讲话，这才是正戏。听口音他大概是苏北和山东接壤地区的人，在三野当过团政委，三分军人气概，七分政治家的老辣干练。像许多解放军干部那样，喜欢把棉大衣披在肩上，在麦克风前说起话来声音是脉冲式一浪一浪涌出来的，并有低沉的胸腔共鸣，营造出一种事关紧要的严肃气氛。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学校里抓出一个姓袁的历史反革命。陈光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件事的时候，附带点了孙福熙校长的名，说他温情主义，敌我不分，替反革命分子讲情开脱，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不久以后，孙校长即调离上中，陈光祖升任校长。

第一学期秋天的时候，程太堃先生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早先贺仁麟先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讲了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而程先生开始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对她来说有亲身经历，当是驾轻就熟。她是苏北人，解放战争时期以知识分子出身参加新四军当过连指导员。她是和陈光祖一同派到上中来的，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她那时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脸上饱经风霜，一双单眼皮略带八字形，却炯炯有神。留着解

放区女同志式样的短发，戴一顶八角帽。有一次我到教员办公室和她在沙发上坐着谈话时，发现她的腿肚子之粗如同三轮车夫，这显然是行军打仗中练就的。课堂上她不仅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还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政治。那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了，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仁川登陆一战使形势急剧逆转。她操着一口苏北话，从世界大局分析起：“美帝国主义别当（必然）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别兰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这是一定的！”这句话几乎成了她那时的口头禅。后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前往纽约联合国大会发出了“中国人民的声音”。程先生特别为伍修权的“洋洋（二）万言驳得帝国主义者张口结舌”而自豪。

程先生作为班主任，对我们班团支部的工作和学生思想情况关心得无微不至。校团委也号召团支部工作要取得班主任的合作，何况程先生是全校少有的党员之一。我们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去征求她的意见，有重要的会议也请她来参加。她对各种问题当然比我们看得深一层，许多我们想不到的都由她指点出来。比如怎样分析同学中的进步、中间、落后；哪些对象要好好培养；哪些人和问题需要教育帮助；哪些倾向要警惕、反对、批评、斗争。

在程先生看来，我们班上“资产阶级小姐”不少，特别是几个教会女中来的，娇气十足。有对集体生活发牢骚的，有熄灯以后抱着饼干筒在被窝里嚼的，有撒娇发脾气吵架的，也有自己进步了看着别人不顺眼表现出骄傲自大的。她往往直接在她们里面谈话，做工作。后来我们班上女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娇气”也少了。

历史老师孙运鸿年纪比较大一些，四十好几，将近五十了。面孔和身上都很瘦，不修边幅，剪平头，但往往留得很长。大概由于体弱，秋天早早的就穿上了厚厚的棉列宁装。不过他讲课时中气倒是很足的，一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转，更加强了他语言的感染力。他讲课极其精彩，引人入胜，就好像在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在跟着他身历其境一样。第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讲“从猿到人”的时候弯着腰、垂着双臂学猿人的样子。正好他又是那眼眶凹，眼睛圆，颧骨凸起的脸相，大家课后都笑：“活生生的一个猿猴。”他自己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史，听他描述的那真是

精彩盛世，人类文明的光辉童年。特别是作为巅峰的雅典贝利克理时代和东罗马拜占庭时代，他都描绘得极其细致详尽，并发出热情赞叹。而最扣人心弦的还是他讲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戊戌维新……成败、得失、正误、功罪，每件大事他都能分析评论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我听着心里时常感到遗憾，为什么孙先生不早生一百年，由他去朝廷军机处当总理大臣，或者当太平军的主帅或军师，那样的话，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了。

可是听说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受到的震撼最大，开学后遇到学生的时候，他不无夸张地拉着他们的双手，捶胸顿足，表示对过去的悔恨。虽然他究竟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我至今不甚了了，但那时才听说他解放前曾当过上中的初中部

主任，对学生管得非常严厉，近乎法西斯式的教育。学生犯了过失的时候，他的处罚是强迫他们吃奎宁粉。这和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热情和善的孙先生完全两样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能怪他，解放前的上海中学不仅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后还要好些，而且对学生的管教也比解放后更严厉。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有少数老师在我们毕业前已经开始往大学调了，经过了“思想改造”，他们懂得了“服从祖国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没有人敢辍着不肯走了。我们升大学以后，我们在的时候那些老师陆续的几乎是“一锅端”的也“升了大学”。去新建的上海师范大学的最多，也有去交大、华东师大等其他学校的，到那边都是教授，有几个去当系主任。

(责任编辑 赵友慈)

# 平和的进步

朱正

袁世凯称帝失败死去之后，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今后怎么办呢？积极参与反袁斗争的梁启超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意见。1916年9月30日他在南京军警政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后究由何道乃得为此国体立一万年不拔之基，则吾以为可以五字括之，曰平和的进步而已。所谓平和的进步者，第一可证以不进步的平和。即凡国家大事，动以变革为虑，惟保存之是好。稍有危险，即有所惮而不敢为，如是平和固得矣，而进步则何如？美其名曰平和，实则腐败而已，顽旧而已。且以方今之大势论，国际竞争如其烈，外交大势若是其危，经济组织之变迥异前古，若政治，若社会，若教育，若生计，所应改革者正多。使我人贪此平和之名而阻塞国家新机，不惟大势所不许，质言之，则无以立国而已。其次证以不平和的进步。凡国家无论何事以猛进为主，事因猛进之故，而至于冲突，则曰此改制时必经之阶级也，此当然之代价也。凡更张之举，是否与国情相合，概置不问，而惟新是好。是动摇也，破坏也，非进步也。且用此目的，而诚能达进步之目的于一二，宁非可欣？无如此种进步，以新者之独

伸，而他方必与旧者相冲突。冲突以后，或旧胜而新败，则国家复陷于复古之状态。证之数年历史，岂不若是耶？可知此种进步不惟牺牲平和，而于进步之目的，丝毫无与。不过有动有反动，而国家长此纷扰而已。今国中政治潮流虽不能一言尽，而要之一以平和为旗帜，一以进步相标榜。此两派所言，各有一部分之真理，而要不能谓为全是。盖仅有平和，不能合于世界之新潮流；仅有进步，不能为固有国情留有余地步，已如上述。故以启超所见，非合此二者而调和之，则不足以定今后之国本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

我以为今天来看这段文字特别有意思。如果把“平和”换成“稳定”，“进步”换成“改革”，读起来就像是现代人的文章了。梁启超说得真好：如果拿稳定这个大道理来阻挠改革，“实则腐败而已，顽旧而已”，目前朝野同样深感忧虑的腐败现象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没有稳定，国家长此纷扰不已，也就不可能有改革，不可能有进步或发展了。

梁启超真不愧为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先驱，他几十年前的这一席发言，对时移世易之后的读者也仍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 从传统文化借鉴反腐败经验是个假命题

张  
绪  
山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升温 and 官场腐败案的层出不穷,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克服腐败的灵丹妙方,以至产生了一个“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的设想,而且有声响日高的趋势。从动机上,论者可谓用心良苦,但严格说来,此论却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假命题或伪问题。

## “重民思想”和传统吏治文化对现时反腐败无借鉴意义

“传统文化”是一个意义十分宽泛、模糊的概念。客观地讲,“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对于其中所体现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的意义,似不宜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但“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所关涉的,是“反腐败”这个时代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就具体的指向而言,“传统文化中的反腐败经验”所能包含的,不外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诸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一是传统官僚政治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因此,看似玄虚而复杂的“反腐败”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传统文化中的这两个方面是否能为当今社会面临的“反腐败”主题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传统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似乎与反腐败这个主题无甚关涉。

无庸赘言,“重民思想”确实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历史上,“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重民思想”,所体现的不过是一些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书生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执权柄的统治集团所坚信的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骨子里是不会接受的。这种书生理想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处于很微末的地位,历来都不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更没有在专制体制下的制度设计中有所体现。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不同。“民本思想”与“社会契约论”互为关联,促成了作为近代世界进步标志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的“重民思想”从来没有产生类似的结果。

实际上,盛行于今日政坛的所谓“人民公仆论”——人民是主人翁,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在深度上早已超出了传统的“重民思想”。既然“人民公仆论”无法阻挡滚滚腐败之流,那么以历史上的“重民思想”,又怎能在今日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作用?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反腐败”这个时代命题,已经不是某一种观念所能解决。“存天理,灭人欲”式的道德自律,在一个礼崩乐坏、欲望横流的时代是不会有其任何效验的。唯一可行的措施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上的约束力和法律上的惩罚力,二是保证这种约束力和惩罚力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这两个方面互为里表,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有制度和法律而无保障其落实的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代表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制度和法律等于虚设,难以推行;有权力制衡的政治集团而无相应的制度和法律,则物质力量之行为无规则可遵循。传统官僚政治体制及其文化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在本质上是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制集权政治。这种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关系。在这种权力等级结构中,上对下拥有绝对的权力,下对上必须绝对服从。由此造成一个必然结果是,国家政治生活能否正常运转,廉洁高效,取决于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是否能保持强大控制力,二是这个最高权力本身是否能保持廉洁。但问题是,最高权力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实际上最易腐败的,一旦最高权力腐败,整个官僚政治绝对不可能保持其强大控制力和廉洁高效,因此腐败成为不可避免之事。换言之,传统吏治制度的制度约束力和法律惩罚力,其前提是不稳固的,它没有得以落实的物质力量,即不同政治集团制约力量的保障。

中国历史上,所谓传统吏治经验无非是严刑峻法,如朱元璋的“剥皮实草”之类;但专制制度下的历朝历代的严刑峻法,都永远脱不了事后惩罚的老套路,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早已充分证明,“事后惩罚”的法律制度,不管如何严厉,都根本无法杜绝官员腐败于未萌,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对已经形成的犯罪事实实施不得已的惩罚。

更重要的事实是,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差不多还能做到严刑峻法,因为新王朝的建立者都是民众反抗力量的目睹者或亲历者,亲眼目睹或亲身体会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惊心动魄的强大冲击力。但是,新王朝开拓者从波澜壮阔的民众反抗运动中形成的“惧民观念”,随着统治秩序的逐渐恢复而逐渐减弱,在依靠血统继承皇位的后继者那里,其影响力逐渐消失。来自“打天下”的王朝开创者本能地感悟到的“惧民观念”,从来就没有对传统官僚政治形成实质性冲击,形成相应的以民众制约官员的制度,因而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根本影响。一部中国历史证明,从来没有哪个王朝将严刑峻法贯彻到底,最先破坏法律的往往正是最高权力集团的成员,他们享有的特权是对法律的最严重的腐蚀剂。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充其量不过是欺人自欺的遮羞布。

在传统宗法专制吏治制度中,看不到民意对官僚政治的制约。因此,只有当整个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超出民众承受能力时,民众便揭竿而

起,铤而走险,推翻整个权力集团,建立同样结构的吏治体制,然后再经历同样的历史循环。王朝虽有更迭,其制度结构却没有本质的变化。近代以前的一部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王朝更迭史;在这部王朝更迭史中,人们惟见兴衰治乱,却看不到制度上脱胎换骨的更新。所以,这部历史演示给人们的,是一幕幕成败兴亡的悲喜剧。然而,在这似乎永无休止的业力轮回的悲喜剧舞台上,角色虽有变化,但处于官僚体制之外被当作道具使用和折腾的芸芸众生,对这个相同结构的吏治体制从来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 传统吏治文化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障碍

从根本上,传统吏治文化在预防和治理腐败方面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借鉴的。不惟如此,它的许多观念还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障碍。

第一,传统吏治文化的前提是“性善论”;它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一厢情愿地相信帝王“禅让”和“大公无私”的美德,天真地相信君王趋向“仁政”的自觉性,对人性恶质的存在视而不见,从未提出“如果执权柄者怙恶不悛怎么办?”这种法治制度不可或缺的前提设问,从未正视官场对人性恶质膨胀的催化作用,其结果是限制君王恶性滋长的约束机制无法形成,暴政一旦形成,民众束手无策,无法求助于制度的保障,除了暴力行动别无选择。由于从未出现类似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原罪论”,中国传统吏治文化缺少西方社会中作为民众共识的以人性恶为前提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腐败”的法制伦理前提。

第二,“性善论”与家国同构思想,使传统吏治伦理充满家族伦理观念,“青天老爷”、“父母官”等观念成为根深蒂固的为官意识。在具体实践中,各级官吏逐渐将自己视为法律的化身,而不是与民众一样服从法律的个体。这种为官意识成为官员特权思想的潜在意识前提。法律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公民观念,在各级官僚那里很难被接受。

第三,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传统吏治政治中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现实,使他们

以统治集团享有特权为理所当然,从来不敢设想自己是与官僚集团成员享有同等权利的“公民”。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权利观念”,只有“明君”、“青天”和“臣民”意识,现代法制社会必不可少的“公民意识”始终无法形成。中国老百姓对官员的畏惧源自“臣民”观念。

传统吏治制度具有的宗法专制特性以及它所造就的“臣民”心态,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今日的反腐败提供实质性的借鉴。如果传统官僚政治及其文化真能为历代统治者提供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良策妙方,那么中国历史早就不会有王朝更迭了;如果传统旧制度真的具备脱胎换骨、自我更新的机制,那么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以生命为代价、前赴后继去进行的以颠覆旧体制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说到底,宗法专制官僚体制本身的缺陷乃是政治腐败的根源。如果说“从传统文化中借鉴反腐败经验”这个命题

还有价值的话,那么也是在否定意义上,即:根治今日的腐败,绝不能走传统吏治的老路;要从传统吏治文化中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循环圈的经验,无异于向一个行将就木的野郎中寻求长生不老术。今日中国的官场腐败案屡屡发生的整体背景,是中国社会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传统旧体制的遗留毒素未能完全铲除,现代民主体制未能完全确立和正常运转,这才是官场腐败的症结。因此,根治目下汹涌而来的官场腐败,最需要也最有效的捷径,不是走回头路,向“文武周孔”那里取经,而是要向前看,认真研究和借鉴已经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先进国家的吏治经验,为我所用。如果回过头去到传统文化中去寻讨所谓“灵丹妙方”,其情形无异于缘木而求鱼,也很像一个人幻想自己可以提着头发脱离地面,飞向空中。(2006-7-6)

(责任编辑 萧 徐)

## 民先总队第一任队长是李昌

《炎黄春秋》今年四期第80页载周明文章《民先总队第一任队长是敖白(北)枫》,于光远同志看到后问我情况是否属实。我查了有关资料,表明作者对当时的情况不清楚,我写了一个材料给于老,现寄上。简单说,敖白枫是北平民先总队第一任队长,李昌是第二任。1937年2月民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会上选举的全国民先总队长是李昌。

冯兰瑞

附:1936-1938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变动情况

1936年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回到北平,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时没有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为四个团。李昌、于光远在第一团,他们一同参加了第三团南下先遣队。

各团于1936年1月分头整队出发,冲破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拦和障碍,经过了十多天的艰苦工作回到北平。在宣传过程中,学生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救亡团体。一、二团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1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了宣传团代表大会,决定将三团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一、二团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

合并,统一称“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会议还通过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

民先队成立之初,确立组织机构为四级:总队、区队、大队、小队。清华大学民先队,民主选举第一任大队长(吴承明)。李昌当选为大队下面的一位小队长。不久,大队改选,李昌当选为清华民先队大队长。

这时北平民先总队已成立,总队长为敖白枫(高锦明)。5月底,北平市委根据中共北方局的部署,北平民先总队长敖白枫被派往北平西区任中共区委书记,李昌调到北平民先总队部,接替敖的工作。这年(1936年)8月,北平民先代表大会,选举李昌为总队长。李昌是第二任的说法,是指北平民先总队长。李昌任北平民先总队长时,总队部的领导人还有杨雨民、杨克冰、孙传文、顾德欣等几位。

1937年2月,第一次民先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大会决定在“民族解放先锋队”前面冠以“中华”二字,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原民先总队改为地方队部。全国民先代表大会上李昌当选为第一任(实际上也没有第二任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简称“全国民先总队长”)。李哲人任组织部长,张震寰任宣传部长,刘导生任秘书长。1937年5月李昌在陕北开会期间,李哲人代理总队长,于光远代理组织部长。

# 为说真话舍身的林白水

章长炳

中国报业的先驱林白水先生不幸被反动军阀杀害，至今已有 81 个春秋了。81 年在宇宙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类社会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

林白水先生福建闽侯（今福州）人，生于 1874 年（清同治十二年），初名林獬，又名万里、白水，字少泉，号白话道人、宣樊，笔名地雷、退室学者。自幼聪颖过人，曾拜福建名士高啸桐为师，研读经史，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弱冠，应同宗林启之邀请，赴杭州参与创办求是书院、养正书塾、东城讲舍和蚕学馆四所新式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即 1898 年，林白水在上述四所学校担任教习，并在《杭州白话报》主持笔政（主编）。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赴沪，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筹办《爱国女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宣扬新政，宣传禁烟，提倡社会变革，破除迷信，反对妇女缠足，在江浙一带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杭州市成立全国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1903 年林白水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兼学新闻。由于沙俄阴谋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林白水在日本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爱国拒俄排满活动，并参加了“抗俄义勇军”。同年底回国，与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号召国民对沙俄保持警惕。后又自办《中国白话报》公开鼓吹以暴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在《警钟日报》担任主编期间，林白水曾撰文宣扬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加入光复会，为孙中山先生所器重，并亲书博爱二字相赠。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具有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各种鼓吹革命的报刊犹如雨后春笋，由林白水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德国在山东青岛等地侵犯中国主权，林白水就在《中国白话报》上加以揭露和抨击，受到德国驻沪总领事的无理干涉。不仅如此，林白水还曾参加过邹容和万福华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的活动。行刺虽未成功，但毕竟也反映林白水是当年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

辛亥革命后，林白水所主办的报刊，计有《公言报》、《平和日报》、《新社会日报》、《社会日报》等等。他办报的

宗旨就是抨击时政，锋芒指向军阀政客、贪官污吏和奸商恶霸。在北京出版的《新社会报》就因为揭露军阀政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报馆被查封，白水本人入狱三个月。出狱后，《新社会报》改为《社会日报》，又因发表揭露曹锟贿选总统的文章，使报馆遭到查封，他自己又再次入狱。这是民国十二年的事情。到 1926 年（民国十五年）北洋军阀张宗昌进驻北京，任命其亲信幕僚潘复为国务总理。潘复为人贪婪成性，民愤极大，是张宗昌的心腹谋士。在张宗昌的包庇下曾任一年财政次长就贪污几十万银元，并在北京、天津买下几处洋房。林白水早在 1923 年 1 月 25 日在《社会日报》上就曾揭露过潘复，潘复一直对林白水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到了 1926 年 8 月 5 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又发表《官僚之运气》一文，再次对潘复进行揭露与批判，并称潘复为张宗昌的“肾囊”，潘复阅后岂能容忍，立即派宪兵司令王琦亲至《社会日报》勒令林白水更正请罪，被林白水严词拒绝。于是当场被捕，未经审讯，翌晨被押至北京天桥南大道枪决。其时正值炎夏，有人见他身着白夏布长衫，白发蓬松，血迹斑斑，陈尸道旁，惨不忍睹。

一代报业先驱，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就惨死在封建军阀的枪口下，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社会黑暗到何等程度，哪有什么公理？哪有什么人道？枪杆子在谁手里，谁就有了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那些封建军阀政客们的残忍卑鄙的手段。林白水经常撰文抨击时弊，锋芒所及，横扫军阀官僚，因而他的被害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张宗昌杀害林白水，是当时社会反动势力痛恨林白水的必然结果。

林白水牺牲后，北京新闻界人人自危。《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先生因同情林白水先生亦被张宗昌逮捕入狱。《民立报》同时被封闭。北京城内风声鹤唳，陷于一片恐怖之中。但是，就在林白水被害的当天晚上，竟有一部分主持正义的新闻记者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大和俱乐部开会，发表宣言，对林白水之死深表同情，对未经审讯残忍杀害林白水的军阀官僚，表示严厉的谴责。（下转 72 页）

# 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典礼 在郑州举行



2007年4月18日，“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庆典”在河南省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内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李成玉和著名华商代表、海内外知名人士及三万余名观礼群众出席了庆典活动。

高106米，气宇轩昂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高者为炎帝，矮者为黄帝）历经20年的建设，终于落成。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庆典是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庆典的主题是“和谐盛世，万龙归宗”，由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主持。社会各界代表首先向炎黄二帝塑像敬献花篮，由郑州市委书记王文超致欢迎词。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对炎黄二帝塑像的落成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必将为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进民族感情做出巨大贡献”。上午10时20分，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宣布炎黄二帝巨型塑像正式落成，炎黄二帝塑像山体喷出五彩彩烟，象征炎黄二帝的红黄两条巨龙在彩烟瀑布中腾飞，配以彩带、礼花等，将庆典活动推向高潮。



参加庆典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左），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右），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



与会嘉宾（前排左起）许嘉璐、李成玉、徐光春、王全书



参加庆典的海内外炎黄子孙在炎黄广场留影 朱广健摄影

王光：《难忘的年代难忘的诗》序言

雷宇 —— 民众要为他建“六公祠”

胡耀邦与电影《代理市长》

纪念邓小平：坚持理念创新

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

“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